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图例

	市政府
	县(市、区)政府
	乡、镇(街办)
	铁路
	高速公路及道号
	国道及道号
	省道
	县道
	省界
	设区市界
	县(市、区)界



2011·09, 5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 王晓嫒
 编委委员： 徐福田 李克彬 刘 凯
 高 明 胡爱军 伊廷军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高文堂 郑克勤 曲文军
 康德忠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倭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 朱海涛
 副 主 编： 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刘兆东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徐向前元帅在山东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光辉的指示 永存的关怀
 ——记毛泽东主席对莒南县三个先进典型的批示 魏贤胜 07

千古民魂（连载）
 ——渊子崖，中华抗日第一村保卫战纪实 李凤军 10

雄鸡高歌 张方庚 14

【史海撷萃】

滨海十年（连载） 谷 牧 18

我为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捧骨灰 梅现华 22

【文化掇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灯·扛阁”（下）
 张铁民 24

【名人素描】

沂蒙走出的科学骄子 钱勤来 28

元代武德将军王义美考略 杨春浴 30

康辅之与东山书院 孙士纯 33

【蒙山沂水】

沂蒙山腹地的一座文化富矿
 ——莱钢集团鲁南矿业印象 杨立勋 陈希法 35

【古城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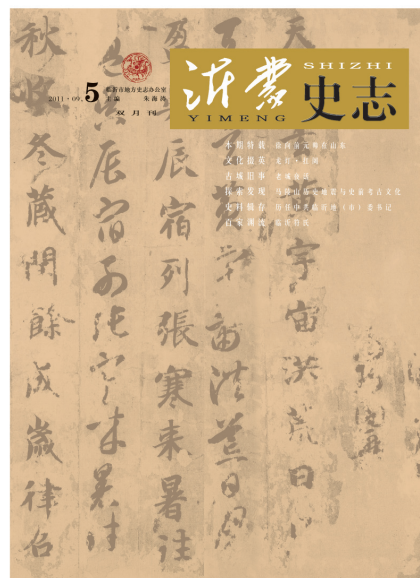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9

【诗画赏析】

智永和他的《真草千字文》 胡拙安 辑 44

浩气壮山河 诗魂育后人 ——《沂蒙诗话》之四（下）	李兴河	46
【探索发现】		
马陵山历史地震与史前考古文化 三枚印信背后的故事（上）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徐淑彬 高雷	49 54
【沂蒙名医】		
名符“丰富” ——速写郭丰富	刘凤才	56
【史料辑存】		
历任中共临沂地（市）委书记	卢少林	59
【百家渊流】		
临沂符氏	唐士文	62
姓氏百家漫谈——李姓	赵丹峰	65
【文史论坛】		
一部彰显地方特色的方志佳作 ——简析《邳江县志》	李华 徐希冕	72
我国寺院布局规律与特点	骏马秋风齐鲁	77
【沂蒙乡亲】		
王晶——千手观音的手语老师和指挥	于芹	79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为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封底为兰山区洪家店刘疵基金缕玉衣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徐向前元帅在山东

辛鸿义



徐向前元帅（1901—1990年）

1939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提议和山东的抗战形势，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同志任司令员，朱瑞同志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此前在冀南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受命之后，与由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前来的原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及其所率领的一批干部，从冀南入鲁，于6月29日到达沂蒙山区，在蒙阴县代庄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会合。

通电就职

徐向前、朱瑞在经过对山东情况的了解和进行筹备以后，于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并联名发出就职通电，先后于8月10日和18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电文称：

案奉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

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等因奉此，遂于七月中进抵鲁南就职视事。自维轻材，难膺重寄，纆短汲深，每虞陨越，惟兹国难，只有勉竭驽骀，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敬恳时赐南针，以匡不逮，谨电奉闻，伫候明教。

这份只有200多字的电文，完全使用了旧式公文的格式，例如，“案奉”就是旧式公文引述上级官署来文的起头语；“等因奉此”也是旧式上行公文在引述来文之后和陈述己意

之间的套语，而且文中多用文言。由此再联系其内容，以及后面的“谨电奉闻，伫候明教”，就可理解通电主要出于建立统一战线和联合抗日的目的，致国民党鲁苏战区当局的。

内容方面，电文行文严谨，语言得体。前一部分郑重声明：徐向前、朱瑞担任的职务系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命令委任，职权也是集团军总部所赋予，而且已于7月就职视事。因此既合乎军制，也合乎程序。

后一部分表明态度和决心，透露出谦逊和自信。意思是：（我们）自感能力低下，难以担当如此重托，就像用短绳系桶向深井提水一样吃力，时时担心出现失误。但鉴于当前国难深重，只有竭尽自己的力量，在于总司令和沈、韩副总司令诸公的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恭请经常提示方向，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谨致电奉告，伫候高明的教导。

通电不卑不亢，态度鲜明，在山东各界引起很大反响，也受到于学忠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重视。在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此后，徐向前、朱瑞在请示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同意后，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统一了山东、苏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

为建立抗日政权会见于学忠

徐向前司令员到山东，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民主政权。他在《忆山东的一年》中回忆说：我刚到山东时，山东还不能算是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就鲁南来说，只是个游击区。那时几乎没有抗日民主政权。因为没有自己的政权，就不能顺利筹粮筹款，几万军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都不好解决。没有政权，也不好发动群众。你在时，群众发动起来了，你一走就散了，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为此，1939年8月底，徐向前带上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各乘一匹战马，到国民党鲁苏战区总指挥部与于学忠谈判。谈判的中心内容是政权问题。徐向前在回忆谈判的经过时说：于学忠劝我们不要搞政权，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抗日非得有政权不行。群众要起来抗日，我们要发动群众，没有政权就没有个依靠，没有政权，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的政权，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薪饷都不

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这样争论了两个多钟头，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回来照样搞我们的政权。

徐向前谈判回来，立即跟军政委员会研究，大力开展政权建设。当时正值侵华日军大“扫荡”之后，一些地方的国民党政权纷纷垮台，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根据地和游击区乘机建立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到1940年上半年，全山东已逐步建立起90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署。7月，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不久，又召开联合大会，选举产生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者实际上行使省政府的职权。同时，在敌占区的城市和铁路沿线还有条件地建立所谓“两面”政权。即名义上是敌伪政权，实际为我所用。

整军的故事

徐向前在山东的一年，始终关注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建设。他认为这项工作关系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关系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此，他亲自领导了1939年8月开始的整军。通过整军，提高部队质量，扩大部队数量。对于提高质量，他认为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而要实现提高质量的目的，主要应抓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因此，他采取举办学校、教导队、参谋集训队以及指导团和支队办轮训班等形式，组织干部学习政治和军事。

徐向前十分重视军事理论与实战的结合。他说：“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是没有列入计划的整顿和训练。”那时战斗频繁，他要求每打一仗，都要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1940年3月，他亲自组织的“孙祖战斗”，打退日军的进攻，毙伤敌指挥官以下200人。他在总结时说，这些经验教训，是用很多同志的鲜血写成的，应十分珍惜。并以《孙祖战斗的检讨》为题，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部队。

在扩大军队数量方面，徐向前指示各部队：“凡我们足迹所至，都普遍建立武装自卫团、游击队，作为正规部队的助手和补充。”因此各部队出现战斗减员，都能得到及时补充。同时，各地还根据情况，将自卫团、游击队升级，增加新的军队建制。由于山东分局、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和徐向前的努力，山东八路军各部队不仅素质有很大提高，数量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6月徐向前离鲁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由上年的2.5万人发展到5.1万人；一一五师在1940年初是5.8万人，到九月发展到7万人。

徐向前对部队要求严格，他的指示很快就能变为指战员的行动。据原山东纵队卫生部长白备五同志回忆：1939年，他领导的卫生部和战斗部队一样参加了整军。他自己也扎上了武装带，佩上了手枪，和同志们一起出操、射击、投弹。有一次他去给徐司令员诊病，恰巧参谋处长罗舜初也在那里。罗舜初看到白备五身佩手枪，手携听诊器，打趣说：“白部长，你也背上枪了。”徐向前没等白备五回答，就接过话茬：“这才像个革命医生，对自己人施‘治’，对敌人施‘打’。”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了。还有一次白备五到司令部去办事，在院里正巧遇见徐司令员。在敬礼、还礼以后，徐向前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部长，怎么忙得连领扣都不扣！”说完又补给他一个微笑。这给白备五很大教育。白备五说：沂蒙山区的夏天非常热，但徐司令外出时，始终是戎装整齐，器宇轩昂。

白备五回忆：过去供给、卫生部门的人员缺乏军事训练，一有敌情就需战斗部队保护。自从参加军训，都能携带武器自卫。有一次鬼子扫荡，有一批轻伤员须转移。当时卫生部只有一个10人的战斗班，再向战斗部队要人已来不及，于是就由自己人护送上路。当部队经过一个国民党军驻地时，带队的将战斗班分成两部，分别放到队伍的前、后。一百多个轻伤员将拐杖扛在肩上，威武雄壮地安全通过国民党防区。

与战士同甘共苦

徐向前心怀坦荡，平易近人，始终把自己置于普通一兵的位置，与战士同甘共苦。1939年山东纵队供给部发军服，每人两套。徐向前从特务员曹云口里得知，这次的军服布料不一样，支队长以上是斜纹布的，战士发的是粗洋布的。得知这事后，他立即吩咐把供给部负责制发军服的李科长叫来，对他说：“既然战士都发粗布军服，为什么给我们发斜纹布的。你知道两种布料衣服相差多少钱？快把这衣服拿回去，给换粗布料子的来。”军服换回来以后，徐向前说：“这才像话。以前真是乱弹琴，要苦都苦么！”支队长以上的干部闻说此事，普遍表示要向徐司令员学习，把斜纹布军服换成粗布的。

1939年秋天，徐向前同志带领部分干部在部队护送下，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开会。经过一夜行军，穿过津浦路，第二天又跟一股日伪军遭遇，打了一仗。警卫员感到司令员一昼夜没休息，便给买了两个鸡蛋和一碗米饭，改善生活，补充体力。徐司令员看了看，便令送给战斗受伤的战士。接着问“部队吃的啥饭”，当警卫

员告知吃的糠窝头时，便令给自己拿两个。于是和战士们一起吃起来。糠窝头又酸又苦又涩口，味道怪怪的，都不大乐意吃。徐向前却一边吃着一边说：“怪好吃，还有甜味呢。”大家受他感染，也都有说有笑地吃着，像是真的品尝出“甜味”。

1940年6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徐向前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7月，他带一个警卫小分队由青驼寺启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从此离开山东。如今70年过去了，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中所建立的辉煌业绩，他的爱兵爱民的情怀和事迹，他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平实作风，至今令山东人民感念不忘。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子。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

光辉的批示 永存的关怀

——记毛泽东主席对莒南县三个先进典型的批示

魏贤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先后对莒南县王家坊前、高家柳沟、厉家寨三个农业先进典型经验作了亲笔批示。这三个批示不仅对这里的干部群众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的英雄业绩为之钦佩、赞赏和充分肯定，而且倡导全国，大大激发和鼓舞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这三个光辉批示，尽管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但这里的人们依然记忆犹新，一直把其视作永远的关怀，当作不断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大胜利的力量源泉。

现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将毛泽东主席三个批示的经过记述如下：

(一)

毛泽东主席对《山东省莒南县王家坊前乡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一文批示的经过。

1953年冬天，莒南县王家坊前乡王家坊前村王同昌、张三善、史明松三名共产党员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由14户贫农、1户中农组成“新建”初级农业合作社，由王同昌任社长，1954年秋后即扩大到33户。全社计划1955年增产粮食2.8万斤，花生3741斤。经过具体计算，花生种、地瓜种、肥料以及增添农具、耕畜和发展多种经营等共需开支1500元，除去社内现有的生产股份基金和公积金以外，还缺700元无法解决。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社委会制定了发动社员投资的计划。在王同昌带头投资的带动下，到1955年3月初，已有10户社员投现金270元，18户社员投花生种1200斤，社员养猪由22头增加到27头，加

上拾粪、起天井、改造粪汪等，基本上解决了春季生产资金和物资不足的困难。坊前区委及时总结了这个社的经验。不久，《大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该报通讯员张孝金写的报道。之后，中共莒南县委书记徐伴农又到该社作进一步调查补充，写成《莒南县委关于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共山东省委。1955年9月该文在山东《互助合作通讯》上发表。当月，毛泽东主席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典型意义，随即在这篇经验材料上作了如下亲笔批示：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二)

毛泽东主席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批示的经过。

1954年，高家柳沟村办起4处初级农业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文化贫乏，找个记工员都很困难。于是村团支部就组织青年学文化，“干什么，学什么”，如学写人名、地名、农活名、农具名等，效果很好。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青年们就初步学会了记工，为合作社配齐了记工员，并且为“三查定案”记工方法打下了基础。之后，团支部又组织会计学习班，培养了十多名会计，从而使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得到改善，以前那种夜里熬眼、帐目混乱的现象得到了改变。

1954年春，团省委书记冯立祖来到莒南听了这个典型经验后感到很新鲜，指示文瞳区团委书记戴东钦写篇专题报告，报给团省委。不久，这篇报告在《山东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1954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发至全省农村党支部，并抄报给团中央。11月10日《大众日报》全文刊载了这份报告。1955年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颐和园散步，此时，他正在考虑编写《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就向胡耀邦问道：“全国办了那么多的合作社，有没有在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回答：“有。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于是他就把这份材料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即对此文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

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帐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三)



厉家寨人民整山治水

毛泽东主席对《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一文批示的经过。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莒南县朱芦区区委委员孙西修带领工作组，会同厉家寨乡党总支书记厉月坤、乡长朱正友进驻厉家寨，以厉月举互助组为基础试办初级农业社。两个月后，厉月举即成立了有33户贫农参加的“心爱”初级农业社。1955年秋，党中央、

毛主席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同年12月，厉家寨乡即办起大山高级农业社。在乡党总支书记厉月坤和社长厉月举的带领下，提出了“劈岭填沟，让河流改道，叫土地翻身，向大山进军”等口号，在原来初级社深翻整地、修建11座小型水库、闸2000多道山沟，使3600亩旱地变成水浇田的基础上，凭着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镢头一张锨，大干苦干，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和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一气削平11个岭头，填平21个大坑和300多道水沟，将5条山河改道，把1000多块零碎土地连接成片，扩大耕地面积192亩，加之整修高产稳产农田，增种高产作物，普及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增养牲畜和毛猪，开辟肥源，合理施肥以及改良旧式农具、增添新式农具等措施，1956年获得了每亩平均产粮552.8斤的大丰收。

1956年秋收后，莒南县农业局按照往年的惯例，组织农业科技推广干部分赴全县各先进单位实地调查，总结增产经验。被派去厉家寨的是该局农技干部魏贤胜。魏贤胜到厉家寨后通过与干部群众座谈，写出了厉家寨大山农业社的增产经验。1957年4月厉家寨大山农业社社长厉月举参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回来后，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争取1957年农业大丰收的决议，制定本社增产计划并逐级上报的要求，县里又派魏贤胜同志去厉家寨帮助研究制定了一个增产计划。这两个材料送给县委办公室主任徐伴农，之后徐伴农主任即将这两个材料合并整理成《山东省莒南县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一篇材料，并以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名义逐级上报。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后，欣然写下了如下批示：

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查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千古民魂 (连载)

——渊子崖，中华抗日第一村保卫战纪实

李凤军

引子

1941年11月20日早晨，从沂蒙山扫荡归来的千余名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勾结下，突然包围了渊子崖村（今属山东莒南县板泉镇），妄图一举毁灭这个抗日英雄村，日寇用大炮机枪狂轰滥炸，多次组织疯狂进攻。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灾难，渊子崖人无一人惊慌，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投入战斗。村民用土炮、大刀、长矛以及镢头镰刀为武器，同虎狼兽兵浴血厮杀了一整天，击毙日军112名，伤者无数。至傍晚，敌人才攻入村内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百多名村民光荣牺牲。

渊子崖保卫战爆发后，立即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打击了日寇亡我的信心，因为它开启了抗日战争史上农民自发抗日的先声。

士兵死于疆场乃是天职，百姓毁家纾难慷慨赴死则是昭天烛地。此役重创了日军，使侵略者胆寒和羞愧。敌人无法理解：千余名装备了重武器的部队何以不能征服一个小小的村庄？

1995年春天，我们来到渊子崖村采访了几十位当年参战的老人。在这里，我们首先感触到生命和情感的伟大。这些饱经战火九死一生的老人，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感染着我们。

退休村干部、77岁的林守玉和75岁的林守森始终陪我们走访，他们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感动。

91岁的林崇福依然高大魁梧，腰板挺直，耳不聋眼不花，没有常见的老人斑，话说当年慷慨激昂，走起路来轻捷利落。81岁的林清德住着几间低矮的草房，他的小院里种着冬青、月季、兰花、桔子和葡萄。老人不识字，但他懂得美，他在贫穷里种植的是一种情趣，一种希望。我们走进83岁的林九彬家，这个孤寡老人正和五个老人玩扑克，他们让我们感到了充实。



渊子崖抗日烈士纪念塔

我们也感动于生命的奇迹！84岁的林九席曾被敌人刺入胸腰3刀；81岁的林凡秀被鬼子击穿了胸膛，又砸上石头；74岁的王延智脖下一刀胸上两刀，伤愈后他参了军，鬼子又在他腿上留下了一个伤疤；83岁的林庆彬全身有42块弹皮，一条腿粉碎性炸断了。这些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老人居然能够健康长寿地活下来，谁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徘徊于时间的隧道，我们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面对老人们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听他们细说往事的枝枝叶叶，我们怀想那100多个永远鲜活的灵魂，耳中鼓荡着渊子崖村这段滚烫的震古烁今的黄钟大吕，我们分明触摸到我们民族之躯的脉搏，感受到了像这鲜血染透的土地一样深厚的民族情感、尊严、性格、神圣。人民和人心永远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永不倒的长城。屈原诗说得好：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怨。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既魄兮为鬼雄。

—

冯干三区长是昨天深夜离开渊子崖村的。村里人管冯区长叫老冯，老冯上半夜给大伙讲故事。老冯很会讲故事，比如西边3里地大白常村的王璟，明朝做过左都御史；比如东北十几里地的大店镇的庄谦做过八府巡察。这两个老乡亲是当时朝廷的重臣、能臣，也是地方上世代敬重称道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谁个不知？可老冯能讲得让人百听不厌。老冯常讲的还有岳飞、杨家将，也讲西安事变、台儿庄大战。后来老冯就讲到当前的形势，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日军集合了5万多人的军队扫荡沂蒙山，实行什么“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一切抗日力量。他要大家小心防备小梁家村汉奸队趁机报复。

大约还在一年以前，也就是1940年，村里人就常见一个三十五六岁，长得高大英俊的男人来村里活动，很快和村里的年轻人混得很熟，后来人们知道他叫冯干三，是共产党板泉区的区长。这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村民敬佩他的学问、豪爽和胆气。不久村里就住上了队伍，先是山纵二旅的一个营，后来是抗大工作团。渊子崖村地处沭河东岸，在周围是个大村。村民大都姓林，在这个村子已经生活了几百年，现在已繁衍成九大支。民风淳朴，剽悍正直，早些年打土匪数这村顽强勇敢。1927年，有伙土匪来抢劫被捉住了，就被人们铡去了头。村子里没有地主，1500多口人的日子都差不多。青壮年有不少人常年到外村地主家打工，另外会斲木轴、擀面杖的人也不少，扎彩花、轧油也是他们的传统手工艺。

渊子崖当时属临沂县板泉乡，亦属中共沭水县，距板泉崖3.5公里。村西为平原，另外三面为小土岭，南北各有一条大沟，南面的叫做葫头沟，北面的叫北大沟。北面还有一处春秋遗址，当地人叫做金锁城。这样的地理条件，易守难攻。

抗战以前，土匪猖獗。渊子崖人为抗击土匪，购置枪炮，延请药师，修筑围墙，曾在1927年6月23日击退大股土匪，英勇之名远播四乡。

渊子崖村子虽大，却只有一条东西大街，南北街短，到处是小胡同。沿村修筑的围墙又高又厚。南北墙紧坐在沟崖上，墙内有狭窄的更道与各胡同相连。东北角大圩子外面又有一个小圩子，林秉标、林秉夺近支多居此处。东南角铁沟崖王姓居地也建筑小圩子。围墙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双扇大门，能走老式木轮车，夜晚关门加栓上大木杠，此外又有几处小角门。围墙四周建置了大小炮楼10座，墙角有瞭望孔，又搭脚手架，供巡逻用。

抗战爆发后，渊子崖处于敌我交错的拉锯区，其西为敌占区，东为中共滨海区的根据地莒南县。其时，鬼子汉奸常来扫荡掠夺。其西北方向的小梁家鬼子据点的汉奸更是常来派捐派款，一些地主、土匪武装也打着“抗日”旗号横行乡里。

八路军的英雄行为与渊子崖的抗暴抗匪斗争精神一拍即和，区公所也不时设在这里，年

底还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为了支持八路军夜间活动，村里还响应号召杀了狗，把围墙扒出好多能出入的窟窿。

1941年3月8日，抗日根据地的八大剧团在渊子崖汇演，这是渊子崖前所未有的大事。400多名文工队员住到各家各户。为了保证演出成功，部队派出了一部分战士作保卫，敌人未敢轻举妄动。各个剧团都拿出了最高水平，连着演了15天的大戏。《雷雨》、《李秀成之死》、《东京工人》、《七擒孟获》、《自由魂》，看得人眼花缭乱，兴奋不已。从古到今，哪有这么多的剧团到一个偏僻小村汇演的？四乡八疃的乡亲们涌到这里来看戏，这很让渊子崖人骄傲，也让外村人羡慕。那些个日子，村里白天黑夜沸腾了，多么热闹啊，姑娘小伙都不着家，争着为剧团做事。有的演员嗓子哑了，乡亲们就为他们煮槐米茶和柏树叶水喝。敌人可是恨透了，有几次趁着月色来偷袭，都被打跑了。

汇演以后，渊子崖抗日热情更高涨，参军的男女青年不少，村里也成立了自卫队。林姓九大支分为24个排，分支支长就是队长，平时值夜岗，战时各支分头把守各段围墙。在板泉区委领导下，渊子崖抗粮抗捐搞得尤为突出，为周围村庄作出了表率，也成为日伪的眼中钉。一般情况下，汉奸来要什么都不给。

农历十月二十左右，小梁家的汉奸队在白常村召开各村庄长会，林凡义、林庆忠请示区里，不让去。村里便派林兆岭、林崇义两人去开会，以便了解情况。下午汉奸队留下崇义放回兆岭，无非要钱要物，村里坚决抵制。十月二十九，汉奸队长梁化轩纠集4个大队300余人包围渊子崖，武力威逼村民拿钱拿物，村民自觉上岗保卫村庄，双方互有射击，亦不敢恋战。

老冯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回忆，也引起了警惕。不过人们对斗争还是充满信心。既然已经同汉奸对着干了，就得干到底。

差不多有半夜了，老冯几个人提出要走。这些日子他们总是这样行踪不定忽东忽西的，一夜之间换几个地方睡几回觉，几个年轻人恋恋不舍地站起身，两个年轻的村长林凡义、林庆忠悄悄打开围墙的小脚门，老冯几个高大的身躯就没入茫茫夜色中去了。这时候，时间也已划到农历十一月初二，离鬼子突然包围渊子崖还有七八个小时。

二

这是一个平静安宁的早晨。

冬天的太阳步履姗姗，在遍地热烈亢奋的鸡鸣中，

阳光温柔地照耀着这个古城堡一样的村庄——高大结实的围墙四周有许多炮楼；胡同勾连，曲曲折折地通向一座座草房宅院。霞光中，村人喜植的松、柏、槐、柳和银杏树更显得挺拔伟岸。宿在杂树上的鸡们飞落到围墙垛口上散步，而爱飞的鸟儿则快乐地盘旋飞翔。村的南北两面紧靠围墙的是两条宽阔的水沟，如果是夏天，北面和东面岭上的水就会顺沟而下，而现在差不多已经干涸了，有几只野鸭子在那里戏闹。

村里的炊烟还没有升起，冬闲日子里，农人的早饭用不着心急，倒是男人们忙着照料心爱的牲口吃草，而妇女们总是先侍候好了孩子再去操持饭食。伴着牛羊的叫声，渊子崖的这个早晨仍然以它惯常的节奏和频率开始了。一些人到村外地里推土送粪，打石头，还有一些人忙着赶北面的刘庄集。谁也没有料到，战争之神正悄悄走近渊子崖，灾难巨轮正在向这个毫无防备的村庄碾压过来。

最早的枪声是从五里之外的刘庄集方向传来的，起初渊子崖人还以为是刘庄集又出了事——1938年农历五月初二，鬼子在这里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了283个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是不久人们便从各个方向看到敌人的部队是奔着渊子崖村而来的。

“汉奸来啦！汉奸来啦！”村子里响起焦急地呼喊声。

村长林凡义听到喊声突地窜出家门，跑到北面围墙跟向北张望一阵，就见二三里之外有大股部队向这里奔来，他心里格登一沉，心想不好了，这么多汉奸来，肯定是又来报复的，得赶快通知乡亲们。

林凡义长得五短身材，白净面皮，双目炯炯有神，虽然只有24岁，倒是性格稳重沉着，做事果决干练。这会儿也不及多想就近来到林庆彬家，对正要吃饭的庆彬说：“汉奸又来喽！”庆彬赶早集回来不久，听凡义说得突然，心里一个愣怔，一边去墙上摸枪一边说，“我刚从集上回来没见着汉奸，怎来得这么快！”凡义说：“谁知道呢，这里头有道道。你赶快招呼周围这岔眼人家上墙，我去吆呼别处的人。”二人一起爬到高处看看，看见敌人从几路包抄过来。

正在林凡义忙着通知人守墙的时候，村里已有许多人发现了敌情。

林崇洲和儿子守森往地里送粪，送第三趟回来的路上，看见刘庄集方向烟尘滚滚，爷俩都觉着出了事。守森说，你先推车子回家，我到岭顶上看怎么回。守森撒丫子跑到岭顶上一望，只见黄乎乎的队伍跟水头似地向这里涌来，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马队，再后又是步兵。心知可能是鬼子，便边喊边往回跑。在村外干活的

人也掉头往村里跑，有人把木轮车也擗到外边了。进到围墙里，守森正关着围墙门，就听见门外叫门声，看看是岔河村的7个买花生的要进圩子。守森说，汉奸来了，你们赶快跑吧。众人说，跑也跑不了啦，让俺进去躲躲。守森放开门让他们进来，自己也往家里走。一路上人来人往的。各家的男人都扛着家伙上围墙。回到家里，他爹递给他一块饼子说，饭也顾不得吃了，快拿家伙走吧。爷俩出门又遇到许多人吆喝着上墙去。

这里凡义离开庆彬后便各处喊人上架子、上圩墙，谁知渊子崖人心齐，一遇到什么灾难往往男女老少齐上阵。这会听说汉奸来了，各家十七八岁的男子都上了阵，有火器的拿火器，没火器的随便抓个铁锨、铡刀什么的。鬼子到来前，围墙里面架子上、炮楼上都站满了人。各支长督促自己手下村民监视守卫。9支支长及守卫位置为：东面林凤鸣、东北林庆荣、北面林九臣、西北林清义、西面林凤生、南面林凤楼和林守年、东南林崇斌和林九树。炮楼上的人也在架炮支枪。

五十多岁的林崇福手拖一根钢叉，嘴里骂骂咧咧的：“哎他娘的，还怕他个怕死的汉奸不成？不揍他个龟孙他就老不叫你安稳。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土匪来劫庄子，硬是叫咱打跑了。有个土匪冲过来，我猛丁拦腰抱着了，这家伙拿刀扎我手，我就是不撒手，使劲勒他，就把这货的腰硬给勒断了。”边上的青年听了都觉解气，跃跃欲试的，凡义看了心里又是感动又是忐忑不安。

正巡查着，副村长庆忠，还有清杰、庆海、庆雷、庆会几个人急火火地来找他。众人交换了情况，就听见枪声已劈劈啪啪地响起来。再一看了不得：前边的敌人正沿着北大沟急速南下，后面的骑兵也向东展开，再后面的大股队伍拉着4门大炮赶过来。这显然是日本鬼子，众人立时懵了，心里慌慌的，好像浮萍似的没有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大家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说：“肯定是汉奸把鬼子勾来报仇的，千多个鬼子有大炮有机枪，咱就有几个土炮土枪，怎么对付得了啊！”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区里留下没走的赵同、区文书王乐宪、秘书小李也过来了。凡义劈头问道，见着老高了吗？老李说，老高赶集去了，这会儿可能还没回来。

众人听了，都把目光盯着凡义。凡义此时心潮难抑，许多个想法在脑子里翻腾。他们只有靠自己了，渊子崖千多口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啦，他怎样才能保护善良的乡亲呢？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双泪直流。他咬着牙说：“是祸躲不过，躲过不是祸，鬼子已把咱包围了，咱想冲也冲不出去了。不打，鬼子也不会放过我们，要是等死，咱渊子崖人宁死不当孬种，不如杀他个痛快。”庆忠接话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好拼个你死我活。”凡义又说：“东南上驻着山纵二旅的队伍，打起来他们肯定来支援咱们。咱得守住圩子，坚决不让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咱现在先不打枪，等鬼子靠近再打，节省着点弹药。”

敌人开炮了。凡义、庆忠脱去棉衣，手提大刀分头各段检查。围墙四周脚手架上的人都伏在墙头下，炮楼上的人忙着装药，凡义这里嘱咐几句那边安排几句，他没有想到，乡亲们竟会如此镇静地严阵以待。

雄鸡高歌

张方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军区保卫部侦察队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临沂城内的敌情。

临沂，是鲁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经常驻有一个师，不仅能控制东西的黄海港口，而且可以控制沂蒙山区。日寇侵占临沂后，在调集重兵镇守的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的头目名叫高桥，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岁，却是个出了名的中国通。他除通过宪兵队、特务系、警察局控制驻临沂城的日伪军和伪政权之外，还集中主要力量，采取各种手段，窃取我党我军的情报，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敌斗争，山东军区抽调了我们几位搞过敌工工作的同志，建立了侦察队。开始，我们主要是靠化装侦察，例如巧装改扮成小贩、行商，伺机插入临沂城内，在酒馆、饭店、集场、赌局等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搜集情报。这种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也摸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情况，但不系统不准确。特别是一些重要敌情，根本就搞不到手。再加上我们情报处的同志有的是外地人，在出入敌伪关卡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麻



莒南县大鸡烟厂旧址

烦。记得有一次，我到相公侦察，途经翟家店子，恰好遇到汉奸盘查行人，在检查完了我的良民证之后问道：“哪里人？”我告诉他：“是相公的。”他又问：“庄长是谁？”我又爽快地回答出了庄长的名字。他眨了眨眼，接着又问起了庄里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就有些吞吞吐吐了，幸而遇到了一位在伪乡公所里办事的熟人，由他疏通，才得以解围脱险。

这件事发生后，我深深地感到，化装侦察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漏洞太多，危险太大。能不能寻求一条更好的方式了解掌握敌情呢？这时，我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为进行工作的掩护，那么，我们能不能搞点职业掩护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情报处，我们几个同志一商议，都认为是个好办法。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漓。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我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我们根据地有的是烟。俗话说得好，亲友见面，酒烟为先，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我们滨海地区的农户，原来就有种黄烟卷纸烟的习惯。每到烟叶成熟的季节，他们就用地机子制成卷烟到市场上出售，也曾流入过敌占区。为了利用卷烟结交日伪，探取敌情，在莒南县的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上，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卷烟买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和他们建立供销关系，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供应给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掌握敌情。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个联络点，我们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妻室子女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为职业掩护，开展对敌斗争。按照当时的分工，我是负责联络工作的。因此，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临沂与十字路之间，把一箱箱的纸烟从根据地运到临沂城外，再把敌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由临沂带回根据地，有时也在城附近落落脚，住几天，分别向敌工人员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总结交流情况，研究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措施。这种以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绩。张玉卓首先认识了汉奸队的一些小头目，然后又通过他们逐步靠近了日寇和汉奸的一些头面人物，探取了许多真实可靠的情报。记得有一次，张玉卓到日本宪兵队去，从敌人的交谈中了解到日军驻临沂司令官川本，正在集结日伪军到汤头一线扫荡。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滨海地区武装部门迅速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调集了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沿途设伏，袭扰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果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过了沂河大桥，就不断遭受我小股武装的袭击，几乎是“庄庄枪声响，村村地雷鸣”。敌人行进到白塔时，遭到我地方武装的强烈抗击，走在前面的汉奸队被我全部消灭，队长被我击毙。敌军且战且走，一直到下午四点才到达汤头。川本传令休息之后，敌人就成群结伙地到汤头温泉里去洗澡，谁知一进汤池，我们布在水中的地雷就接二连三地爆炸……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从农户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有些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太差，日伪军中比较高一级的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5月，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

兴建烟厂的决定下达之后，我们迅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在莒南十字路北的扁山脚下选定了厂址，派人到上海购买了卷烟用的罗纹纸和制烟用的香料。聘请了技艺比较高超的卷烟师傅，招收了一百多名卷烟工人。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我们共同商定了一条起名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名字要通俗，含义要深刻。按照这个原则，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几个名字。在场的同志都发了言，唯独孙鲁光同志未出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

的纸一举，一只雄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高喊：“好！”没容我们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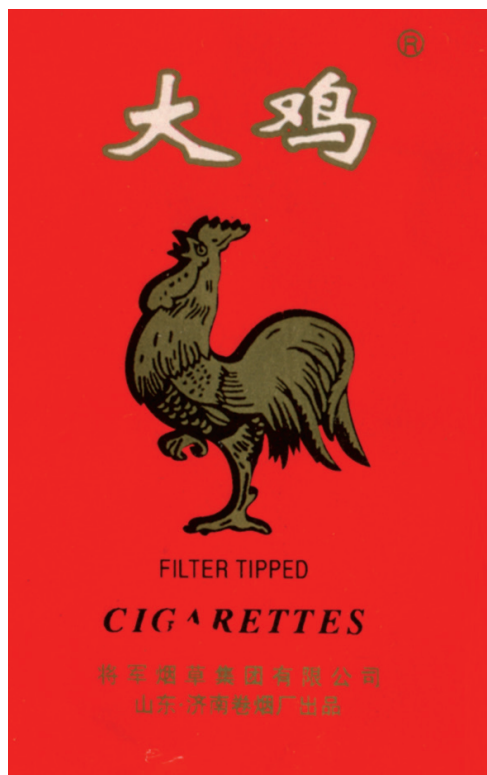
阴云漫天雾重重，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我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自然叫“大鸡烟厂”了。

正因为大鸡烟厂是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从投产的那天起，职工们就把生产香烟和争取抗日斗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多生产一箱香烟，就等于多在敌营中投放了一颗炸弹；多生产一支香烟，就等于向敌人心中多插了一把尖刀。”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劳动，生产指标一再突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这些自己生产的香烟，除留下一小部分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大部分都运进了敌占区。重点是临沂城里。由于大鸡牌香烟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很快名声大振，博得了敌占区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仅日伪军政人员争买大鸡牌香烟，就连川本、高桥也都偷偷地把大鸡香烟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时还买来供奉给自己的上司。

通过大鸡香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的上层人物，活跃在他们的中心，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是我们的敌情人员白步春，从外地回到根据地后，了解到他的侄儿在临沂当伪军中队长，便主动提出去做他侄儿的工作。经我们研究后，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改名王成，以出售大鸡牌香烟为名，打入临沂城内，迅速靠近他的侄儿。开始他在侄儿身旁活动，后来就住在侄儿的家中。经过长时间的说服教育，终于把侄儿争取过来，在汉奸队内部建立了一个小情报站。王成通过这个情报站，不仅多次探清了川本、高桥对沂蒙山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摸到了不少隐藏在根据地内部的日伪特情，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沂蒙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和消除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隐患起了重要作用。二是，驻临沂汉奸支队长孙永俊部装备优良，既是汉奸中的骨干力量，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鹰犬，日伪军的情况，他知道得比较多，了解得也比较早。要想搜集到一些绝密情报，这人是个重要线索。为了尽快地利用这条线索探视敌情，我们选定了孙永俊的本家孙连举打入敌营。孙连举是个不满18岁的青年，为人精明能干，办事稳重老练。他接受任务进临沂后，先和我们摆烟摊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头，又以卖香烟为名来到孙永俊家。当时，孙永俊正需要心腹之人，看到本家孙连举自动投上门来，自然非常高兴，就把他留在家中当杂务。由于孙连举聪明能干，很快取得了孙永俊的信任，慢慢地变成了他的贴身警卫。从此，孙连举就经常跟随孙永俊接触敌伪中的重要人物，出入在敌伪军、警、宪核心机关，并通过合法身份，促使孙永俊和我们的地





下工作人员结拜了把兄弟。这样，敌营的许多重要情报，就是通过人情往来，在吃喝玩乐中落到我们手里。1944年5月日寇集结陆、海、空军近万人扫荡滨海地区的情报，就是从孙永俊的口中得到的。我滨海军民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动员，迎击敌人。何万祥连以81个勇士重创1500兽兵，写下了抗战史上壮烈的一页；二十三团二连，在安东卫战斗中，顽强抗击了七倍于我的敌伪，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被命名为安东卫连；老四团钢八连连长鄢思甲带领全连痛击顽敌于柘汪，经过20多天的恶战，迫使敌人不得不结束这次扫荡，我军则乘胜追击，连克十几个据点。在总结这次反扫荡胜利的经验时，军区首长在表彰作战有功部队的同时，还特别表扬了我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准确及时”。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临沂城内4000名拒降伪军，虽然被我彻底歼灭，但一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却潜伏下来，敌人的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战略区都向临沂派出了特工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加强领导，彻底搞清临沂城内的敌特活动，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在临沂城内南关大街上设立大鸡烟厂临沂分销处，并确定由我担任分销处的经理。从此，我们又继续利用大鸡牌香烟联络各方人士，调查了解情况，查清了隋玉贞等一批暗藏的特务分子，揭露打击了他们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保障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后记

1945年秋，烟厂随部队迁到了莒南县大店镇。1946年春烟厂先后从上海购进3台小型卷烟机，日产卷烟2000余条。当时“大鸡”烟曾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烟之一。1948年元月，华东局决定将部队经营的卷烟工业移交地方政府统一管理。1949年9月建国前，省政府批准将“大鸡”烟这个牌号转到济南烟厂生产。该品牌一直使用至2006年11月。“大鸡”香烟已于2006年11月停产。

滨海十年 (连载)

谷牧



谷牧（1914.9—2009.11），我国经济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节选自《谷牧回忆录》。

这里说的“滨海”，是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是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山东东南和江苏东北沿海一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起初有莒县、日照、莒南、临沭、郯城等县，到抗战胜利时，根据地范围逐步扩展为南陇（陇海铁路）、北胶（胶济铁路）、东海（黄海）、西河（沂河，有时也指运河）的广大地区，还包括江苏的新浦、海州、连云港、赣榆、东海等地。滨海区曾分设滨南、滨中、滨北三个地委，拥有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当时有500多万人口。

这个地区，西依沂蒙山脉，有五莲、甲子、马陵、苍山等山区，可与敌寇周旋；东临大海，海岸线长达700余华里，可开辟海上交通线，与苏北和华北革命根据地及上海、东北地下党组织联系，而开展海上贸易也成为根据地战胜敌人封锁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我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省、地、县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曾在这里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迎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于1938年春进入这个地区，1949年底离开。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同这里的广大人民一起，度过了战斗的岁月。我先后在东北军搞兵运，在山东分局机关和地方政府工作，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曾任山东军分委秘书长和分局统战部长，还担任过山东分局秘书长，滨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华东局秘书长，滨海直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等职务。这里的人民用高粱、玉米养育了我；人民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支持革命战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严酷炽热的斗争也锻炼了我；我对这里的人民和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

一、从“地下”到“地上”

1940年9月，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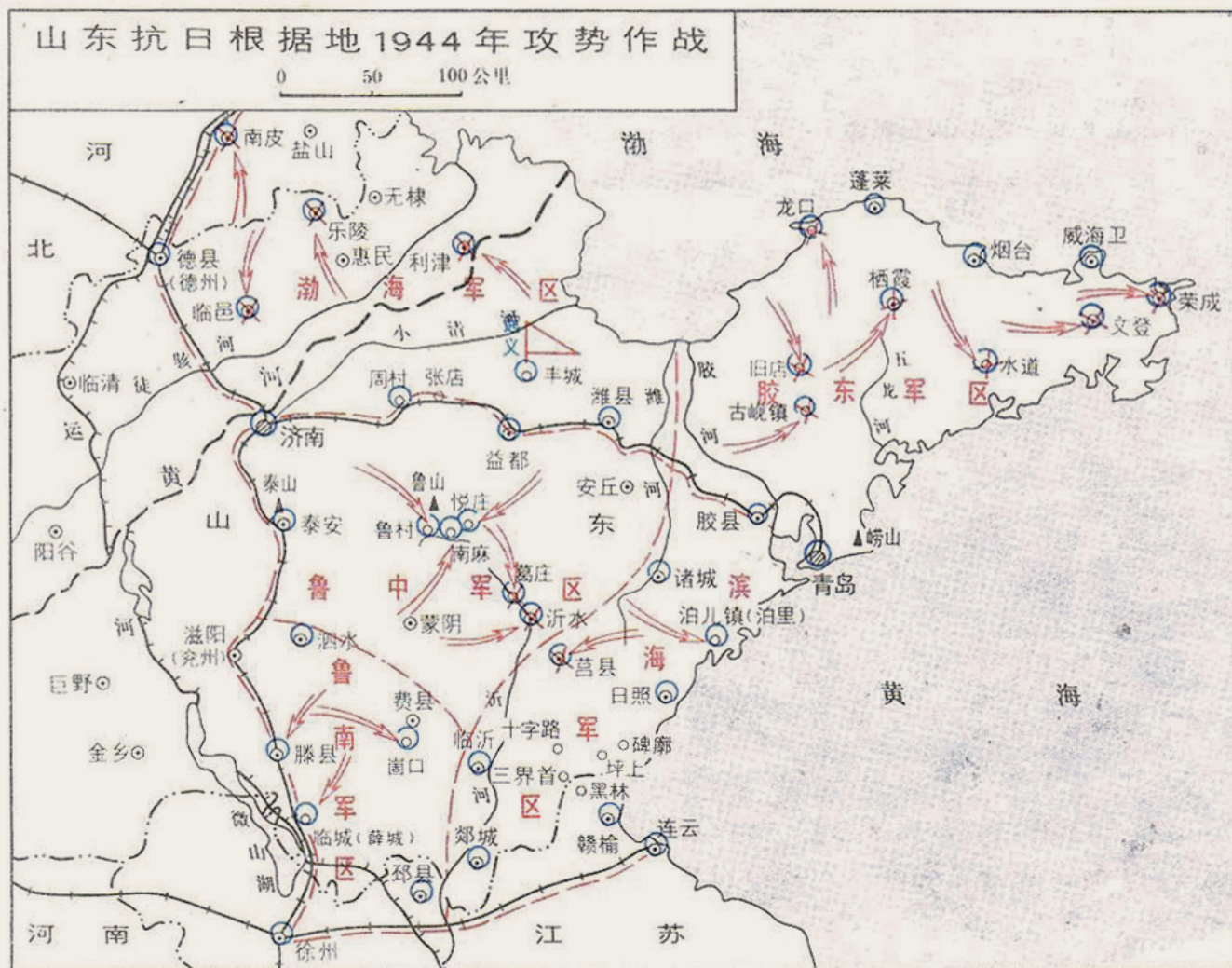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后，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山东党组织，高举抗日大旗，组建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当年12月又改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将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统一组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翌年3月，罗荣桓同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到达滨海，进一步壮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全省统一的人民抗日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成立。分局机关、一一五师师部、战工会一起行动，成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指挥中心。

起初分配给我的工作岗位是山东军分委秘书长兼分局统战部部长和一一五师统战部部长，以后又让我兼管了分局秘书的工作。

到分局机关以前，我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此时由“地下”转到“地上”，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方法都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我认真观察学习，很快就熟悉了。

我在分局机关的任务是参与政务管理事务。重要工作之一是掌管机要、起草文电以及一些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联络、调研工作。当时分局和军分委的重要电稿，有些由朱瑞、罗荣桓同志亲自动手写，大多数则由我根据他们的意图起草。我发现语言文字居然有如此不同的奇妙功能，用以写小说，重在形象化，似不嫌其长；用以写电稿、则重在高度概括，力求其短，要用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准确鲜明地表达一个重要事件、一次重要战斗或一项工作部署。文章之道的学问实在不小。我还主编分局内部刊物《山东工作》，拟定选题，征集稿件，编辑印发，事情很具体，花费精力不少。作为秘书行政部门的主管，还得料理机关人员的生活。当时的生活当然比现在简单，但是限于环境条件，许多事也不好办，保障伙食标准就不容易。我同膳食科的同志共同努力，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饭，可能情况下吃得好点儿。分局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许多人是功绩卓著的老革命、老红军。我不仅要处理好本部门同他们的关系，也要协调好他们同分管部门之间的关系，颇费心思和工夫。我们紧紧依靠分局首长的领导和支持，谨慎谦虚，注重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也使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到分局工作不久，从山东分局的《告前线将士书》上，得悉山东部队12个支队中，至少



有5个支队的负责干部，都是我的同学或在东北军学兵队时的战友，如汪洋、王一平、张岗、韩去非、李耀文等，还有的同学如曹漫之等担任地方的专员等职务。他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为发展和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为此感到特别高兴。而与他们的往来与书信，也为我协助领导同志了解各地情况多了一些渠道。

分局机关对理论学习抓得比较紧。党的组织生活每周一次，每周还有两个半天的理论学习。朱瑞、罗荣桓同志的理论造诣很深。我决心利用这个良机认真读点儿书，以弥补在此之前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未能系统学习理论的欠缺，硬是啃了几本马列主义原著，写了几本学习笔记。

当时，我曾产生过以自己地下工作的经历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我在北平左联工作时，写过一些短篇，发表在左翼文学杂志《泡沫》、《浪花》和其他文艺刊物上。还有一个中篇小说的初稿，曾请北大进步教授吴文祺指教。他鼓励我一定再下一番功夫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因为我不久就到东北军工作，抗战爆发后继续行军战斗，未能付诸实行。到了分局机关后，很想挤出点儿时间把它完成。后来，形势剧变使这个计划搁置，最终完全落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种写小说的念头是不切合实际的。

1941年1月，就是我到山东分局后的第四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发动了抗战期间第二次反共高潮。滨海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李延修、许树声、尹鼎武部和“万仙会”猖狂进犯我抗日根据地。3月，曾投机接受我军改编的地主武装朱信斋部，在日照县黄墩叛变，一夜之间拘捕我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200余人，杀害了我党派到该部任政委的董振彩同志等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20余人，使我们丧失了两个区、九个乡的根据地和两个区中队的武装力量。

党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北盐城重建以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的新四军军部，向各根据地通报了皖南事件的情况和我党的斗争对策。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各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两面作战，坚持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3月，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山东纵队第二旅和县、区武装，在赣榆县发动了历时六天的青口战役，攻克八个日伪据点，歼敌1000余人，缴了800多条枪。4月，山纵二旅和地方武装多次痛击李延修、朱信斋等反动顽固派，把他们赶到莒（南）日（照）公路以北，还恢复了滨海区与华中、胶东根据地一度中断的海上交通线。

二、留田星夜突围

在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日寇华北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与汪精卫密谋，计划乘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 and 地方部队。1941年11月初，敌酋畑俊六亲自到临沂坐阵，调集了日军四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及汉奸武装共5万余人，分11路从临沂、费县、蒙阴、平邑、莒县向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驻沂南县南部的留田扑来，形势十分紧急。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1月5日下午，罗荣桓同志在沂南县的留田附近钮家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敌不意，趁敌之虚，向敌军指挥部所在地临沂方向突围转移。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11月5日傍晚，分局机关在东汶河岸集合开始行动。随同分局机关行军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他在大革命时首次来华，投身中国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翻译。1931年，他重来中国，在上海与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8年，他去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到新四军军部随军采访。皖南事变后，他写文章在国际上痛斥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以后又由新四军转到滨海区和一一五师师部。他在师部住了一个多月，同朱瑞、罗荣

桓、黎玉等同志会见，做了广泛采访。日寇大扫荡开始后，罗荣桓同志考虑到主力部队作战频繁，希伯同志留在主力部队不安全，让他随分局机关行动，指派我负责接待安排。这次突围，他就和我一起。

当夜，大雾弥漫，我们的队伍凭着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寂静无声地急行军，迂回穿梭冲出敌人包围。一路上不能讲话，先行队伍为了给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就在三岔路口用石灰做出标记，队伍在行进中，有时需要后头的人扶着前头人的背包行走，以免迷路。我们看着敌人在山头燃起的照明大火，听着敌人的“铁壁合围”，在次日拂晓安全到达预定地点。这时，敌人一窝蜂似地涌进留田，但是那里空空如也。我军则继续向西转移，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不费一枪一弹，山东分局及省直机关5000余人胜利突出敌军重围。

当把这个好消息通报大家时，希伯同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他提出，要立刻给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赞颂这次突围领导者罗荣桓政委的“指挥神奇”和山东抗日军民的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欢呼这个奇迹般的重大胜利。希伯同志身材魁梧，总用打字机写文章。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以腿当桌用打字机写出了题为《无声的战斗》的稿子。他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套红登在《战士报》的第一版上。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的：“畑俊六总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大发雷霆，训斥他的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军官们重重包围、数万只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今天吃饭的时候，应当给他们来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希伯的这篇文章，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留田突围”的成功，挫败了日寇的“铁壁合围”的初步计划。然而敌伪的11路扫荡部队并没有撤走，而是以百倍的疯狂，继续对我们进行“扫荡”。我抗日军民经历了山东抗日史上最惨烈的一系列战斗。侯庆修、毛大鹏、刘成武等同志所著《碧血青山——一九四一年冬季沂蒙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寇大扫荡纪实》记录了这段历史。这本书是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他们采访了许多亲历者，也包括我。书中描述了我参加或指挥的多次战斗。我这里只回顾一段可以让后人引以为教训、也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的战斗，以及我受伤后的经历。



留田突围（油画）

我为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捧骨灰

梅现华



今年5月29日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30周年纪念日。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我出生于平邑镇大南泉，现为平邑县联通公司职工。1978年入伍，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服役，担任军旗手及礼宾任务，曾多次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多国元首的检阅。

宋庆龄逝世后，全国人民处在极度悲哀中，在她的住所设灵堂，我被选为礼兵。当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前来参加吊唁。5月30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下半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从5月31日到6月2日，首都各界12万人和在京的4000名外宾沉痛吊唁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并瞻仰她的遗容。6月3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近万人出席了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胡耀邦同志主持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6月4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骨灰移送上海安葬，我亲手捧着老人家骨灰盒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委托，乘飞机从北京一起前往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安葬。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王震、彭真等在北京西郊机场送行。我圆满完成了礼兵任务，受到北京卫戍区一师嘉奖。



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西郊机场为宋庆龄同志送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灯·扛阁” (下)

张铁民

“扛阁”来自敬佛理神

“扛阁”这种民族娱乐形式，在全国分布极为广泛，仅进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河北、山西、内蒙、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甘肃、青海、宁夏、福建、广东等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而且名目繁多，有抬阁、挠阁、脑阁、高台、高景、高装、背杆、背棍、铁杆、铁技、芯子、二节、飘色、迎会、节节高等名称。形态也千差万别。就高度而言，有两节、三节甚至多达五节的；就上下人数而言，上节有1人、2人、3人的，有的多达十余人。下节有1人、4人、8人、多人不等。如浙江浦江的“迎会”，阁上的童男童女有16人之多。“扛阁”的数量一般在8“扛”（台、板）以上，多者可达十余“扛”；就表演而言，有的只是巡街表演，有的却要演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戏曲人物，如“麻姑献瑞”、“八仙过海”、“许仙借伞”、“昭君出塞”、“水漫金山”等，文武兼备。阁上儿童、阁下青壮年完全采用传统戏曲的穿戴和化妆手法，一丝不苟，精美绝伦，装扮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俊俏无比，极具观赏品位。因此，不论何处的“抬阁”，每当鼓乐齐鸣，盛装出场，总是引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各地的“抬阁”大多产生于明末清初，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尽管各有各的起因，但总的源头应当是这样的：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各地对神仙佛祖的信奉、膜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礼佛敬神的活动中，有一种是造一座四方高台，将寺庙中的神佛塑像请出安放其上，再罩上扎制的楼阁，抬着巡街，为百姓示福、送福、祈福祛灾。后来神像换成了扎纸，进而变为用纯真的童男童女装扮，用意是儿童未受多少嚣尘的污染，天神不会憎恶，交流起来没有隔膜。“竿”的高度，也



吸纳汉代百戏“高竿”的技巧，逐渐增加，为的是高处易与天神交结。嗣后，经过不断地衍化，渐渐变为集造型、彩扎、杂技、音乐、舞蹈、戏曲艺术等于一体的文化娱乐项目。

临沂河东三官庙村的“龙灯·扛阁”的源头，目前能够追溯到的，大约在距今一百七八十年前。据村中老人讲：那时的三官庙村叫朱藩村。村子紧靠沂河，由于官府河防不力，雨季洪水暴发，经常漫溢或决堤。当地有谣谚：“开了江风口，水漫兰山走，老婆孩子顺水流”，就是沂河水患的真实写照；其他季节又往往久不落雨，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三官庙一带因此水旱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官府仰仗不上，人力又抗拒不了天灾，只得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村里便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三官庙”。庙内供奉道家尊奉的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仙。依据道教的说法，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免厄。庙内四季香火不断，村民们虔诚地祈求“三官”为他们除厄赐福，带来四季平安。

有一年又逢大旱，村里和四乡八道的百姓，相约到“三官庙”求雨。人们扎起一条硕大无比的青龙，敲锣打鼓，狂舞起来。引得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得水泄不通。许多人把孩子扛在肩上，或举过头顶，争相观看这神圣的场面。据说，“雨”还真得被求来了，接连几天普降甘霖，旱情解除，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从此村名也改成了三官庙。一次灵验，求雨、舞龙便成为旱情显现时的常规。后来，受有人肩扛、托举孩子的启发，又制成了“扛阁”，和青龙一同舞动。不知从何时起，又把民间故事“龙戏蛛”的因素引了进来，增添了一个“擎蛛人”，于是“龙灯·扛阁”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虽然由于没有查到文字记载，上述说法并不完全可信，但是从这宗口碑中，我们还是可以隐约地找到古代“雩祭”中的青龙和伴龙田畷夫、儿童的影子。比如，老艺人说，他们村的“龙灯·扛阁”源于求雨。敬的是“东海（方）苍龙”。还说扎制的龙必须是“青龙”。尽管艺人们说不出更其详尽的来龙去脉，但我们还是应当相信，“龙灯·扛阁”绝不会是三官庙的先民凭头脑臆想出来的，也不会是从天而降，它必定有自己的渊源，有自己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传承序列，不过是因为众多复杂的原因，现在的人们说不清罢了。

清新别样 风格独特

三官庙村“龙灯·扛阁”的艺术特色十分鲜明。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把“龙灯”与“扛阁”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节目更加丰富多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既充溢着龙灯所具有的那种刚毅粗犷、热烈奔放的阳刚之气，又有扛阁所表现的美轮美奂的韵致，刚柔相济，极具观赏价值。2000年，参加“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时，艺术节评委会委员、广东艺术研究所所长杨敬明，看过三官庙“龙灯·扛阁”后，深表赞叹说：“‘龙灯·扛阁’为当代民间龙灯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它把传统龙灯表演与喜庆民俗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民间文化艺术形式。”

其次是表演套路丰富，精彩纷呈。依照古制，舞龙多由青少年担当。分为两组，轮替登场。每组十人或十四人，其中一人擎蛛，其余分执龙头、龙身、龙尾。八副扛阁，下扛为8名成年人，上扛是8名儿童，装扮成仙童、仙女或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表演时，擎蛛人在前充当导引，大龙紧随其后。基本套路有：

速场：擎蛛人左手扶腰，右手握持“蛛”柄，将“蛛”举过头顶，引领举龙者一拍一步前行。龙举头、龙节、龙尾者，均双手握“龙腿”举至头顶上方，行进中不断扭动“龙腿”，使各“龙节”不停地左右摆动。

站龙翻腾：擎蛛人在行进中，左转身面对执龙头者，右手在上，双手握柄，由左下方经胸前挥向上方，再经右下方挥向上方，如此反复划“∞”字形状，双脚不断后退（或双脚随龙体的翻动原地前后、左右倒步）。与此同时，执“龙头”者双脚大八字步站立，双手将龙头从右下方经胸前上抡，再抡至左后方绕到左下方，经胸前向上抡起，如此反复划“∞”字

形状。“龙口”始终对准“珠子”，作追逐状。与此同步，“龙身”各节逐次错开、绷紧，跟随前节一起舞动，使整个龙体呈盘旋翻滚状运动。“龙尾”随前节划动，每划一个“∞”字形时，均顺势左右小幅度跑动，如龙摆尾。

卧龙翻腾：全部动作与站龙翻腾相同。唯舞龙节者，在划“∞”字形时，从前向后依次将左膝跪地，并继续划“∞”字形。

泼龙：行进中，擎蛛人引领舞龙者从前至后依次将“蛛”、“龙体”划上弧线，使落至身体右下方，右手托住把柄中部，左手压住把柄尾部，使“龙体”贴地（稍离地面），逆时针方向绕场奔跑一周。持“龙身”者须目视各自龙节。然后再一次将“珠子”和“龙体”经头上方划落至身体左下方，同时左转身，顺时针方向绕场奔跑一周。

双窜龙：执龙者围站成半圆形，由擎“蛛”者和持龙尾者引领，同时从两端做泼龙动作（龙尾一侧的人做对称动作），从第四、五节“龙身”下方穿过绕回原位。第四、五节持“龙”者待与自己相邻的一节“龙身”穿过后，分别左、右转身一圈，顺势翻转龙节，划一立圆，然后举起，理顺缠绕成结的“龙身”。

盘龙：在“速场”过程中，擎“蛛”人跑至场中心，左手抹腰，右手将“蛛”柄举起。全体舞龙者随之迅速跑向场子中央，双手高举“龙身”，将九段硬龙节围绕擎“蛛”人，成一圆圈，持“龙头”者，将“龙口”对准“珠子”，作欲吞状。稍倾，舞龙者同时撤回原位，擎“蛛”人原地不动。

龙盘柱：行进中，擎“蛛”人跑至场地左前方，将“蛛”子高高举起，舞龙者随之向其靠拢，把柄竿立在地上，使龙身靠在一起，然后空手走出场地。

扛阁的动作讲求扭、颤、摆。扭是基本步法，其着力点在膝部。颤指的是下扛要上下起伏，轻微颤动，以便带动上扛，产生轻松的跳动感。摆是指下扛要边走边左右摆动，以带动上扛的孩子两臂自然摆动。除此之外，还有“行进步”、“站立”、“交叉换位”等基本动作。

再次是所使用的道具，特别是大龙，与众不同。别处舞龙使用的大龙，一般为7节，展开的长度多在20米左右。而三官庙的“龙灯·扛阁”使用的大龙，是一条长度为50米的青色大龙。舞龙者必须是身躯强壮、膂力过人的大汉方能胜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诸多远古的讯息：青色大龙不正是古代春季雩祭时用过的8丈青龙的孑遗吗？孔武高大又是数千年前生活在现在三官庙及整个沂蒙地区东夷人的显著特点。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三官庙“龙灯·扛阁”的源远流长。

雨露浸润 绚丽绽放

三官庙“龙灯·扛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美丰富的表演套路，赢得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赞誉和热爱。特别是它那“龙灯”与“扛阁”双璧合一的形式，在当今民族民间舞蹈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尤为引人瞩目。更加它蕴涵着大量的古代历史文化讯息，并且在当下为百姓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它在学术、艺术和实用等方面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祭祀文化”是中华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历代统治者为其涂上的种种封建迷信色彩除掉，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表达的主要是对祖先的怀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古代的“雩祭”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几千年强颜恶色的涂饰，最终使它变成了纯粹鬼神把戏。先民们的初始意愿——对天体的认同，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因东方苍龙七宿的出现，而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惊诧与狂喜，却非常模糊了。这是历史文化遗传讯息的缺失造成的扭曲。要正本清源，象“龙灯·扛阁”之类的活化石，就是登堂入室的一把钥匙。从这层意义来说，〔龙灯·扛阁〕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就艺术价值而言，“龙灯·扛阁”的“龙灯”粗犷、彪悍，热烈奔放；“扛阁”精美简约、气韵生动，双璧合一造成了一种十分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养成，与当地的历史、人文、民风、民俗，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传承、弘扬我国古代民间舞蹈文化，对于当代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即令从世俗观念来审视“龙灯·扛阁”，它的实用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龙灯·扛阁”的表演，是一项集体项目，需要近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对于集体观念的养成，是一种很好的催化剂。此外，对百姓强身健体，自娱自乐，丰富文化生活，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促进乡风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有益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民间艺术的瑰宝，它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却并不尽如人意。因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及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传统民俗日渐淡化，“龙灯·扛阁”的活动阵地和机会也逐渐萎缩，以往那种动辄巡行几个村，甚至十几个村演出的热火场面，已不复再现。老艺人年事已高，不能胜任表演。年轻人中钟情于此，因而积极学习、钻研技艺者，越来越少。“龙灯·扛阁”处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所幸，2010年列入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出现了十分可喜的局面。各级政府在财力、物力、舆论宣传等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仰仗新时代雨露阳光的滋润，必将绽放得更加绚丽，结出丰硕的果实。



沂蒙走出的科学骄子

钱勤来



王普先生

我非沂蒙人，然而，我在沂蒙工作了四十余年，沂蒙的一切都令我心驰神往。这种对第二故乡的亲切感，恐怕非亲身经历者是很难有这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的。

于是，沂南人王普先生的生平事迹深深地震撼了我！

王普，1902年生于沂南县依汶镇东贯头村的一个书香之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升入北大物理系本科。1928年毕业后在位于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工作。一年后，到济南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为山东大学）创办该校物理系。1935年，王普考取公费生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留学，在威廉皇家科学院的达莱姆化学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这个研究所是当时世界核物理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1938年，王普取得了博士学位，时年36岁。是年，王普转赴美国卡内基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王普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核物理学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子核裂变的科研成果，就是在那个时期通过实验得出的。到美国后，王普和同事们又发现了铀和钚的原子核裂变时缓发中子的现象。因此，王普被称为是“见证了核裂变时代开始的中国人，也是最先在核裂变领域中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中国人之一”。

这位沂蒙学子，在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努力之后，终于成为当时辉煌的时代背景中核物理学领域中具有最高话语权的科学家之一。王普终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走出沂蒙山的科学骄子。

1939年秋，王普回国，为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北平临时大学物理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普即在1946年重返山大，任物理系主任等职。翌年秋，他又应聘再度出国赴美担任美国国家标准局辐射物理学研究员，并辗转于杜克大学、凡德比尔特大学等大学任教。1956年8月，王普从美国回国，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执教，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期间，虽然运动连连，然而王普先生仍然在培养人才、建立高能物

理研究基地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革”爆发，民族劫难，身心俱摧，王普先生横遭迫害，于1969年1月离世，时年67岁。上苍无眼，天不假年，中国的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一代知识精英、沂蒙骄子，却是如此凄凉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终生热爱的核物理，蒙山无语，汶水东流，王普去也……

在王普谢世四十年以后，当他的身影渐行渐远，王普这个光辉的名字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淹没的时刻，王普先生的儿子王沂光，还有一个叫王任的沂蒙后生，他们偕同几位亲友为王普奔走呼号，搜集遗著，联络故旧，其间的艰辛可以想象。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诸多报刊纷纷报道，一代物理学家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王普的影像清晰地崭露在世人的面前。历史不能忘怀，沂蒙人更不能忘却这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对此，我们深感欣慰，王普先生假若九泉有知，亦当感喟矣！

从王普的成长历程，我们重新回望沂蒙，反观沂蒙，就会感受到沂蒙这一方热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是沂南，是一代智圣诸葛亮的故乡，诸葛亮的诞生地就在沂南的砖埠；也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祖居地。另比如，在现代，沂南还有袁田、袁顺斋父子二人，在沂南界湖创办“长春富贵”京剧四大戏班，历时38年，曾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演出剧目多达120余种。这种文化现象可谓举国罕见，几乎绝无仅有。诚然，正是在沂南，在艰苦的年代，产生了独具沂蒙特色的“红嫂”这一经典形象，至今令我们深深感动。回望沂蒙，反观沂蒙，我们需要郑重提出和全面阐释“文化沂蒙”的概念，“文化沂蒙”还有许多曾经的历史和人物需要我们去发掘、去重现，去思考、总结。

王普，是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走出沂蒙的科学骄子。他走出沂蒙，走向世界，最终跻身于世界优秀的物理学家的行列。这是沂蒙人永远的自豪和骄傲！王普先生堪为后世楷模，也是激励沂蒙人学习的先贤师表。当然，凭心而论，这也离不开沂蒙文化的熏陶。蒙山沂水，人心朴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在纪念王普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深厚的沂蒙文化。



山东大学为王普塑像揭幕

元代武德将军王义美考略

杨春浴



元代武德将军王义美系今平邑县地方镇东固村人。其传略及其祖莹中的《王氏祖莹记》碑文均载清光绪年间《费县志》（东固旧属费县），《费县古迹考》亦有录载。清光绪十二年进士、初任恩县教谕、后为费县崇文书院讲席的杨佑廷依据《王氏祖莹记》碑文所述，参阅《元史》，曾对王义美将军的生平、功业做过认真、深入、严肃的研究和考证。

王义美将军世居东固村。其《王氏祖莹记》石碑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碑文记述其祖莹当时景象，追溯其王氏家族历史渊源时云：“其中邱冢累累，葬者数世矣。始其木之拱把者，今即连抱焉，其来远矣。高祖传曾祖进，曾祖传祖仔，娶本县官庄刘氏，凡三世而生珪……珪娶孙氏，生二子，长曰仁，次曰义美。”由此可知王氏传至王义美已是五世，计其岁月百年上下，可谓久矣。王义美将军之父王珪“性颖悟、温雅，尤精于书数”，是费县的一位官员，“年老致仕”（退休），卒年89岁。王义美将军是其次子，为人有胆气，多智勇，少年时期即有大志，常对人言：“丈夫当以戎马取功名，岂区区垅亩间终其生乎？”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二月，李璫叛元降宋，元世祖下诏讨伐，并命州县招募新勇充实军队。王义美系费县官员子弟，此时便以“质子军”（元制：诸侯将校子弟从军称“质子军”）身份应募投军。同年七月，李璫叛乱被平定。十月，元世祖诏谕“质子军”入侍，王义美便做了元朝的侍卫军（即禁军）。不久，王义美突出的军事天才被其上司发现，即被选拔为“管军百户”的下级军官，并得以进入元朝京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世祖忽



王將軍為吾鄉先達塋在村之東南係元諱塋同諸故
 老土中遺碑記在焉光緒己未邑侯李庶常重修志書
 邑人例得與其事於是采訪先及近處啓上得之移村
 廟中便於摩挲而辨識也費時日力得若干字約略
 成文已載邱墓志中將軍補入人物志而所遺斷碑朽
 之人復砌石楹立以垂示之於戲歷五以百年之久
 堙沒而復見天日茲石之幸耶將軍之靈耶要之飛冥
 有不可掩歟者死潛無能發其光非遇賢邑侯雅意表
 揚好事而好事者亦不獲據碑表二片遠而筆之於書
 也將軍可無憾於九原矣奉戊戌初八日楊伯廷識并書

必烈“亲征叛王海都于北庭”，一直追到距上都万余里的阿力麻里。王义美随驾北征，奋勇作战，攻营俘敌，逾月即建大功。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王义美由管军百户升迁为千户总把，已属元军的中级军官。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军元帅刘深与忙兀台、唆都以舟师南下，合兵追歼南宋二王。根据《王氏祖莹记》中残存文字略串其意，看出王义美参加了这次伐宋南征，当属刘深所部。适逢元军中有一位重要的汉军首领战死，刘帅奉命即以王义美充汉军总镇，并令其指挥战事，并授以重任。他毅然受命，主持方略，施发号令，严申军纪，激励士卒。王义美因身先士卒，指挥得力，战果辉煌，功勋卓著，又被授以武略将军，赐以金符，充侍卫管军、汉军总镇。此时王义美已成为元军的高级军官。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王朝彻底覆灭，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大赏功臣。复授王义美以武略将军，宣命赐虎符，加侍卫管军总管，充汉军总镇。元代军官所佩，有虎符、金符、银符之别，虎符（即金虎符）级别最高。可见此时王义美已成为元朝重要的军事统帅了。

其后，王义美将军继续为国家效力、建功，仍不断受到朝廷的封赏，职务亦步步升迁。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他在其祖莹立《王氏祖莹记》石碑时，文后署名为“武德将军悬带虎符、侍卫管军总管、汉军总镇王氏义美”；大德三年（公元1297年），他为费县邑学立《重修文庙碑》，文末署款为“武德将军、管军总管兼都元帅府镇抚王义美立石”。此碑至清末尚藏费县邑学；大德四年（公元1298年），他又为平邑立《修寿圣寺碑》，其文后署款为：“宣授武德将军、管军总管、都元帅府都镇抚王义美”。

由于王义美将军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征战中，建有赫赫战功，且系朝廷重将，故其逝后皇帝下诏赐以“谕葬”。其谕葬陵园即在今平邑县地方镇东固村东南二里许，浚河之东，亦即是他的祖莹，当时占地20余亩。王义美将军墓前列有石人、石马、石羊等谕葬标志物。陵园内古柏参天，粗可连抱，乡人谓之“谕葬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郁郁森森，庄严肃穆之景象。至清代咸同年间其景象尚为可观。此处与民族英雄左宝贵的家仅一河之隔，三里之遥。据说少年时期的左宝贵对王义美将军非常景仰，他经常约同小伙伴们趟过浚河到王义美将军的墓前瞻仰石人、石马，立志将来也要做一位像王义美将军那样为国效力的英雄。王义美、左宝贵出生年代虽相距数百年之久，然其少年之志，少年豪气何其似也！

王义美将军的谕葬陵园历经元、明、清三朝鼎革

以及外侮内乱的历史沧桑之后，树木伐尽，面目全非。原来方圆20余亩的谕葬陵园，竟全部被瓜分变为七零八落的庄稼地。其世代先祖的累累丘冢，都被风雨剥蚀得只剩下隐隐轮廓，西风衰草，满目苍凉。上世纪50年代初，就只剩下那些石人、石马、石羊颓然裸立，陪伴着昔日英雄的荒冢；断残的龙头碑帽静静地躺在蓬蒿荆棘之中任凭凄风苦雨蹂躏。那时，人们行路至此，或许还能想到这里埋葬着曾经驰骋疆场的王义美将军。至50年代末，这仅剩的可怜的一点历史遗迹——石人、石马、石羊、断残碑帽，竟也被在这里耕种的农户扫地除门，搬至路旁，掀进深沟，有的还被砸断了“肢体”。“农业学大寨”时，村里大搞农田整治，削高填洼，拓展耕地，又将它们全部埋入地下。这次好像没有乱搬乱砸，只是经过整治，道路西移，面貌全换。60岁左右的人们，有的尚能约略记得昔日“谕葬林”的位置。倘日后有人发掘，再略加修复，遗存石雕或许尚可重现于世。至此，王义美将军的谕葬陵园遗迹即在地面不复见到了，所以现在几乎无人提及这位历史英雄人物了。即使东固村的人们，现今也有百分之八九十竟不知王义美是何许人物，岂不令人惋惜？

前面所提到的在元朝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王义美将军亲自树立的那方《王氏祖莹记》石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被掩埋土中。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杨佑廷按照当时村中老人指示的位置重新从地下掘出。此碑有龙头碑帽，其额篆书“王氏祖莹之记”6字，其碑面刊文33行，行78字，6行之后多拾写。碑文内容述其王氏家族定居东固之历史渊源和王义美将军的生平功业。惜其年代久远，字迹漫灭不可辨识者甚多，能辨识者难成完句，仅可约略成文，推其大意。其右下角残缺无寻。为加以保护，杨佑廷约同数人捐资补接所缺右下角，并亲自题志110字，以行书书写镌刻其上。然后将主体碑身移于东固村关帝庙中安放。解放后，关帝庙坍塌废弃，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于其旧址建东固小学。文革时期“破四旧”，《王氏祖莹记》残碑又被人抬走做了建水渠的石料。惟可庆幸的是此残存碑文已载入光绪年间《费县志》，尚可查阅；杨佑廷手书题识110字拓片尚有数份完好存世，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王义美将军的宝贵历史文字资料。

康辅之与东山书院

孙士纯

“书院”一名最早起源于唐代，当时属官设的藏书、讲学之所，到了宋代改为教育场所，成为供生员学习读书的场馆，以授生徒。“书院”的教学内容包括《四书》、《五经》等，教习水平较高，不少有名的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书院”的主持人称“山长”，教师称“教习”，山长和教习都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学生是经过考试选拔的庠生或附生，他们可直接进参加乡试。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书院”仍盛，多数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清末废科举，“书院”即改为学校。“书院”的经费有的是官府供应，有的是地方自筹，有的纯属私人所办。

元代仲里狄家村（今平邑县仲村镇康家寨）康姓家族是元朝山东省境内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康家寨人士康辅之在元代初期创办义学于康家寨，后易名“东山书院”，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580多年。

康恭，字辅之，元代进士，朝廷谏官。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偕仲里人唐某捐资在狄家村北建“东山书院”，费邑虽小，密迩杏坛，堂庑斋室，弦歌接壤，吸引着周边几十里地的贫穷学子纷纷前来书院学习。康辅之创书院办教育造福乡里，可谓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书院后，由于他身为朝廷命官，无暇顾及书院的具体事务，便命两个儿子康若



泰、康若霖管理书院。东山书院师资雄厚，学子云集，立规条，严考课，学政修明，一遵鹿洞、鹅湖之遗，教习方法得当、规范，书院学子多数学有所成，多所造就。例如：

康若泰，以文学登，官至礼部侍郎。

李彦博，德埠庄人，进士第，官朝列大夫，处州路总管府治中。

牛克明，进士，官胶州提督。

陈稷，进士，官蒙阴县尹。

李彦密，进士，官卞梁路郟城县尹。

李彦修，进士，官济南府沾化县尹。

康宣，进士，官沂州等处兵马照磨。

康在熔，进士，官无极县尹。

还有乡贡进士若干名。

东山书院人才济济，层出不穷，官府支持，民众拥戴，盛极元、明两个朝代，成为蒙山费邑一带的人才摇篮。其当时东山书院兴盛之貌，元进士李彦博作《康家寨重建义学碑记》这样记述：“费邑之西三舍许，东蒙在焉，山之西又四十里曰狄家庄（今名康家寨），居人康公辅之勤俭以起家，诗书以教子。于皇庆二年，偕里人唐君各捐己资，买田若干亩，肇建义学一区，招致俊彦，教养而作成之。予早年肄业与此，后得与进士，乃嗣国子司业若泰相继登科。又如郟城李彦密，胶州提督牛克明皆出同门，蒙阴县尹陈稷，景山书院山长徐奄，山东宪司书吏侯泰，累中乡试，俱若泰之高第也。康公利泽及人者厚且远，以子贵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若泰子宣以父职为沂州等处兵马照磨，有继志述事之心，率乡邻贤而好事者，缔构大成至圣文宣王‘燕居堂’暨讲堂、斋舍、门楼、垣墉，靡不具备。经营于至正十二年八月，告成于次年四月。就举乡贡进士，莫不欣美。一日，宣踵门丐文，此时申达朝廷，名为‘东山书院’云云”。

康辅之祖孙三代，办学热情不减。东山书院历经元、明两个朝代。明末，康家寨康氏家族家道中落，东山书院也随之萧条冷落，失修倾圮。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由蒙山南麓贯庄人郭选、其子郭良贵、孙郭翹楚祖孙三代历时二十年，移建东山书院于蒙山南麓贯庄村，仍沿其旧曰“东山书院”。东山书院移建告竣之时，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大学士陈世倌书“东山书院”匾额悬于讲堂。曲阜衍圣公孔传铎于雍正七年作《移建东山书院记》，镌碑立于书院。碑载：“丁未之冬，费邑郭翹楚以改建东山书院索记于余，会赜阙旋里，撻疾未能握管。越二载落成，复踵门固请，余不能无文辞……郭生之祖名选，父名良贵，刘生名洙者，念书院废坠，圣迹久湮，复议改建于东山之南麓，捐地一区，与同志孙广锦、赵亢宗等，置祀田、谋兴筑。先公恭愬公、先叔翰博公曾为制引募捐，并出私钱以为助。经画肇自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至雍正七年己酉，阅二十载始告竣，仍沿其旧曰‘东山书院’……郭生精研理学，慨然有崇实黜浮，倡导教民之意，因祖、父创始，偕朋侣襄事，遂竟厥功。堂庑斋室，薄牖棖桷，礼乐几筵，牲醴笾豆，无不备具。程功稽课有其方，小学大成有其序，敬业乐群有其人，习礼观德有其地。阅所著《拟事》四卷，经营之周密，参订之详明，考古按今，正人心而排邪说，虽古好学名儒力行不倦者当不是过。”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续修书院，费县知县夏谟允作《绪理书院记》，知县乔天保报请朝廷将东山书院载入《大清一统志》中。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邑人卜梦弼、孙植重修，教谕张大苏有记。清光绪年间，书院停办，失修倾圮。东山书院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580多年，可谓是蒙山费邑一带的人才摇篮。

沂蒙山腹地的一座文化富矿

——莱钢集团鲁南矿业印象

杨立勋 陈希法

盛夏时节，朋友邀我到鲁南矿业看看。

其实，矿山就在我们故乡的附近，可近四十年的光景，却一次也无缘光顾。但是当时声势浩大的矿山建设工程，几个县的民工基建团相继奔赴矿山的身影还隐约留在我的记忆中，与矿山亲密接触，可能是缘分使然。

只是约略知道，该矿是在1973年，在山东省按照“开发矿业、大打矿山之仗、发展钢铁工业”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为迅速扭转矿石不能自给的局面而建立的，属于省内最大的露天采矿项目。建矿时，十里荒野，土地贫瘠。穿山风吹来，沙石肆虐，一片不毛之地。矿山人面对这样的环境，战天斗地，呕心沥血，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引得周边年轻人都梦想到这里当一名工人。

这里的矿石是一种难磨难选的鞍山式贫磁铁矿石。由于矿石的品位低，产品滞销。企业只得停工，连工资也发不出。矿山在痛苦中挣扎，曾经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三十八年的拼搏奋进，终于破茧化蝶：一切都在好转，人的素质在提高，工艺在优化，产品质量跻身国内同行业前列，效益连年递增，矿山焕发出无限生机。

这次到鲁南矿业，有一种再续前缘的感觉。那天下午，到达鲁南矿业公司



的大门口后，我们把车停在了沂河边。站在沂河桥头向东瞭望，高高的大门楼气势宏伟，一派民族建筑的诗意与祥和。门楼以东，万树丛中掩映着的是楼台亭榭，绿瓦红墙，青花瓷路灯柱，还有制高点上的汉白玉纳凉亭。这哪里是一座矿山，分明是一座民族风格的宫殿。

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矿山大院”：巨木参天，林荫遮道，曲径通幽，蝶飞鸟鸣。看不见尘土，听不见噪音。老人们带着孩子，在仿古园林的小广场中玉桥凭栏，观荷戏鲤。一群群和平鸽不时地悠然飞起又落下，为人们的生活平添了一份安详与情趣。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

我正逛得有趣，鲁南矿业有限公司卢廷运董事长邀请我们到公司的茶室品茶。

所谓的茶室，位于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上，楼乃“吟风阁”，室曰“退一步斋”。这座小楼，实际是他们的小型博物馆。卢廷运早在那里迎候。打眼一看，久闻大名的卢廷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浓眉大眼中透出炯炯有神的光芒，他热情里带着诚挚，诚挚中带有自信，言语不多，但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卢廷运带我们先到了一个满园盆景的花室。这个建筑的布局，大致采取了江南园林的构思，细节上却巧妙地融入了北方皇家园林的诸多因素。这里的盆景，无论是造型还是物种，品味颇高，连室外的地面，也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渲染。细细品味，实际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园。

到了茶室，又让我惊诧。一个矿山企业竟然有如此的文化积淀：排列有序的明清桌椅、精心布置的汉代以来的陶罐、龙凤呈祥图案屏风、带了抽屉的巨型条几及名人字画等，恰如一个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像这样的场所，听说还有两处。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工夫，鲁南矿业特有的文化环境，深深地感染吸引了我们。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探究：一个地处偏僻山区的矿山企业，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文化积淀？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化现象？

几天时间，脑中塞满了东西，东西越多，却是越不易理出头绪。现在回味起来，鲁南矿业之所以能打造出这样一种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化富矿，缘由和印象大体有三个：

其一，他们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从建矿那天起，一代代领导班子就有“文化立矿”的意识。当年，他们把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格言幻化为“不到长城非好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口号，激励着工人们风霜雪雨搏激流。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建起了职工休闲的“松山园”。老矿长王冠顺就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书法爱好者，在他任职期间，就曾多次邀请一些文化名人到企业切磋交流。现任公司董事长卢廷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对书法国画、诗词楹联、园林建筑、文物收藏、花卉盆景都有涉猎，某些方面还研究颇深。在企业面临“矿石品位低失去市场”的生死关头，他们还是凭了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科研小组大年初一放弃与家人团聚，忘我地战斗在科研攻关的第一线。卢廷运上任后，随着物质条件的好转，更是把企业的文化建设提到了更高程度。公司领导班子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不能打胜仗。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之间的最终竞争，是文化的竞争。要让一个地处偏僻环境的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作为最终追求。“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山沟里也可以出优秀文化。坚决摒弃“企业就是一架赚钱机器”、“企业的不外部性”等观念，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企业之中，渗透到企业运行的每个环节。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积累沉淀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矿山文化，已经开花结果，成为矿山人铸就矿石工业丰碑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更是成为打造百年基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今的鲁南矿业，不仅是一座资源的富矿，而且是一座文化的富矿。浓郁的文化氛围，犹如春风雨露，滋润着矿业人的心田，孕育着鲁南矿业人共享共建美好矿山的“精气神”。

其二，他们有一套文化与企业发展的科学融合方式。鲁南矿业的文化传承与固化，体现在他们的环境建设、科学决策、职工权益和尊严的保障、经营战略、发展定位、科技攻关、非矿产业发展等诸方面。文化因子有形或无形地洋溢、渗透在矿山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始终以观念的更新，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以新的发展思路和举措，应对新的市场变化；以新的精神面貌，确保企业持续全面发展。从“九五”时期成功进行“二次创业”，“十五”以来成功实施“超常发展战略”，着力构建“稳步持续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矿山”宏伟蓝图，到2007年公司改制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及时确立了“以人为本，依法运行，科学发展，富裕职工，回报股东，造福社会”六项发展原则。在每个发展阶段，每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都及时地科学规划出发展思路、发展目标。2002年，他们实施反浮选提质降硅技术改造，铁精矿品位由63%提高到了67%，一举实现了产品质量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2003年，他们实施了选厂扩大规模的改造，把铁精粉产量由九五末的每年20万吨提高到40万吨，实现了产量的重大突破。在扩大选矿规模的同时，他们实施了60万吨球团生产新项目，进行产品深加工，成为鲁南矿业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几个重大项目的实施，让鲁南矿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为最大限度地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他们新上了露天转地下开采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的接续问题。在做强主业的同时，通过与多家科研院所进行合作，成功地研制开发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等系列产品，于2001年10月创建了专门从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新材料应用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非矿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品种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形成了全国的销售网络，而且成功走向国际市场。

在繁忙复杂的矿山经营运行中，卢廷运仍然没有忘记职工的文化体育活动。他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把职工的文化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一年，卢廷运到河南焦作市洽谈业务，发现了一位优秀的太极拳师。他好说歹说，硬是把这个人请到了矿上教授职工太极拳。这位太极拳师在矿山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为了提高职工的文艺演唱水平，他们还不时地聘请县市的专业人才到矿上指导培训。今年的庆七一红歌演唱比赛，十个合唱团阵容整齐，风貌昂扬，情感激越，为矿山献上了一道文化大餐。他们经常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春季越野赛、演讲比赛、青年形象大赛等，尽最大可能地丰富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职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对企业产生了依赖感、安全感。父子两代、祖孙三代同为矿山职工的不乏其人，可谓心甘情愿地“献了青春献子孙”。

为了把“稳步持续全面发展，共享共建美好矿山”的远景目标落到实处，他们提出了丰富文化内涵的“五个提升，四个美好”的具体措施，以全面提升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职工素质、环境质量、职工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追求“美好产品、美好生活、美好主体、美好形象”，打造职工、用户、企业、社会四个满意的企业。

其三，他们有一份文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鲁南矿业仿古园林长春园的吟风阁廊柱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福国千秋俎豆永山河”，寄予着一种家国情怀，昭示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问到矿山建设情况，卢廷运相当低调，“我们干的那点事，都在面上摆着呢，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文化兴亡，匹夫亦有责。”是的，换位思考，一句“文化兴亡，匹夫亦有责”足矣。

时下，到处都在喊着“文化搭台，企业唱戏”。鲁南矿业人却有自己的—番思考：谁搭台谁唱戏，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规律。那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该搭台时则搭台，该唱戏时则唱戏。搭台唱戏一起搞，也未尝不可。繁荣祖国的经济与文化，那是最根本的目的。在鲁南矿业的十二五规划中，要将矿区建设成一个供人们“观光、旅游、休闲、学习、提高”的工业旅游景区，把企业几十年蕴积下来的工业景观、环境景观、人文景观资源与社会、大众共

蒙山沂水

享，引领人们去走近她，了解她，耳濡目染，熏陶身心，不管是久居其中，还是偶尔观看，都有所收益。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上，他们还注重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近几年来，矿业的环境文化建设投资达千万元，妥善处理好文化设施、文化投资、文化发展与企业经济实力、时空环境、发展前景的关系，脚踏实地，注重实效。

董事长卢廷运的企业战略思路向来是清晰开阔的。他认为，作为企业，首先应该把自身发展好，让职工安居乐业，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还要不断地创造更大价值，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多年来，鲁南矿业公司为相邻村镇造地100多亩，支援饮水及抗旱水利项目多处，支援新农村建设工程所用石子100多万方，钢材200多吨，水泥1500吨，硬化路面200多公里。还积极向汶川、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奉献爱心。200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鲁南矿业全员动员，严阵以待，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努力保持了企业的良好发展势头，他们不但没有减人减薪，2010年，职工人均收入达5.3万元，而且还通过发展新项目，安排职工子女、退伍军人、待业青年500多人。

夏日的清晨，鱼肚白初现，注入了文化元素和情调的“矿山大院”里，环境是和谐的，空气是清新的，人们的心情是舒畅的。我们相信，看似平静的鲁南矿业人不会从此止步，他们一定会像喷薄欲出的太阳，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仁泰巷蒋氏发家 靛市巷忆苦思甜

抗战前临沂的第一大商号当属“仁泰号”。它的第一代创业人名叫蒋宝善。他年少时家贫弃学就商，起步艰难，曾卖过豆腐，挑过煤炭，后来逐渐发达起来，成为临沂最大的一家杂货批发商。他本家住南关靛市巷，但他的企业设在沂州路城内中段，大街东西两侧皆是他的门市部。路东一小巷即是他的住宅区。因他的商号名“仁泰”，故该巷亦称“仁泰巷”。他家的生意是批发百货，从山珍海味、日用杂货、苏杭绸缎到宣纸、国画颜料、毛笔等文具一应俱全。茶叶、蜜饯、红白糖、香烛、金箔皆能供应。其货物销至临沂七县。由于他本人爱好书画，他还请老师在他家办学，让子弟上学习字练画。他本人会画山水，他孙子蒋幼泉会画兰竹。蒋氏家族成为临沂城儒商结合的一个家族。

蒋宝善有四子三侄，至曾孙辈家中已有百余口，至第五辈时还未分居，官府送他一匾“五世同居”。在他老家南关靛市巷路南的老宅，不但有家学，还有宗祠。他为了让子孙不忘祖先创业的艰难，每年春节他们全家人都要吃“忆苦饭”。笔者曾采访过他第十三个孙子的夫人刘氏，因她曾吃过“忆苦饭”，故讲之甚详。每年春节除夕，在宗祠内除了供奉祖先的“神主”，还要将当年卖豆腐的工具豆腐梁子也摆在供桌前，让子孙们看看当年祖先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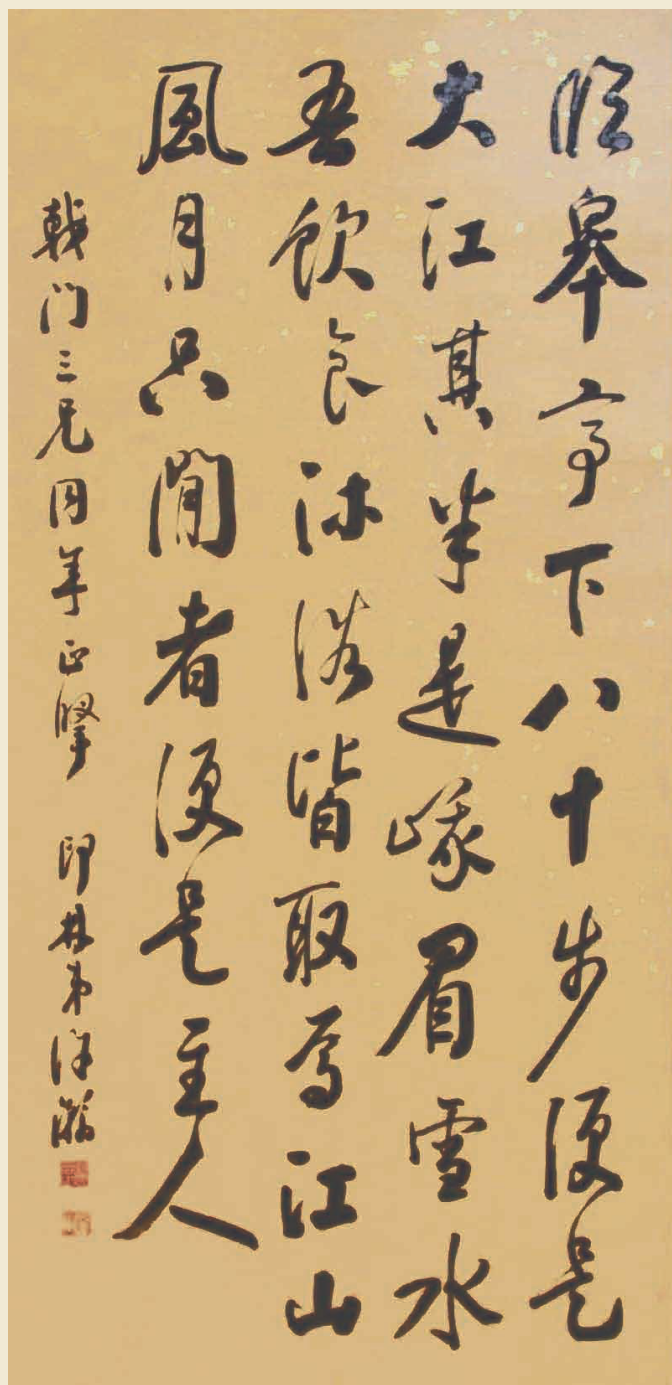
之不易。到初一的早晨祭过祖先以后，厨房前鸣锣，让各房的人前来领取每人一份的豆腐渣，当然是用油盐调料加工好的豆腐渣，而且必须吃上后再吃饺子。他还坚持不准分家，一定过集体的日子。而且他严禁子孙辈中有吸毒和赌博的恶习。为了让子孙皆有学识，他积极办家学，重金聘请老师。西乡砚台岭村的刘举人，城内有名的塾师兼画家韩春生，皆曾在他家任教。他的家学也兼收穷人家的子弟前来就读。对社会公益事业他也非常热心，因此他在临沂城有很好的声誉。

但是好景不长。他去世后不久，子孙便分家各自独立过日子去了。这个乌托邦式的家族很快就分散了。而他苦心经营的仁泰号不久也倒闭了。现在只留下一个巷名“仁泰巷”和“靛市巷”，向后人述说蒋家的家事。

蒲松龄来临采访 李方膺狱中受尊

凡读过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者，皆知道内中有关州治临沂的故事非常之多，大致有：《地震》、《莲香》、《柳秀才》、《堪舆》。只提到“沂蒙”或“沂”者有：《薛慰娘》、《商三官》、《阿纤》、《刘姓》、《医术》、《锦瑟》。有关沂水县者有：《钱流》、《辽阳军》、《杜翁》、《沂水秀才》、《司训》、《土偶》、《李伯言》、《金陵女子》、《罗祖》……。其他日照、莒县、郯城、蒙阴、平邑的故事就更多了。为什么写临沂的故事如此之多呢？原来蒲松龄曾在沂水教过学，故写沂水的故事最多。蒲氏年表上虽无在沂水的记载，但沂水刘氏家族的记载确认他在沂水教过学。这一点就是写故事的“三亲”问题。有的故事就是他亲历的，例如《地震》就是他亲身经历的真事。临沂老城北门外大堤下有一深坑，常年积水，就是康熙七年大地震时的那个深坑。《薛慰娘》故事发生在城南的乱葬岗处。过去南阁子门外，真的是有一片乱葬岗。蒲松龄写的如同亲身经历。然而最为真切者还是《柳秀才》这一生动的故事。现在老城西关还有一“蚂蚱庙街”。故事发生在这里。天下皆“八蜡庙”而无“蚂蚱庙”，独临沂有此一庙。明万历州治的地图上还是“八蜡庙”，而至明末就变成“蚂蚱庙”了。原来是明朝末年临沂有蝗灾故而发生了这一故事。据《沂州志》所载：明崇祯七年、十三年、十四年临沂皆有蝗灾，故有柳树神告之“蝗神”来临沂的故事，且言道是女神，并言道自西南方向而来，地点还是当年城西门外西南大路旁的“蚂蚱庙”。故全国别处的“八蜡庙”皆祀男神，独临沂西关“蚂蚱庙”祀女神，名曰“蚂蚱奶奶”。此庙于1947年被土匪司令王洪九所拆，现在只剩下一个街名了。而这个故事更证明了蒲松龄确实曾来过临沂城，故此写出了这么多“三亲”的故事。

临沂旧城过去有名“狱西巷”的小巷。此巷位于过去旧县署的西南角，因它在县署的监狱旁故称“狱西巷”。这座监狱曾发生过一件大事。原来在清朝雍正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正任兰山县知县，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而河东总督王士俊是一个酷吏，好大喜功，动员山东每县须开垦荒地，然后他好向上报功。当时兰山县确实无荒可垦，若虚报数目将来就要增加农民的税收，实则加害百姓，因此李方膺不为所动，于是王大怒将李方膺下在狱中。兰山百姓为之哗然，皆曰“公为民故获罪”，都前往探监。守者不让进，百姓便将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一时瓦沟皆满。足见李方膺多么受民爱戴。不久，雍正卒，乾隆即位，法办了王士俊，下诏给李方膺平反。时平反令到城甚晚，计划第二天再宣布，而百姓官吏皆曰：“不能让李大人再在狱中过夜了”，于是当晚放出李方膺，百姓皆前往狱前鸣炮庆贺，全城为之沸腾。后李方膺入都被皇帝接见。李方膺走前为临沂人留下了不少墨宝，如画于乾隆元年的《芍药图》、给莒县画的《五鱼图》，一直被临沂人所称颂。



许印林老城访古 尹彭寿书院讲学

临沂城关旧有书院两处：银雀山书院和琅琊书院。银雀山书院已无迹可考，琅琊书院今已重建。琅琊书院始建于明，经清代多次重修，后毁于日寇侵占临沂之时。现重建的书院仍在原址（王羲之故居院内）。有几位大学者曾在书院讲学、考古，为临沂的文化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清代大学者龚自珍称为“江北学者第一”的许瀚就是其中之一。许瀚，字印林，日照大河坞村人。清道光乙未举人，曾任滕县训导、琅琊书院山长。他在任琅琊书院山长之时充分发挥了他的治学才能，对临沂的金石考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将散存的汉画像石收集起来，其中有块《伏生传经图》，现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又将多块北齐造像碑和隋造像碑收集起来保留在书院之旁的右军祠。像海内名碑《诸葛子恒平陈颂》已被《金石



重建的
琅琊书院

粹编》、《校碑随笔》等碑刻专著所收录，为研究隋代书法绘画和琅琊诸葛家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在书院期间为临沂培养不少的人才，也给临沂留下了珍贵的书法墨宝，至今还在各大博物馆珍藏。

许瀚是清道光时期琅琊书院的山长。光绪时期又来了一位大学者尹彭寿。尹是山东诸城人，清末拔贡，是清代有名的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补》。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他被聘为琅琊书院的教授后又任教士馆教习。尹彭寿在书院不但教书育人，还关心临沂的书法艺术、山川地理。他的隶书成为学子们临习的重要教材。他还亲自考察了整个蒙山，以工整的隶书书写了《东蒙山嘉惠昭应王庙碑铭》，引经据典详细论述了蒙山的历史，为后人考证蒙山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碑写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现在还完好地立于蒙阴县境内的东蒙山顶之雨王庙外的山坡上。他的著作除《说文解字补》外，还有《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石刻考证》、《益都金石志》、《石鼓文汇》等。他给临沂留下了不少的墨宝，除碑刻外，他的隶书四条屏用四种隶书写成“西岳华庙碑”，“夏承碑”，“礼器碑”，“五瑞图题字”，由此证明他是会写多种隶书字体的。

许瀚、尹彭寿两位学者、书法家在琅琊书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琅琊书院也增了光彩。

剪辫子割除旧习 禁缠足解放妇女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临沂城乡仍然还有不少男人的脑后拖着长辫，妇女缠着双足，新到任的县长范筑先感到这种陋习一定要割除。他深知这一陋习根深蒂固，便考虑先从思想上开导。于是他召见了“民众教育馆”馆员范迟九先生，让他编写了留辫子和缠足的危害的唱词。范老先生利用庙会、大集亲自去说唱，当时影响很大。范筑先接着动员各学校的老师带头首先剪去辫子，让学生也剪辫放足，一时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学校师生带头了，但居民还有人思想不通，于是范筑先采取行动了。他事先向南门里路西杜家剪子炉定做了500把快剪，然后又组织了临沂五中的500名男同学，选在正月十五日城隍庙会进行剪辫。临沂城隍庙始建于明代。大殿为歇山式，上覆绿色琉璃瓦。殿前还有一个六角亭。亭西有一颗大古松，庙门外是一广场。场南有一座大戏楼，每年正月十五在此唱戏，甚是热闹。这年正逢庙会时，到正中午，突然来了警察将四个出口把住，先放走妇女和儿童及已剪掉辫子的人，然后劝说有辫子的人将辫子剪掉，顿时500名学生齐出动，剪掉一个放走一个，结束时在广场的

发辫堆了两大垛。从此在城内大街上很少见有留辫子的了。

禁止缠足和让年轻妇女放脚也是先进行了一番宣传。首先是学校中的女学生全部成为天足，然后组织女老师和女学生到各家各户去动员放脚，规定凡40岁以下的妇女必须放脚。从此大批的年轻妇女解除了缠脚的痛苦。后来百姓皆说这是范筑先县长在临沂的一件德政。

李华源“红部”取机枪 马思孔“水眼”巧脱身

临沂老城南门里路西有一座山西人经营的当铺。抗战前山西人就回山西去了。日伪时被日军占用成了后勤仓库。侵略军对其命名曰“红部”。这里面存有大批的武器弹药和军装、大米等军用物资，设有重兵把守。1943年侵略军运来了一批轻机枪放在此仓库内。侵略军头目十分重视，要求一定保管好。这当铺南临当铺巷。抗战前，在当铺的西南角开设了一家合资经营的银行，内中建有一座金库，十分坚固。当日军侵占临沂时，银行负责人戴佑臣早将现金银元转移到乡村去了。日军占领后一直无法打开库门。后来汉奸告诉日军库门钥匙和密码只有戴佑臣知道，于是大汉奸齐华亭到现在罗西乡的涧头村去找戴佑臣前来开库门，并要他交出所有的现金。戴佑臣推说不知，并言道是被管库房的人带到四川去了。后来戴佑臣与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取得联系，将现金全交给北海银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红部”的日军打不开老库门，便另开了一个新门，并重新安装了保险门，将机枪放入，认为万无一失。这消息早被沂河游击队长李华源知晓。李华源是今苍山县人。其父名李明兰，是位老中医，已被日本兵抓来城内囚禁。李华源是临沂三乡师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了“青年救国团”。此人武艺高强，是临沂桥隆飙、节振国式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汉奸皆心惊胆寒。为了得到这批机枪，他定出了周密的计划。日本兵新开的门是无法打开的，但老门是可以打开的。他找到戴佑臣老先生说明来意，戴老先生当即告诉了密码并交给了他钥匙。这李华源只带了两个游击队员潜入城内，等到夜晚12点开始行动。他们首先翻墙进入“红部”院内，杀死了站岗的日军，然后由一个队员化装成站岗的日军。他们两人很快就打开了老库门，将四挺轻机枪全部取出，又在库内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后安全撤出“红部”。他们安全离城后，只听得一声巨响，仓库爆炸，里面的枪支弹药全部炸光了。他们连夜跑到河东马石河村，将缴获的机枪上缴军区，受到了军区首长的表扬，军区给游击队留下了一挺机枪以示奖励。从此李华源智取机枪的故事传遍临沂。

旧时的临沂城也有排水的系统。城的四角城墙下皆留有“水眼”，也就是排水洞。最大的水眼当属西南水眼，它是由洗砚池大麦汪向南开了一条排水沟直通到南城墙根，城墙留一大排水洞，直通到城外的护城河。这个水眼在抗日战争中也为游击队提供了方便。有名的日本马号被烧一事就是河东沂河游击队另一位队长马思孔带领游击队员所为。马思孔胆大心细，有勇有谋。他打听到日本的“天长节”来临，日本军大吃大喝一片混乱。马思孔化装成推小车的，光着膀子赤着脚，推了一辆独轮车。他将炸药挂在腰下两腿之间，然后穿了一件大肥裤衩子。因推小车要两腿叉开，很容易就混进了城内。他联系好了当“苦力”的内线，又利用挑水的机会将炸药带进了日军马号。这时看守马号的日军皆喝得大醉，他们乘机引爆了炸药。顿时火光四起，整个马号烧成了一片火海。这马号是处在高台庙东侧，此时成了一片火场。这次烧死数十匹战马和整个草料库。日军驻军马上全城戒严，捉拿放火者。这时马思孔早已探好了退路，带领两名队员，进入到西南水眼内潜水到护城河，然后上岸绕道城南，过河安全地返回到河东游击区。马思孔及其战友受到了军区的表扬。这就是西南水眼变成游击队员撤出的好通道。而当时日本宪兵队进行了全城大搜查却一无所获，只好望着烧死的战马和一片火海叹息。

金生麗水玉出崑崗
生麗水玉出崑崗
關珠稱夜光
菜珠李杰
菜重菜薑海鹹河淡
鱗潛

智永，本姓王，法号永禅师，名法极，陈、隋间会稽（浙江绍兴）人，是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书兼诸体，草书最佳。

《真草千字文》是智永晚年以当时的识字课文《千文字》为内容，用真、草两体写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练习。这类文章古代即有，而以南朝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流传最广，名人书写而传世者很多。从书法史发展来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的规范作用超过了传为东汉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

《真草千字文》法度谨严，一笔不苟，其草书则各字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犹存古意，其书温润秀劲兼而有之。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又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草法，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

对于智永的书法，历代书法家与书法著作多有评价。乐安薛氏云：“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间学书者宗匠”；都穆《寓意编》云：“智永真草千文真迹，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解缙云“智永瑶台雪鹤，高标出群”；韦续《九品书人论》云“智永正草，品上之下”；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智永“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唐）张怀瓘《书断》云：“智永师远祖逸少（逸少，王羲之字），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良譬，大海安波，微尚有道（有道，书法家）之风，半得右军（右军，指王羲之）之肉。兼能诸体，於草最优。气调下於欧（欧阳询）、虞（虞世南），精熟过于羊（羊欣）、薄（薄绍之）。”张怀瓘将古今善书法者分成三品：神品、妙品、能品。智永的行书入能品，隶书、章草、草书皆入妙品。可见智永书法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也有学者认为，智永书法全守王氏家法，缺乏创新精神。如李嗣真的《书后品》就认为“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对此，苏轼《东坡题跋》另有一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渊明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苏轼又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於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仿者，又在此论下矣。”苏轼此说也确有一些道理。智永

之志，确实不是独树一帜，而是要使乃祖书法流传于后世。

智永居永欣寺期间曾临写王羲之《千字文》（王羲之生前并无千字文，此为萧梁殷铁石于官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中拓了千字互不重复之字，再经周兴嗣编次成韵文）800帖，分赠浙东诸寺，目的就是要借佛门之力，流布乃祖书法。智永书法流传甚广，宋御府即曾收藏智永草书13件，真草10件。其《真草千字文》还一直流传至今。《真草千字文》采用以楷书对释草书的方式，这是智永的创造，既便于学书者释读草字，又能让人同时欣赏他两种体裁的书法，可谓一举两得。

智永禅师草书“千字文”，完全得笔于乃祖王右军，并师承了草字法规。但此帖每格一字，每字独立，写起来循规蹈矩，而不似乃祖与张旭那样“笔墨飞舞”、字字相连呼应。智永继承了王羲之的笔法，但每个字中又都有一两笔特别加重笔力，更显示出智永作书时的神情专注、神力内敛，重笔之处也显得圆润合拍，健肥适当。智永在《真草千字文》中的真书（楷书）是行楷，比正楷更轻快。智永行楷每字中也有一二重笔，因而字态更生动，更劲雅，唐宋以后的书法大家也大多喜欢师承永的楷字。

智永的书法对初唐虞世南等的书法很有影响。与智永同时而年少的释智果亦曾师事智永。智果也是永欣寺僧，工于书铭。传说隋炀帝特喜其书，他曾对智永说过：“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意思是智永书法圆润，智果笔法腴润不足，而骨力超过。智果的行书、草书，张怀瓘《书断》皆列为能品，可见智果也是书僧中之佼佼者。

我们细读智永的墨迹《真草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此帖以真草二体所书，其楷书结字平正和美，草书则动合矩度，笔法均圆肥。其结字在点画的衔接搭配上灵活自然，字形不强求一律，字势在平正中偶尔出以奇趣。用笔上起止的铺毫运转十分快捷而到位，笔锋转换清晰朗丽，飘逸劲健。笔致没有大的重按跳宕，但线条变化极丰富。这件作品由于其本身作为中国书法的代表和象征，成为书法史上最为显赫的名帖之一，很少有习字不摹此帖者。历代不少书评家赞其为“天下书法第一”，可见其意义重大。

浩气壮山河 诗魂育后人

——《沂蒙诗话》之四（下）

李兴河

（三）

魏立久（1903~1941年），原名魏宗唐，山东费县梁邱镇人，回族，高小毕业。1919年6月初，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并参加抵制日货检查队。1931年冬去上海，寻求革命真理。不久，淞沪抗战爆发，他毅然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魏德久为表达抗日决心，写下四言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粉身碎骨，誓死保国。

他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挂在居室墙上，以时时激励自己。为了抗日救国，他先后捐献200元大洋，购买枪支弹药支援抗日武装。1939年，日军侵占梁邱，魏立久毁家纾难，卖地买枪，举家上山，成立了以回民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在梁邱北山一带打游击，队伍近百人，他任队长。1940年2月，调任费县七区中队队长。1941年初，任费南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同年4月3日壮烈牺牲。

张舜卿，女，曾用名张荣，字重华，又名庭芳。山东寿光人。1908年生。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学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宣传队，后调往鲁中军区，在山东纵队一旅任后方医院教导员。1941年冬，日寇麇集5万余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张舜卿在沂蒙反“扫荡”斗争中不幸被俘，牺牲于沂水城东黄花埠。牺牲前，她写了一首《绝命诗》：

连宵噩梦待死身，辗转黄草倍思亲。

恩仇未报身先死，昙花一现怪作人。

愿洒碧血化作雨，育我中华后代春。

自古人生谁无死，自有黄花伴我魂。

诗中有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之情，有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有壮志未酬的遗憾，有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有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愿洒碧血化作雨，育我中华后代春”。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

常恩多，号获三，满族。辽宁省海城县人。1895年生于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正担任东北军七十一团团团长，目睹祖国大好山河沦入敌手，他声泪俱下地向全团官兵表示：“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1935年冬，晋升为百十一师师长。其间曾多次上书张学良，力主停止

内战，共同抗日。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杀敌报国，收复失地的决心：

夜半睡朦胧，忽听雷雨声。
狂风如怒吼，好像赶敌兵。
惊我还乡梦，恨未到辽东。

1936年9月的一天，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根据常思多的要求会见了，两人畅谈至深夜。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他全力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顺从民意，实行兵谏，迫蒋抗日的行动。1938年3月，他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立下战功，受到第五战区指挥部传令嘉奖。1938年冬率部到鲁南，为打开鲁南抗日局面做出了贡献。1939年春，常思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常思多率部英勇作战，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1940年1月24日的王家庄子战斗获大胜，《大众日报》载文称“这次战斗是两军配合粉碎敌人‘扫荡’的极好典范。”1940年9月22日他发动了“锄奸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以华制华”的政策，挫败了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1941年他在一首诗中抒发了报效祖国、“共整旧山河”的夙愿：

明月良宵里，静卧草房间。
沉思既往事，阵阵痛心酸。
谁识征夫意，共整旧河山。

1942年8月2日，常思多病情转危。8月3日，他和苏鲁战区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中共党员）一起举行“八·三”起义。8月8日拂晓，常思多把百十一师3000多人带到滨海抗日根据地莒南王家坊前，交给了党和人民。9日凌晨，常思多与世长辞。

1942年，日寇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蚕食”。在鲁南区设日伪据点441处，抱犊崮东南的基本区只剩下10余个村庄。在鲁中区设日伪据点386处，比1940年增加了129处。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敌人的“扫荡”、“蚕食”。保卫了滨海、鲁中等根据地的基本区。是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写了一首诗《沂蒙反“扫荡”》：

日寇疯狂犯鲁中，风烟滚滚来势凶。
“三光政策”伸血手，铁壁合围黄梁梦。
清剿篦梳又剔抉，诡计多端全落空。
军民布下天罗网，满山遍野皆英雄。
麻雀地雷游击战，伏击奔袭奏奇功。
敌伪交通全切断，“野牛”陷在火阵中。
“堂堂皇军”纸老虎，“赫赫战果”尸纵横。
雄伟壮丽沂蒙山，响彻颂歌《东方红》。

诗中揭露了日寇疯狂、野蛮、残酷“扫荡”的罪恶行径，赞扬了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机智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抗日军民粉碎敌人“扫荡”，取得最后胜利的欢悦心情。

（四）



陈毅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谈笑擒群虎，赋诗唱大风。1947年的春天，他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率领山东解放区的军民转战南北，相继取得了鲁南、莱芜、泰安、孟良崮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进犯，扭转了华东战局，加速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他又用大气磅礴的诗篇，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这一个个的战斗场

景。这些诗篇堪称革命史诗，是沂蒙红色文化的光辉篇章。

鲁南战役，是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在陈毅、粟裕等领导指挥下进行的。解放军投入57个团的兵力，沂蒙解放区组织了60多万民工民兵支前参战。战役从1947年1月2日开始，到20日结束，是一次“关系全局”的歼灭战。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整编师、1个快速纵队，共5.3万人。俘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缴获坦克24辆，榴弹炮48门，汽车470辆，各种小炮100余门，轻重机枪千余挺，收复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鲁南解放区之大部，挫败了敌人向解放区进犯的计划，为解放军建立特种兵部队提供了装备。陈毅怀着胜利的喜悦之情，赋诗《鲁南大捷》：

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
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
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鲁南战役后，华野用一部阻击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犯之敌，陈毅、粟裕等则率华野主力隐蔽北上，包围新泰、莱芜之国民党军。1947年2月，陈毅写有《雪夜行军》诗：

泰山积雪，沂水坚冰。
冲破黑夜，奋迅行军。
杀敌气壮，万众同心。
擒贼擒王，共祝新春。

诗中写了雪夜急行军的艰辛，奋勇杀敌的决心和夺取胜利的信心，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7年春，在临沂蒙阴道中行军，触景生情，陈毅欣然填词《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以抒情怀：

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
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
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

诗中洋溢着对沂蒙解放区的热爱和赞美，指出蒋介石军队进攻解放区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

1947年2月20日，华东野战军集中约60个团的兵力发起莱芜战役。沂蒙解放区约有50万人为战役服务，7万子弟兵上前线。战役23日胜利结束。此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等部共计5.6万余人，俘国民党军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计划，使渤海、鲁中、胶东三大战略区再度联为一片。战后，陈毅喜赋《莱芜大捷》：

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

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
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
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元凶。

这首诗大气磅礴，热情赞颂了解放区军民万众同心、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1947年5月13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指挥华野部队发起孟良崮战役，90余万民兵民工参加支前。至16日战役胜利结束。全歼国民党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3万2千余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对此，蒋介石哀叹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使华东战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促进了全国蓬勃发展的大反攻之势。战后，陈毅写了《孟良崮战役》一诗：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看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哪得逃。
暴戾蒋朝嗟命蹇，凄凉美帝怨心劳。
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
更喜雨来催麦熟，成功日近乐陶陶。

诗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此役战斗的激烈，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机智，赞颂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谴责了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了这次战役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表达了对人民革命成功日近的喜悦心情。诗写的是重大题材，真实形象，富有极强的感染力，给人以巨大鼓舞。

马陵山历史地震与史前考古文化

徐淑彬

马陵山处在我国东部郟（城）庐（江）断裂带之沂沭断裂带部分（北起渤海莱州湾，南到江苏省新沂县一带，全程约350公里），更新世以来有过三次大的环境变迁，即三次山体的抬升，它是由郟庐断裂带活动（包括地震）的原因造成的。每次变迁都会改变该地区的自然景观，从而改善人类的经济方式。更新世晚期的马陵山呈现出较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于古人类的生息。

近30年来，笔者与国内古生物、考古界的部分同仁在鲁南马陵山地区进行古生物考古调查中，在马陵山地区发现了一批古文化遗址和一些第四纪动物化石，对该地区第四纪地层有了一些认识，通过对石器时代遗址和文化遗物分布规律的研究，发现马陵山脉在更新世曾有过几次大的抬升，并与这一时期的地震有关。本文依据在马陵山地区考察的收获，参考有关发表的文献和当地地矿部门的部分资料，并结合地方志中的记载，对这一地区更新世以来的地震、古人类活动规律、古地理环境及古气候的变迁作初步探讨。

一、马陵山更新世之地震地层宏观

马陵山位于鲁南、苏北两省交界处，沂沭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带，是一条带状低山丘陵。它北起山东省临沭县曹庄，南至江苏省宿迁县骆马湖边，整个山体起伏连绵，长达100余公里。总的地势北高南低，主要隆突的山体

马陵山地震断裂带，国内唯一的第四纪活断层地貌景观。一面是浅红色的新生代土层，一面是黄褐色中生代土层，两者相差年代超过亿年。



位于山东省郯城县境内，最高山峰海拔184.2米。一般海拔50~100米左右。山体基岩主要由白垩系王氏组紫红色砂岩、泥岩、页岩、砂页岩、砾岩的陆相盆地沉积构成。地层以向西倾斜为主，倾角 $20^{\circ} \sim 40^{\circ}$ 。根据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西马陵山王氏组的实测剖面可知：从东往西的岩性分布大致为砾岩、砂砾岩、中一巨厚层细砾岩。

就地质构造来说，马陵山处在我国东部郯（城）庐（江）断裂带之沂沭断裂带部分。沂沭断裂带北起渤海莱州湾，南到江苏省新沂县一带，全程约350公里，呈北东 $15^{\circ} \sim 30^{\circ}$ 方向延伸。南北纵贯临沂地区的中部，与沂沭河谷地展布相一致，是控制整个临沂地区地质、构造、岩浆活动和地震活动的主干断裂。在该断裂带上，马陵山山脉新构造期以来的活动是较强烈而又频繁的，第四纪有许多活断层发育。从宏观上看，更新世的地层以强烈逆冲断层为主，全新世则以逆掩断层为主。

在马陵山北端临沭县中华山、潘岭、岌山，郯城县泉源马陵山、高峰头麦坡村东一带都发育有更新世以来的活断层。这些活断层集中见于郯庐断裂及两侧。根据野外观察的结果，可知断层一般常见白垩系青山组火山碎屑岩或王氏组砂页岩逆冲到第四系早更新统或中更新统砾石层及晚更新统黄土堆积物之上，断层的倾角多较陡直。如马陵山西侧的南泉、三井村等地常见有早更新统冲积之粘土砾石层被白垩系王氏组地层逆掩；中晚更新统乃至全新统，在临沭岌山至郯城窑上村附近，有一条长约30公里的逆掩断层，白垩系王氏组砂页岩逆掩在全新统洪积——残坡积层、晚更新统钙质结核黄土层及中更新统砾石层之上，断层倾角 $25^{\circ} \sim 35^{\circ}$ 。以郯城纪庄附近的断层剖面较为典型。

从上述可以看出，马陵山第四纪的活断层自更新世初期至全新世都有发现。由于这些活断层的发生，造成了马陵山脉许多地区山脊错断和沭河多处改道，并有一系列小型湖泊或水塘形成。前者如郯城县城东山南头村南的沭河改道，后者如郯城县黑龙潭水库（该水库是在原有的自然水潭处建坝）。

二、方志记载的马陵山地震

关于马陵山地区的历史地震，多见于清朝的文字记载。其中尤以公元1668年7月25日晚8点左右（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郯城发生的8.5级地震（以下简称“7·25”地震）震惊中外，为我国历史上东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波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西、辽宁、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福建等10余省及中国东部海域，达400余州县，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并远及朝鲜西部，造成极为惨重的破坏。据清康熙《郯城县志》记载，这次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以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打死男妇子女八千七百有奇。查上册人丁打死一千五百有奇。其时地裂泉涌，上喷二三丈高，遍地水流。沟浍皆盈，移时即化为乌有。人立地上如履圆石，辗转摇晃，不能站立，势似即陷，移时方定，合邑震塌房屋约数十万间。其地裂处，或缝宽不可越，或缝深不敢视，其陷塌处皆如阶级，有层次，裂缝两岸皆有淤泥细砂，其所陷深浅阔狭形状难以备述，真为旷古奇灾”。

清朝进士倪长犀，江苏赣榆人，以其文《地震记》较详尽地综述了“7·25”地震的前兆和地震时的现象及震后造成的危害：“前此书震矣，无记，兹记者何？志甚也。先是苦雨几一月，是日城南渠一晷之间，暴涨忽涸，见者异之。顷云作若大雨状，既雨殊未大，而黄紫云亘西壁，由南迤北，声若辘轳。顷则明月在天，微风不作，人方轻絺缓箠，自命羲皇。时而百千万状之恢怪，百千室之摧覆，百千万命之靡烂，胥此一瞬间矣。方震声发西北，雷轰电迅，地闪忽跳纵，疑火疑潮，而震声、圯裂声、覆屋宇声、崩梁摧壁声、折树声、水声、风声、鸡犬鸣吠声、牛畜吼声、人号哭声、父子夫妇呼急声，千百齐发，远近如沸。时盖扬轻尘，拥宿雾，惨澹布天，浓烟遮地。前此坐月开襟者，倏皆摧垣断壁中，相与为蛇为猬，覆之黄壤，籍以清泉矣。城外旧无水，忽噪水至，急登陴视之，水循城南泛，澎湃奔驰，退则细沙腻壤，悉非赣物。井水高二丈，直上如喷。凡河俱暴涨，海反退舍三十里。室自出泉，寒冽不可触。裂地以丈尺计，旋复合，投石试之，其声空洞。及旦，人且谣曰：神告我，后十日当陷。至期，愚者率奔避山上。而是夜果大雨，飞虹绕电，天地若倾。人栖树下，视

覆靡盖笠者直大厦华庑矣。城北得古窑，一瓦器如豆，意三代以上物震出之者。自是三岁，率常震，居者惧覆压，编苇为屋，疾棖题若陷阱焉。前覆压死者以千数，乃有曲蘖生醉覆宇下者，掘土出之，方化蝶未返。倘所谓天者，非耶。”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地震的记述，多注重于地震时的自然现象和地震造成的灾害，并有一些地震时发生或伴随的物理现象记载。这些在地震前后或震时并发的物理现象，则主要为地光、地气、地声等。另外，还可以看出地震造成的破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面变形。如地裂、喷沙涌水、山崩地陷；二是建筑物倒塌毁坏；三是人畜伤亡。

三、考古文化的揭示

本文所述的考古文化，在此专指山东省郯城县及相邻的江苏省东海县境内马陵山地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

1. 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概述

该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叶。1974年夏，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刘泽纯等人首次在马陵山脉之江苏省东海县大贤庄西南与山东省交界处发现旧石器。1978年和1980年由李炎贤等作了调查与研究。据原研究者报道，大贤庄的石制品均采自附近的山坡地表，石制品主要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采集品中有石核（单台面、双台面、多台面及船底形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石核的加工较为简陋，大部分为一般特点，在进一步确定时代意义上较小，唯船底形石核较有意义。这批标本虽然脱了层，但在调查中未见到陶片或磨光石器，推测其时代有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稍晚。1977年，葛治功、林一璞再次在大贤庄采得252件石器标本，包括有细石叶、细石核、拇指盖型刮削器、圆底石镞、雕刻器等，其类型与山西下川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极其相似，认为应属同一时代产品，即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其年代距今约16000~10000年。

1982年秋，本文作者等人调查发现了黑龙潭细石器地点，采集了351件石制品，以细石器为主。我们认为其文化性质和年代与凤凰岭、大贤庄的细石器较接近，即与山西下川一带发现的细石器在时代上相当。1986年望海楼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以其清晰的地层，证明该文化遗存的年代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仅在郯城县尚庄村西南和村东发现两处龙山文化遗址。从出土的文化遗物看，其文化性质与山东龙山文化之“两城类型”较接近，相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左右。

除上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外，还在马陵山顶和西坡发现了两处商周遗址和许多秦汉遗址、墓葬。

2. 古生物化石所反映的古气候

马陵山脉的更新世古生物化石地点已发现6处，多为象类化石。早在1958年，黑龙潭水库修建时就出土有早更新世的平额象下颌骨和白齿化石及大角鹿角化石，同时还在马陵山主峰附近的清泉寺一带亦发现有中更新世早期的原脊象和水牛化石。近年来还在马陵山西侧的沐河道中及山坡堆积物中发现有晚更新世的象类化石，多为古菱齿象。黑龙潭水库西岸白鸡窝地点的古菱齿象与披毛犀、牛、鹿、猪、野马等共存。

据周明镇、张玉萍研究，更新世早期的真象类都居住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从更新世中期开始，随着冰期气候的影响渐趋加剧，产生了凉爽和寒冷的冰期气候和较温暖的间冰期气候，这两种气候条件在北部地区交替出现。平额象在马陵山的发现，标志着该地区在更新世早期的气候可能为亚热带气候；而郯城原脊象和水牛化石的发现，则标志着马陵山中更新世气候是间冰期较温暖或凉爽和寒冷的冰期气候交替出现的；黑龙潭附近更新世晚期的古菱齿象化石，一般认为是生活在、晚更新世间冰期或亚间冰期的一种树林生活的种属。在日本发现的诺氏象化石的年代，根据碳14同位素测定的绝对年龄距今约为16200~32000年，相当于

晚更新世，但这个种的生存时期可能延续到更新世末。

在黑龙潭附近发现的晚更新世披毛犀牙齿化石，为我们分析当时的古气候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披毛犀的化石与古菱齿象化石出自同一层位，我们认为其生存的时代与古菱齿象较接近。目前我国东部沿海（主要指华东北部沿海与华北沿海接触地带）许多地点都发现有披毛犀化石。如大连渤海中的北隍城岛、山东沂水鱼鳞崖、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南浚县乃至上海都有发现。就中河南安阳小南海披毛犀化石（ZK—170—0）的碳14年代为 $12710 \pm 215BP$ ，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产披毛犀层位的骨化石（ZK—109—0）的碳14为 $28135 \pm 1330BP$ 。一般认为，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确实是喜冷的动物，但它所能适应的环境可能较广。从黑龙潭披毛犀与牛、象、鹿、猪、野马等哺乳动物化石共生来看，更新世晚期的马陵山，有可能呈现出较温暖湿润的气候。

3. 古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前面曾介绍过，马陵山脉更新世以来存在着许多活断层，这些活断层都是新华夏系构造所致，并与地震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近年来马陵山脉野外考古调查所获得的古人类文化、古生物化石及地质资料综合研究，认为更新世以来的马陵山，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环境变迁。

第一次变迁，约发生在第三纪末期至更新世初期。在第三纪晚期，马陵山并没有隆起，而是隐伏在地表以下，在郟城县境内则隐伏于原沭河河床下。约在第三纪末期至更新世初期的某一阶段，由于受郟庐断裂带新华夏系构造局部活动的影响。致使今临沭县发山至郟城县泉源一带的马陵山主峰局部出露地表，将沭河向东推展改道。这一变迁，可以从马陵山发现的早更新世平额象化石及更早更新世晚期的原脊象和水牛化石得到佐证。据周明镇研究，郟城发现的原脊象和水牛化石（原研究者称化石产地不详，经笔者调查核对，是出自郟城县泉源马陵山的主峰附近）的时代可能是处在早更新世的后期或中更新世的早期。这些哺乳动物化石的存在，表明了当时的马陵山已经出露，南泉、三井村等地早更新统地层的存在亦可佐证。但一直没有第三纪的地层或古生物化石发现。

第二次变迁，约发生在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更新世晚期之初。在郟城县城东茅茨至江苏新沂一带的马陵山上有一个由中更新统冲积砂砾石层组成的河流二级阶地，分布在海拔60~90米左右。岩性为淡黄、灰黄、棕黄、褐色等，结构松散。砂砾石层主要由粗、中砂及卵石组成，卵石约占50%左右，主要为脉石英、石英砂岩和燧石等，占90%以上。其它有少量火成岩、片麻岩及紫红色砂岩，一般磨圆度较好。砾岩径以1~5厘米为主，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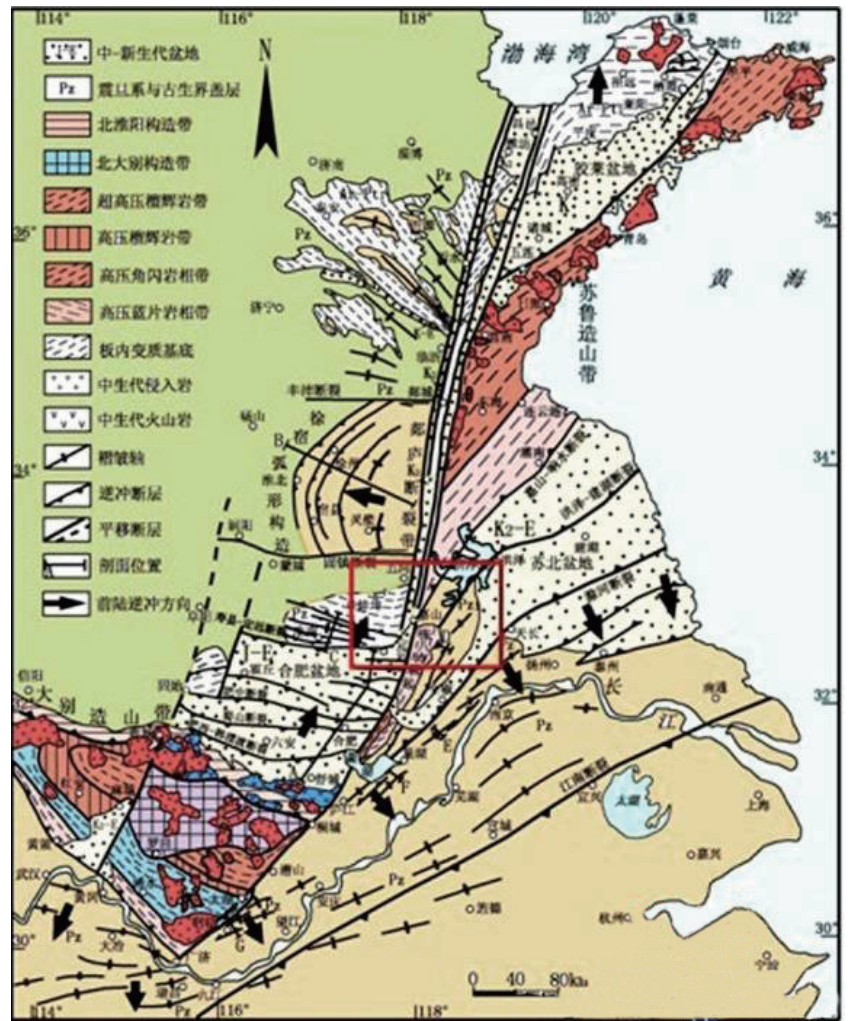
70%以上，砂砾石层的厚度在大贤庄西南可见最深为1.8米。这片砂砾石层，明显属湍急河流冲积物。说明更新世中期，该段山脉尚处在沭河河床主道，只是在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更新世晚期之初才受新构造（包括地震）的影响使山体抬升，抬升的相对高度约在10~20米左右。由于这个缘故，迫使沭河从郟城县山南头村南向西改道，接近于今沭河河道的位置。在这个抬升过程发生后不久，人类便利用上述砂砾石层中的砾石制作石器，大贤庄河望海楼旧石器地钱的发现如是。在这次山体抬升中，马陵山脉的大部分地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抬升。

第三次变迁，约发生在更新世晚期后阶段至全新世初期或稍晚。在黑龙潭水库西岩—白鸡窝地点，有一片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的残坡积和河湖相沉积地层，后者覆在前者之上，分布在海拔50~60米的高度上，高出沭河约10余米。1982年秋我们曾在该地点探沟调查，从探沟剖面上可知该地点有两个时代的堆积。上层为全新统以灰褐色粘质砂土为主的河湖相沉积，层内出土石器，上部出土细石器；下层为晚更新统棕黄色粘质砂土，产打制石器，并出土过动物化石。白鸡窝地点全新统的地层具水平层理，并见有粉砂和交错的细砂层，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缓慢流水或静水湖岸边的沉积相。其沉积的时间当在马陵山第二次山体抬升后。该地层与附近山顶中更新统砾石层的相对高差约10余米，推测马陵山中段山脉第三次山体抬升的时间约在全新世初期或稍晚。抬升的高度在10米左右。

以上三次山体的抬升，是郟庐断裂带活动（包括地震）的原因造成。这些抬升除造成自然环境的变迁（山脉隆起、河流改道、小型湖泊形成等）外，更重要的是对古人类的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根据前述的考古资料可知，马陵山中段山脉在出露后（即上述第二次变迁）不久，就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涉足，并在其上制作了许多石器产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更有许多先民在这片低山丘陵上生息。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中石器时代，整个马陵山脉中段，都见有细石器文化遗物，以其密集细石器地点和丰富的细石器遗存，成为中国东部沿海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和阶级社会，马陵山仍以其优良的地理环境，成为鲁南苏北冲积平原地带人类生息劳作的乐园。

四、小结

马陵山地处沂沭河中下游冲积加积平原上，由于历史上沂沭河经常泛滥，古生物与古人类难以生存。它的隆起，给更新世和全新世的人类创造了良好的居住条件



和经济来源。依据地震造成的逆掩地层的地质年代、考古文化及物候方法的研究，可知更新世以来郯庐断裂带的活动致使马陵山地震，而每一次地震的发生，都会给该山脉上生存的古生物与古人类造成一定的伤亡。但这些地震发生时所伴随的山体抬升，则又导致自然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为人类所利用。马陵山的每一次抬升，都会改变该地区的自然景观，从而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在第二次抬升之后，马陵山中段地带所反映的自然景观可能是山坡上有稀树草地，山下河边有茂盛的水草，气候是温暖湿润的。第三次抬升后，山顶可能发展为茂密的树林和绿茵的草地，气候更趋温暖。当时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狩猎或渔猎为主的。

在马陵山隆起前，这一地区应为湖滨平原。马陵山抬升后，沂沭河上游地带的冲积物往往沉积下来，致使其后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及墓葬常发现于全新世数米厚的黄土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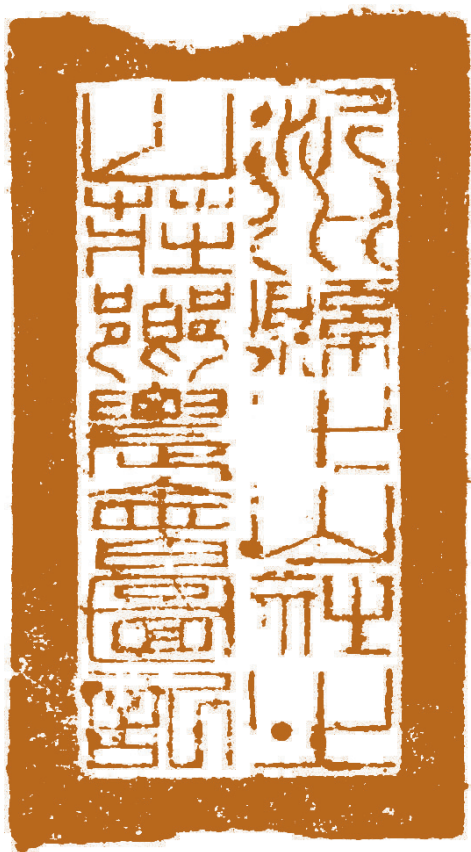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陵山体的抬升对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分布产生了一定规律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因素，就是郯庐断裂带新构造运动之沂沭断裂带在空间上活动的差异。正确地认识这个差异，对我们认识马陵山史前地震的成因有一定的帮助，于今天该地区地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

2011年7月25日是郯城7.25大地震343周年，谨以此文悼念那些在该地震中逝去的5万多先民们。

三枚印信背后的故事 (上)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高雷



钤印之一：沂水县土山社土山庄乡农会图记

这是三枚木质印章，均发现于临沂地域，它们分别叙述了民国时期山东境内三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片断由于过去的忽略而鲜为人知。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下面分别予以解说，借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沂水县土山社土山庄乡农会图记

该印长8厘米，宽4.3厘米，高3.6厘米，木质，篆文印模十四个字：“沂水县土山社土山庄乡农会图记”。

沂水县土山社土山庄，今属沂南县大庄镇，“社”是民国前的行政区划称谓，较现在的乡镇略小。沂水县旧志里说：“古者二十五家为里，亦二十五家为社，后世仍里社之名，不可以家之数计也。”1928年沂水实行地方自治，废社划区，全县划为18区。说明此印刻篆于1928年以前。

农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在中国北方肇始于辛亥革命成功之日，续修临沂县志中有明确记载：“民国元年奉令改为临沂县农会。民国四年，官产变价，筹拨款项，留为本会。会所领有财政部凭照。”这是县一级层面上的法人团体。而乡村农会的建立则是大革命的产物。当然，北洋政府的农会与国民党的农民协会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经济组织，后者是革命团体。

农民协会是大革命时期创造的新生事物。大革命时期蓬勃的农民运动得益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1922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已经十分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把革命推向高潮。它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譬如毛泽东、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的创造性工作，组织创建了省、县、乡农民协会；培养干部，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中共内部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

毋庸置疑，农民协会在形式上是国共合作指导下的农民运

动组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如谭平山任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任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连中国共产党主持举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也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封建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所以农民协会表面上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一级组织，归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费县县志载：北伐胜利后，1929年2月，中共党员张希周、袁时若以费县国民党指委会成员的合法身份，组织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表述，顺理成章。也说明为什么在1927年7月15日国共彻底决裂后，沂蒙山区各县还可以建立农民协会。

同时，在大革命中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保守的国民党以及地方权贵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临沂市农民协会就是1928年北伐告成后，12月由北洋政府指导下的临沂市农会改组为临沂市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其五名负责人全部为国民党党员。

沂水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成立于1928年5月，其负责人中张敬诺与徐相南的身份应为中共秘密党员。理由为1927年6月22日冯玉祥明确表示：希望与南京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后率西北军撤离北伐前线的临沂战场，“班师讨赤”。1928年春“清党事讫”，再次北伐，攻占临沂地区。从此国民党日益走向反面，其后如雨后春笋的法团组织，是以国民党的面目出现的。而沂水县农民协会应该是“白皮红瓤”。

沂水县志记载：1928年6月，沂水多数区、乡、村建立起5—6人的农民协会领导机构。该枚印信应当诞生在此时。因为当时沂水南部是共产党人徐相南组织发动的地区，所以它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作用。

最后的问题为印信中的组织名称为何是“乡农会”，而不是“乡农民协会”。因为没有见到更多的原始材料，不敢妄断；但成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续修临沂县志》中对临沂市农民协会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至十八年十一月奉省农民协会令改为临沂市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组有区农会、乡农会多处。至二十年二月奉省令改为县农会。”

由此可见，此枚印章的发现见证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见证了临沂人民对大革命的支持和追求，更见证了沂蒙山区辉煌的历史地位。



民国初年山东省国民党证章

名符“丰富”

——速写郭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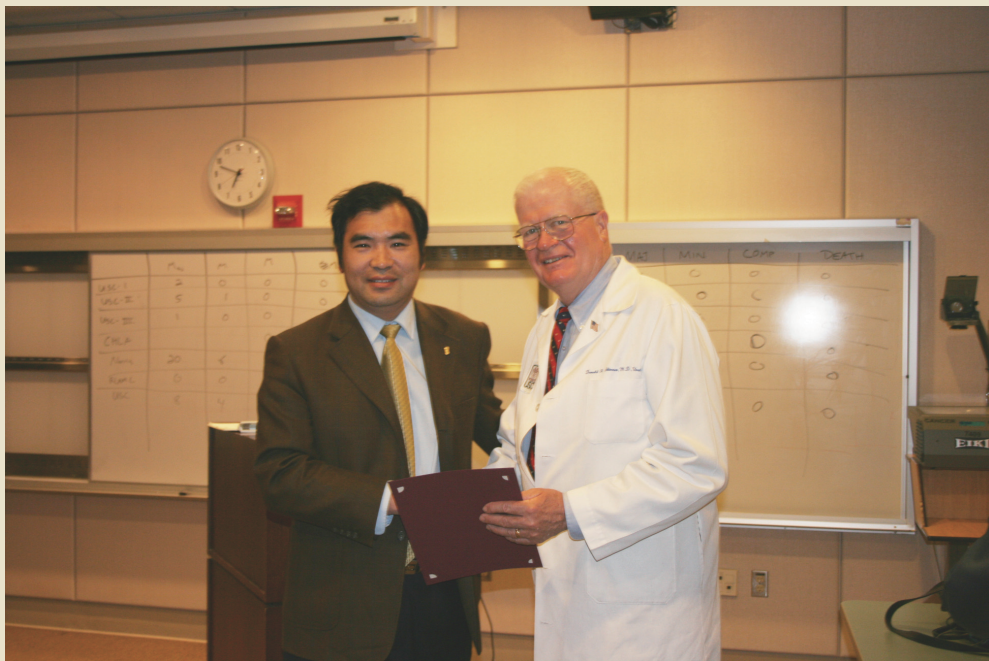
刘凤才

初睹临沂市人民医院院长助理、泌尿外科主任郭丰富之形象，我立即想起一个成语：名符其实！并在心中悄悄地为这位中年医学专家用打油诗画了一幅素描：“‘丰富’的个头一米八，丰富的浓眉齐刷刷，丰富的络须净呱呱，酷男疑来中南亚。”而其功夫、其成就、其个性，与其名字就更加相得益彰。于是，干脆给这篇写他的文字起了个题目：“名符‘丰富’”。

丰富的学养

2007年5月，郭丰富飞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他这次是被选派参加“中国泌尿外科将才工程”赴美考察学习的。此工程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泌尿外科重量级元老郭应禄教授于2002年策划实施的跨世纪之举，主旨是“走出去，请进来，至2020年使我国泌尿外科达到国际水平，为国家造就一批拔尖人才和领军人物”，被喻为中国泌尿外科的“黄埔军校”，入选者凤毛麟角。能作为来自沂蒙老区的“将才”参加这个工程，足以证明了郭丰富的基础实力，令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

郭丰富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滨州医学院本科，分配到临沂市人民医院工作。其后，先到第二军医大长征医院进修，又曾到青岛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丰富



扎实的理论基础与长期临床的大量实践，使他的学术修养如芝麻开花。此次在美虽只有两个月时间，却使他的医学理念与专业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回国后不久，他被泰山医学院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此之前后，他还被省内多家市级医院聘为兼职教授，并担任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主任、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等职。

丰富的学养不仅体现于专业。作为院长助理和科室主要负责人，他还具备良好的领导素养。交谈中，他反复地告诉我们，对他本人务必不要刻意拔高造势；自己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皆是市院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院领导热情关心与大力支持、同事们竭诚合作的结果。对自我之低调，对领导与同事之敬重，言恳意切，全非作秀。为调动与激励团队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他提出“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口号，使每个人都能崭露头角、独当一面。他带领全科40多名医务人员，团结一致，锐意进取。科室连获本院先进；多人担任省、市有关学会职务，先后获省、市、系统、医院的荣誉称号。科室实力达到了省内先进水平，成为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全国67个定点肾移植中心之一；2007年，被评为“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

丰富的学养还表现在医德修养上。他说：“作为医生，非但要医人，首先要医己，确以救死扶伤、造福人类为根本，摒弃杂念，一切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重症肾病患者治疗、特别是肾移植的成本都比较高，能否付得起高昂的费用，是医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患重症肾病的，不少恰恰又是青壮年。看到其父母家人心急如焚、肝肠欲断的情状，我们怎能忍心拒绝他们的医疗请求呢？”为尽量减轻患者负担，对每一病例，他与同事们都因人制宜，精制预案，在保证质量前提下，费用减少再减少、节约再节约。其中肾移植术的费用，在国内为最低。而对患者及亲属，他说：“不但要为其医病，还要晓理、医心。要耐心、实际地向他们讲清楚疾病的机理与规律，治疗的过程与预后，深化沟通，求得理解。绝不能一句简单的‘不好治、治不好’就打发了。”“竭诚以待，尽力而为，付诸真情，晓以道理。”郭丰富的见地与实践，对打开普遍存在、让人郁闷的医患纠结，促进医患和谐，不啻为一把仁德睿智之钥匙。

丰富的成果

郭丰富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实践与研究，特别在肾移植、结石、肿瘤、前列腺增生等诊断与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他始终坚持开拓进取，不断掌握专业先进技术，取得了累累硕果。

肾移植是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最理想的治疗方法，又是一项“高难动作”。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展开这项手术，至90年代初，全国累计只有3000余例。199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郭丰富，以其超凡胆识与扎实功底，率先在我市开展了同种异体肾移植，使市人民医院在治疗肾病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两年后，他又完成了国内首例单卵双生间肾移植，时过17年之久，患者至今生活、工作良好，引人注目与称道。近几年他每年完成70余例。至今累计超过1120多例次，1年人/肾存活率均在97.5%以上。特别是亲属活体肾移植，近几年每年超过50例，1年人/肾存活率达到了100%。

经皮肾镜术、前列腺电切术等现代腔内微创泌尿外科技术可用于多种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精度高，更便捷；腹腔镜下多种疾病的微创手术，创痛少，疗效好。这些先进技术，一一为郭丰富所熟练掌握运用，得心应手。至今，他已经完成此类手术近万例。不但解除了许多疑难危重病患者的痛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特别自2004年开展经皮肾镜术以来，共计碎石3500例次，效果显著。此外，他还掌握了不少治疗传统疑难病症的新技术。精湛之医术，斐然之成绩，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患者前来就医。

近5年来，郭丰富在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10篇，参编医学著作3部。承担省级



课题3项，其中“大于50岁供者活体亲属肾移植可行性的临床研究”为省科技攻关项目，2009年被省科技厅鉴定为国际先进，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本课题论文发表在《世界泌尿学杂志》上，被“SCI”收录。杰出的贡献，又使他荣获了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十大杰出青年”等众多荣誉称号。

丰富的个性

笔者非专事刺探个人隐私的“狗仔队”。然透视对象的性格内涵，解析人物的个性秘码，却能更有力地证明一个真实课题——专家是人不是神，是优秀的人而不是忽悠人的神。然而郭丰富个性之丰富，又大出我之所料。

他乐山乐水，且喜欢摄影，是个入段的“驴友”和“茄子师傅”。百忙过后，难得的闲暇之时，他会当一回闲云野鹤，来一个自驾游。远处不及，就在八百里沂蒙中徜徉留连一番，然后对着蓬勃鲜活的青山碧水，端起自己心爱的相机，“咔嚓”一下，定格一幅自然与生命的美丽娇娆。珍惜生命之美好，使他更加珍惜自己救死扶伤、再创生机的崇高事业，更平添了几分医者的责任与忧患。

他还喜欢文学，尤崇唐诗宋词，吟咏得颇有些体会，常陶醉于“明月清风”，也常激奋于“大江东去”。闻得此言，骇得我当即脊背冷汗。用我这拙笔，描绘塑造一个甚有文学造诣的学者，无异于班门弄斧，贻笑大方。好在丰富先生很给我面子，解释并安慰我道：“我只是爱好而已。好的古诗词，能让我更好地体味与感悟人生，既于宁净幽远之境中淡泊功名利禄，也于汪洋恣肆之豪气中激发责任使命。我并不胡乱附庸风雅。”这反使我更陡生了如坐针毡之难堪。

他竟然坦言尚悦杯中之物，好啜几口美酒佳酿。我大为愕然。一个以清醒冷静、一丝不苟为基本要求的医生，竟然不怕被乙醇燃烧了理性、麻醉了思维，让人匪夷所思。“当然绝对不能在工作期间饮酒，也不能贪杯无度”，他说，“酒本无过，错在滥觞。量所能及，恰到好处，激发活力，提升热情；友朋相聚，藉以开怀，推心置腹，增进友谊，和谐关系，皆大欢喜，其乐融融，何乐不为？”此言正中我之下怀。问之乐何，酒量几何，爽答曰：“浓香兰陵，半斤。”酒量显然是打了埋伏，谦虚诱敌之计。若与之平等推杯换盏，我定然被其修理成烂泥匍木。然我独喜清香，最爱二锅头。当时心下又生出一套酒之联儿：“兰陵王对二锅头，浓润喉对清爽口，三十八对五十六（度），大专家对小老朽。”果能与之对酌，定是十分快活之事。

一个严谨精细、成就卓然的医学科技专家，又是一个罗曼蒂克、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还是一个豪爽性情、痛快淋漓的侠士爷们。这就是丰富的郭丰富。

历任中共临沂地（市）委书记

卢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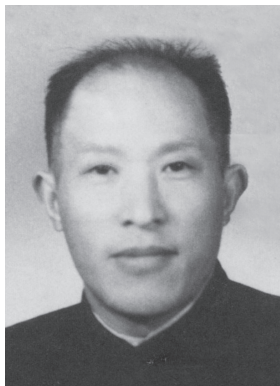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临沂市的现行政区划内，并存着两个地委，一个是滨海地委，一个是沂蒙地委。滨海地委和沂蒙地委均属鲁中南区党委领导，都是由新中国成立前沿革下来的。1950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取消区党委与行政公署一级机关及调整各地委、专署的决定》，将所属17个地委调整为11个地委。将滨海地委改为临沂地委。同时，将沂蒙地委改为沂水地委。1953年7月，沂水地委撤销，其所辖大部划归临沂地委。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山东分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临沂地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1995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临沂地区委员会”，成立地级“中共临沂市委”。



郑子久，1916年3月生，山东日照市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任滨海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治委员。1951年12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后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等职。1986年11月离职休养。



杨士法，1917年11月生，天津市宁河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至1951年1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88年4月离职休养。



张洪涛，1913年10月生，山东济南市人。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任中共沂蒙地委书记兼沂蒙人民武装部部长，1950年5月至1951年4月任中共沂水地委书记兼沂水军分区政治委员。后任农机部基建局顾问等职。1982年离职休养。



周星夫，1918年生，山东新泰人。1935年12月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2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4月任中共沂水地委代理书记，1952年9月至1953年7月任中共沂水地委书记兼沂水军分区政治委员。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1988年3月离职休养。



李华林，1920年2月生，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4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后任煤炭部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部党组成员等职。1983年12月离职休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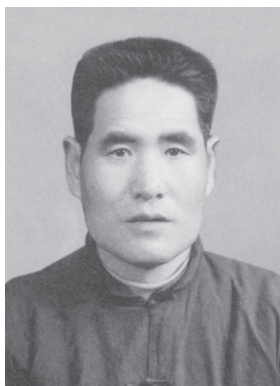
刘相，1923年1月生，河北清苑人。1940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1月至1973年9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后任六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等职。1982年离职休养。



朱奇民，1918年12月生，山东峰县（今枣庄市薛城区）人。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4月至1955年4月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55年4月至1959年7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1959年7月至1963年1月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1959年7月地委设书记处）。1975年5月至1978年7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后任山东省副省长等职。1993年离职休养。



李洪成，1926年12月生，山东招远人。1943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8月至1986年3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后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93年12月离职休养。



薛亭，1924年12月生，山东莱芜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1963年1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1969年10月至1971年11月任临沂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1年11月至1973年9月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地革委副主任。1973年9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地革委主任。后任山东省水利局局长。



刘明祖，1936年9月生，山东威海市人。1952年10月参加工作，195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3月至1988年1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王渭田，1939年12月生，山东曲阜市人。196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88年12月至1989年10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89年10月至1991年11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山东省农委主任、省长助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王久祜，1944年3月生，山东临朐人。1969年8月参加工作，197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11月至1992年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主持地委工作。1992年2月至1995年2月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5年2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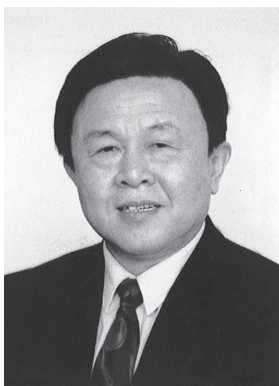
李群，1962年2月生，山东文登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2月至2007年3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等职。



张守业，1938年1月生，山东日照市人。1956年2月参加工作，195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9月至1997年12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连承敏，1951年3月生，山东荣成市人。1971年7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3月至2011年1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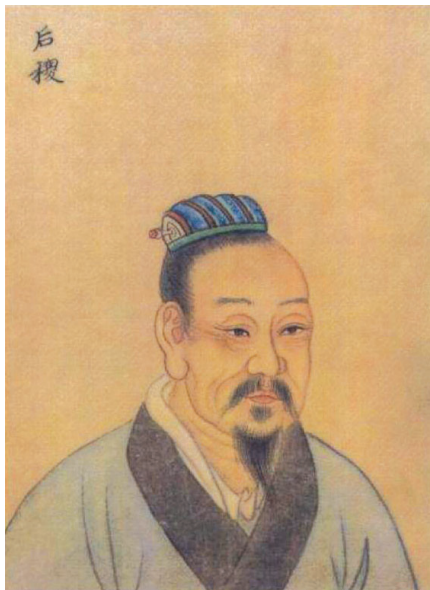
乔延春，1948年8月生，山东龙口市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张少军，1955年10月生，山东临朐人。1973年7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1月任中共临沂市委书记、临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临沂符氏

唐士文



符氏始祖后羿

1999年清明节前夕，临沂市侨办和兰山区侨办负责人告诉笔者，新加坡有一符氏宗族寻根团，将于明年春天来临沂寻根，希望能帮助搞清临沂符氏的现状与历史，以便做好接待工作。考虑此事涉及中外关系且对符氏历史有一些了解，便欣然应允。鉴于临沂符氏家族现在集中居住在临沂市兰山区朱保乡的符家行、港上、前寨和大岭镇的郭家庄4处村落，便拟定了专访考察方案。

是年4月13日下午，笔者和兰山区副区长丁成建、区侨办主任李兴民等在朱保乡乡长李云荣陪同下，首先到符家行进行考察。该村位于临沂城西北18公里处，西距朱保乡政府驻地大朱保2公里。它和其南面的陈围子、北面的刘家胡同自然村，共同组成陈围子行政村，村党支部书记由符其端担任。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符其端召集符其祥、符景林（87岁）、符景启（80岁）等9人座谈。符家行“其”、“秀”同辈，“维”、“广”同辈。“其”以上辈份依次为景、万、树、占，下辈依次为维、太；“秀”以上辈份依次为年、敬。并无统一的家谱遵循。

符姓老人称其先人墓地位于本村西南1.5公里处，原有碑，碑文记载很清，可惜碑被拉走垫了桥，难觅踪影。问及符氏历史名人，概莫能知。但他们提供了1963年符氏修家谱的情况，并说郭家庄符朝森家存有家谱。于是，我们在夕阳的余晖里赶到距符家行东南4公里的郭家庄。

符朝森老人76岁。他说：“符家行比郭家庄的符姓高七世。”谈及符氏家谱，他小心地从抽屉里取出。这本《符氏家谱》系1997年9月根据1963年所修家谱重抄。《序》中言：“我符氏祖居临沂城西十里堡，自明末清初迁居郭家庄，现已数百年矣。原有老谱因世乱遗失，始祖无从查考。我支祖讳全德，配曹氏，生四子：长子琇，次子瑛，三子璨，四子琳。长支和四支住本村，二支迁港上，三支迁居前寨。长子后人迁三里庄、玉皇庙，四支后人迁居散水口。”这本家谱以符全德为一世祖，二世琳，三世文缙，四世玉生，五世盈，六世崇敬，七世宗传，八世朝钦……直至第十一世。考此《符氏家谱》不但对明代以前的临沂符氏已“无从查考”，而且没有涉及与符家行符氏之关系。当笔者询问有无传说之类时，符朝森老人作了“听说我们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回答。

十天后，笔者到港上村采访。该村位于符家行东南约一公里处。村北麦田里立有一通石碑，系该村符氏第四代人为曾祖父符桂如、曾祖母王凤娴夫妇合葬墓所立，时间是民国十四年仲春（1925年农历乙丑年二月）。碑文由

尤宗泽撰写：“公讳桂如，字亦馨，祖居沂郡西乡郭家庄。自前清乾隆年间徙居港上村，勤俭自持，家道颇裕。又迁其父于村东港沟左岸以奉祭祀德。配王氏夙娴，闺训佐公。成家至今，乡里犹称道焉。余虽未闻其为人，未知其处世，今见其后世子孙瓜瓞绵延，家业勿替，知当年所言所行，谅必以忠厚传家开其先也。故略述梗概，以志不朽云。”

墓碑上，载符桂如4个儿子及后辈姓名：长男士琪，孙文烈，曾孙景□，元孙宗孝，六世孙敬瑞，七世孙连曾、连登。以碑记与郭家庄《符氏家谱》相较，二者除第三世“文”辈相同外，其余皆异。《符氏家谱》称符全德次子为符瑛，并言“二支迁港上”，那么，当为符瑛或其后人，然而碑文与《家谱》不合。符家行“景”辈上为“万”、下为“其”、“维”，港上村“景”辈上为“文”、下为“宗”，亦不合。由此可知，临沂城西各村庄的符氏现在已无规范之谱系；郭家庄的《符氏家谱》，只不过是符氏一支的“一家之言”。

家谱是某一姓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谱系的书籍，“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教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第七号文件语）以此来衡量郭家庄的《符氏家谱》，修撰者对符氏的历史知之甚少，内容浅薄。

事实上，符氏居住临沂，历史悠久，并非“明末清初”。《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有“沂州临沂人”符令奇及子符璘传记。符令奇初为卢龙军裨将，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叛乱时，符令奇带子符璘投奔昭义节度使薛嵩，“被署为军副”。后被叛军将领田悦杀害，唐廷“赠令奇户部尚书”。符璘字元亮，任过特进等职，被封为义阳郡王，并“赐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至李怀光叛乱，他率军征讨，因立战功，入朝为辅国大将军，又“赐靖恭里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符璘负责皇帝禁卫13年，65岁去世，追赠为越州都督。

符璘的后裔有一部分迁居陈州之宛邱（今河南淮阳县东南）繁衍（欧阳修《符氏族谱·序》）；一部分则在赐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以南的晋源镇）居住。宛邱一支有名人符存审、符元生等。符元生任广东南雄太守、中书令等职，于唐大顺二年（891年）奉命入琼州抚黎，成为今海南省40余万符氏的先祖。居住山西的符氏，有可能在明代时又回迁到祖籍临沂，符朝森老人所言，亦不会是空穴来风。现在各地都有多种姓氏之人，皆称自己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考《明史》得知，明廷在山西洪洞设置规模较大的移民办事机构，在此办完相关手续后，移民方陆续外迁，因此，“洪洞大槐树”使移民深植心田而难以忘怀。

符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关于其起源，唐代人林宝在所著的《元和姓纂》卷二说：“鲁顷公孙公雅为符玺令，因为氏。”就是说，符姓的起因，是因为鲁国国君顷公的孙子公雅，在秦国担任符玺令之职，便以符作为自己的姓。符，本是朝廷用以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所用的一种特殊凭证，以金、玉、铜、竹、木等材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之成整形以验真假；玺，本是印章的统称，秦代以后则专指皇帝之印。

对符氏的谱系，北宋著名文史学家欧阳修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为《符氏族谱》撰写的序言中作了阐述：“符氏本黄帝四世孙后稷。至十四世，文王生周公，周公生伯禽，封于鲁。至三十三世顷公，有孙公雅，仕于秦，为符玺令，因以符为姓，实琅邪人也。其后融居浚义，为东汉名贤。十余世孙令奇，生璘，仕唐，俱以忠义显。孙存审，徙居陈之宛邱，仕唐，官至宣武节度使，生彦卿。彦卿年十三善骑射，始事唐庄宗，为散骑指挥，历事晋、汉、周，爵至魏王。入大宋，迁太师，宠待甚厚。生七子七女，三女为后。太宗懿德皇后，乃第六女也。其在当时，贵盛莫及。自是而降，必有人才伟伟，代不乏人。”欧阳修言符氏得姓始祖公雅“实琅邪人”，公雅的后代符融迁到浚义（今河南开封市），并未交待符融的后人符令奇为何在唐代成为“沂州临沂人”。要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琅邪”的变迁进行梳理。

琅邪作为地名，最早源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琅邪邑。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有“吾欲循海而南，放乎琅邪”之说，便指此邑而言。琅邪邑位于今山东胶南市琅邪镇政府驻地夏河城村，其东南5公里处有琅邪台。西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国后，为北上称霸于诸侯，将越都由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迁到琅邪邑（《吴越春秋》），在此设置了琅邪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琅邪县设置琅邪郡，郡、县同一治所。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琅邪郡移治所到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市城关镇之东城子村）。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72年），琅邪郡移治所至莒（今山东莒县）。建武十七年，琅邪郡改为琅邪国，琅邪王刘京于建初元年至五年间（公元76年至80年），又将国都由莒迁到开阳县城（今临沂城）。后来人们称临沂“古曰琅邪”，自此始。

诚然，公雅在秦代的里籍琅邪并非临沂，但随着琅邪郡、国治所、国都几度由东北向西南迁移，作为郡望的符氏理所当然亦随之迁移，如东汉名贤符融就迁到浚义，便是证明。符令奇系符融的后代，唐代时就成为“沂州临沂人”，透出了符氏从浚义又回迁到临沂的史迹。据敦煌残卷《贞观氏族志》中将王、颜、诸葛、惠、符、徐列为“琅邪六姓”之一，符氏在唐代已是临沂名门望族，铁证如山。

欧阳修说符氏“人才伟伟，代不乏人”，言之不虚。仅以当代来说，就有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滨海区党委书记、滨海军区政委的符竹庭，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军分区副政委的符确坚，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南海舰队副政委符路、海南军区副政委符致洛等，他们都是符璘的后裔。

唐朝末年，社会动荡，临沂符氏有的因官守土，有的因避战祸，辗转迁徙到全国各地，诸如江西玉田，广东南海、南康，广西榕县，云南宣威，福建莆田，浙江诸暨以及海南、香港、台湾等地。而侨居海外符氏分布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美国、丹麦、加拿大、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据台湾省文献会表示，在本省的台北、宜兰、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彰化、台南、花莲、澎湖等地，处处都有符姓籍人士的踪迹，而且整个家族不断地在繁荣滋长，族人也一年比一年增多”。（1994年《第七届世界符氏恳亲大会会刊》）

2000年4月9日至11日，以符敦垣先生为团长的新加坡符氏社（祖祠）宗族寻根团一行10人来到临沂，笔者应邀在羲之宾馆向客人介绍《临沂符氏现状与历史考察》，受到新加坡客人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寻根团联络员符安儿女士告诉笔者：“之前我们对琅邪郡的演变不了解，这次来不虚此行。”之后，寻根团到符家行、港上村、甘露寺和郭家庄考察，表示“非常满意”。



姓氏百家漫谈——李姓

赵丹峰

一、李姓起源与族群发展

李姓是中华大姓。李姓出自嬴姓，系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皋陶（亦说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史记·五帝本纪》）。尧帝时代，大理主掌司法，其职权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皋陶任大理时，主持制定了五种刑罚，史称为“五刑”。皋陶断案如神，从未出过差错。受其影响、教益，其子孙世代皆为理官，遂以官为氏，人称为“理”氏。

至商代末年，裔孙理征因直谏不容于纣王，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便与儿子理利贞一起逃至伊侯之墟，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古称苦县）境内，靠摘食野外树林中的果实（古称为木子）充饥，母子方得以生存下来。为报果子（即木子）的果腹救命之恩，因“木”、“子”成“李”，且“李”又与“理”同音，利贞遂改“理”为“李”，这便是李姓的起源。后来，利贞生子名昌祖，成人后仕陈国大夫，李姓一族便慢慢繁衍发展起来。又晋有里克，卫有礼至，皆理氏之后，与李同源。



李氏宗祠：李家龙宫

先秦时代，李姓中虽然出了李耳（老子）、李悝、李斯等名人，但从其家族发展的总的方面来看，李氏一族还显得较为沉寂。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李姓族人便开始活跃于中国舞台上。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巴氏族的李雄继承其父李特及叔父李流成为蜀地流民军首领，攻克成都。翌年，建立成（汉）政权，建元为建兴。建兴三年（公元306年），李雄即皇帝位，成为李姓称帝的第一人。旋即，赵郡李氏崛起于今河北一带，与博陵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合称为中原五大郡望。在关陇地区，又有陇西李氏显昭于世。作为陇西李氏之裔的李暠，出身于凉州望族。天玺二年（公元400年），李暠自称为梁公，成为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的建立者。从此，这支陇西李氏族人在政治上名声远播，唐朝的创建者李渊即是李暠的后裔。故《明伦汇编·氏族典》云：“李氏十一望，赵郡最贵，陇西次之，唐即陇西望也。”

李渊建立唐朝后，李姓族群的繁衍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由于李姓成为国姓，其他姓氏的人便纷纷改姓为李，并引以为豪。除了自愿弃原姓而改姓李者（俗称为冒姓），还有被皇帝赐姓李者。这些被赐姓李者，有的属有功之将，有的则是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如唐初名将徐世勣，在李氏开国后，即被皇帝赐姓为李，为避太宗李世民名讳，便单名勣，即为李勣。唐末名将宋文通，因护驾有功，便被唐僖宗赐姓李，名茂贞。大唐西北有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其首领姓拓跋氏。后来这一部落归附了唐朝，其首领便被赐姓李，改汉名为李继迁，此类情况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李姓在唐代近300年的时间里，其族群规模和人口数量都有了超常规的壮大与增长，使之从原来一个影响较小的姓氏，发展成为中华大姓。在临沂市，李姓亦是大姓。

二、李姓名人述略

李姓不仅族群庞大，而且所出名人甚多。说到李姓名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应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是春秋战国著名的哲学家。其家乡苦县，正是李利贞改“理”为“李”姓的避难之地，故古代姓氏典籍称利贞为“老子之祖也”。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其著述的《老子》（亦称《道德经》或《老子五千文》），是道家的主要经典，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

《老子》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此书保存了许多古代天文、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资料，还涉及军事与养生之道。老子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的很多学者均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老子的思想。道教，这一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宗教，则敬奉老子为其教主，尊称其为“太上老君”。

战国时期，李姓中出了两位政绩卓越的重要官吏，一位是魏国宰相李悝，一位是秦国蜀郡守李冰。李悝在魏文侯时任宰相，他主持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功劳与能力选拔官吏；鼓励农耕，增加产量以尽地力；行平余之法，以平抑粮价，使魏国得以富强。作为著名法家，李悝还汇集各国法律，撰著《法经》6篇，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李冰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至五十六年（公元前256～前251年）任蜀郡守。发源于岷山之南的岷江，自山区转入成都平原之后，流速陡降，既易淤又易决，故使成都平原水灾频仍。作为水利家的李冰，熟谙天文、地理，到任后，即访察水脉，因势利导，修建了都江堰排灌水利工程，取得了防洪、灌溉、航运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益，于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至今2200余年来，都江堰以下内江、外江灌溉总面积达到800余万亩，苍莽的川西平原因此被誉为“天府之国”。李冰这位世界著名的古老水利工程的设计建造者亦被后世崇奉为川祖，在唐代即建有4座庙宇专祀李冰，以纪念这位泽及川蜀的伟大水利专家。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年轻时曾师从荀子，后为吕不韦舍人。追随秦王嬴政后，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秦王朝建立后，李斯任

丞相，他建议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还参与制定法律，统一车轨、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和统一度量衡制度。李斯工书，泰山、琅琊等刻石，传说均系他所手书。但是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亦是李斯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而建议秦始皇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这导致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百家语》均被付之一炬和460多名方士、儒生被坑死于咸阳的惨烈事件，开了文化浩劫与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秦始皇和李斯因此而为后人所诟病。

汉代，李姓中走出了一代名将李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不少人正是从上述耳熟能详的诗句中，对这位善射骑的一代名将有了大致的了解。李广历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三朝，先后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等七郡太守，为卫国戍边前后与匈奴作战70余场，使匈奴畏服不敢犯边，称其为“飞将军”。任七郡太守40年间，凡得赏赐，即分与部下，且与军吏、士卒同饮食、共甘苦，深受部下拥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部下中有的后来被封侯，而他却终生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所谓“李广难封”即指此而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从大将军卫青出塞，受命迂迴单于侧翼，因迷路未能参战，遂愤愧自杀，令人扼腕叹息。

三国及晋初，产生了两篇以奏表为体裁的著名散文。前一篇名《出师表》，系蜀丞相诸葛亮所作；后一篇曰《陈情表》，为晋初李密所撰。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北伐曹魏之前，向后主刘禅上了这一奏表。在奏表中，诸葛亮13次称引先帝，表达了对刘备的怀念之情，坦陈了自己对蜀汉忠诚尽职、以期统一中原的心迹，情出肺腑，感人至深。李密系三国蜀晋间的著名文学家。其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全赖祖母刘氏抚养成人。后主刘禅时，任太子洗马。晋灭蜀后，李密聚徒讲学。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立太子，累诏李密任太子洗马，李密以祖母刘氏年迈无人奉养为由，坚辞不往。作为亡国之人，李密担心拒诏不任会引起晋武帝的误会，以为是矜守名节而不肯赴诏，于是，他便撰此奏表，委婉曲折地强调了自己的特殊身世，说明必须侍奉祖母而不能奉诏赴任的缘由。李密在奏表中称自己“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此表文辞婉转凄恻，情真意殷，读之令人动容，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诵名篇。两表写作时间只相隔四十年，故后人常将两表并提，有人甚至发出“读《出师表》不哭者谓之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谓之不孝”的感慨。

李安世乃赵郡李氏之裔，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思想家，均田制的首议者。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鉴于当时因长期战乱，北方人口大量迁徙、死亡，土地荒芜，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甚为混乱，从而严重影响赋役征收的现象。从富国强民这一大局考虑，李安世遂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均田制的建议，即按人口分配空荒土地，为农耕种，但所授之田不得买卖，待年老及身亡后即还田于官府；初授田男子另授给桑田，桑田可传子孙，但不许买卖。李安世的建议得到了孝文帝的首肯与采纳。虽然均田制所分之田仍系荒地，并未触动地主的原有土地，但毕竟使大量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因此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北魏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此后，北齐、北周政权乃至隋、唐两代皆沿袭此制，只是办法略有变更而已。

隋代，李姓中出了一位能工巧匠，他就是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赵州桥亦称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洺河上，隋大业年间（公元581~681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此桥。桥系单孔，全长50.82米（一说64.40米），桥面宽约10米，跨径为37米余，拱圈由28条并列的石券组成，上设4个小拱，既节材减重，又便于排洪，且具增美之效。其设计与建造工艺之新，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典范，其跨度之大在当时亦属创举。此桥从建成至今，历经1400余

年风雨仍安然屹立，已成为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宝贵物质文化遗产。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乘隋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之际，起兵举义取长安。翌年登基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将帝位传给次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太宗即位后，改元为贞观。唐太宗在任24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在发展科举制度的同时，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他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轻徭薄赋，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立国一百年间，经济得到不断发展。延和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先改元为先天，翌年改为开元。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为相，整顿武则天执政后期以来的弊政，形成了政治安定清明、经济繁荣发展的昌盛局面。斯时，“丝绸之路”畅通，海上航运渐有发展，中亚、西亚、及日本新罗等国纷纷派员来唐访问、学习，大唐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为时30年的辉煌时期，被誉为“开元之治”。李隆基执政后期，由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把持权柄，政治腐败，加之爱好声色，生活奢侈荒淫，待“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国势由盛转衰。



唐太宗李世民

李渊及其后裔立国执政近300年，客观上为李氏一族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历史舞台，使李姓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名冠古今的旷世英才。在统军征战方面，以李勣、李靖、李光弼名声为显。李勣乃唐初名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与李靖合击突厥颉利可汗，翌年平定东突厥。李勣善于用兵，史称其“临兵应变，动合时机”。每战告捷，他便推功于部下，故深受部属拥戴，致军心合力，所向皆克。李靖亦为唐初名将、杰出军事家。贞观三年，他与李勣合伐东突厥，翌年俘其首领颉利可汗，灭东突厥。贞观八年，督军西征，翌年平定吐谷浑。因战功卓著，与李孝恭等24人被图形于凌烟阁。病卒后陪葬于太宗昭陵。李靖用兵深谋而果断，著有《六军镜》和《李卫公兵法》等兵书。二李齐名，后人论及唐代名将时，必称“英卫”（李勣被封为英国公；李靖被封为卫国公）。李光弼乃唐中叶名将。父李楷洛，本为契丹族酋长，武则天时归唐。安史之乱发生后，时任河东节度使的李光弼与郭子仪合兵击败史思明，收复十余郡。长安陷落后，他回师据守太原，以不足万人之兵屡败史思明的十万大军。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大败史思明于河阳，一举收复怀州。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晋封为临淮郡王。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其战功被推为中兴第一。

李百药和李延寿系唐初史学家。唐贞观元年，李百药奉诏修撰《五礼》及《北齐书》。其父李德林在隋朝时曾奉诏修北齐史，书未成而卒。李百药承继父未竟之业，专修《北齐书》，至贞观十年书成。李延寿系陇西李氏之裔，唐贞观中，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后官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其父李大师为纠南北各朝史家修史只重国史的诸种缺陷、疏漏，立志遵《吴越春秋》体例，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然未成而卒。延寿承父志，伏案笔耕，历时十六年，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将《南史》80卷、《北史》100卷呈献给高宗李治，深得嘉奖。在二十四史中，他是唯一独立完成两部正史的史学大师。

唐朝是诗的王国，而摘取诗歌成就皇冠者当属李白。李白少有逸才，遍读百家，喜好剑术，志气如虹。25岁时仗剑去国，出川远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社会生活深有体验。他广交文友，把酒唱吟，一生赋诗千首。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清新俊逸，音律和谐多变，构成了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炫目色彩，是继屈原之后最富个性特色和浪漫情愫的伟大诗人，达到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等诗句，历来被广为传诵。李白还与临沂（时称琅邪郡）结下了诗缘：天宝四年（公元475年）秋，李白和杜甫来到沂蒙，畅游蒙山，踏幽览胜。在东石门，二人行将分别之际，李白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醉后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表达了李白对杜甫的兄弟般友谊和依依难舍的惜别之情。二人揖别后，李白在南下吴地途中，路经酒乡兰陵，受到热情款待，酒酣之际，吟出《客中作》（亦名《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此诗既赞誉了兰陵美酒的香醇，又道出了诗人对当地主人盛情款待的真诚谢意。李白一生以酒为伴，酒酣之时，多出佳句，他在来临沂时写下的上述两首诗，均与美酒有关。“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下的上述诗句，既是对李白雄奇飘逸诗风的绝佳评价，同时亦为李白与美酒、美酒与诗作三者之间的内在互为关系，做了最形象、最贴切的注脚！

李益、李绅、李贺、李商隐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的边塞诗写得极好，尤以七绝见长。“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都是其边塞诗中为人称道的佳句。李绅系唐武宗时宰相，其诗以短小精悍著称，时称“短李”。所作《悯农二首》最为有名，如第二首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句，语言质朴，寓意精辟，至今仍是国人无论男女老幼皆能成诵的名句。李贺亦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其诗想象清新，语言华美，创造出瑰丽幻诞的意境，被称为“奇才”、“鬼才”。其在《李凭箜篌引》中，以“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诗句，来形容乐师李凭弹奏箜篌的美妙乐声，体现了他奇特诡异、出神入化的浪漫风格。李商隐是晚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其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和七绝，写得都极出色。他在《夜雨寄北》中写下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句，被广为传诵，其中“巴山夜雨”和“西窗剪烛”已成为表示怀念之情的成语。其在《无题》中吟哦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句，更为千古传诵。故清人杨成栋赞誉其为“镂心刻骨之词。千古情语，无出其右”。

谈及五代十国时期李姓名人，人们自然会想到南唐君主李璟、李煜父子。父子二人的声名并不在治国之绩，而是在词的创作方面。李璟，世称中主。爱好文学，尤工小词，和其子李煜与丞相冯延巳等人形成南唐词的创作中心。其词今存4首：《应天长》《望远行》和《浣溪沙》2首，皆为感时伤秋之作。其中《浣溪沙》中有“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为王安石所激赏，历为传诵。后人称其词“语短情长，文小旨大，蕴藉含蓄，耐人寻味”。李煜系南唐末代皇帝，世称李后主。他多才多艺，词的成就尤为突出，今存词30余首。其词分为前后两段，前期多写浮华的宫廷生活，后期则以亡国后的悲凉怀旧为主。李煜擅长白描，语言流走似珠，风格清婉感人，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是其后期的代表作。如《浪淘沙》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句，抒发了乱离之际惨淡人生的普遍感受，动人心魄，极富感染力。后人将父子二人

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宋代，大臣李纲作为力主抗金的民族英雄而被载入史册。自古英雄命运多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败盟南下入侵大宋，李纲上疏请徽宗赵佶禅位于太子。钦宗赵桓即位后，李纲反对迁都，积极备战，迫使金兵北撤。不久，他却被以“专主战议”之名遭谪。翌年，高宗赵构即位，李纲拜相，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在职仅75日，即遭投降派排斥而罢相，贬任湖广宣抚使。在此困境中，他写下《病牛》诗以名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一腔报国为民之心跃然纸上。李清照系南宋著名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州章丘人。其父李格非系著名学者，其夫赵明诚乃金石考据家。李清照生活在金兵侵据中原、本人流寓南方的战乱时期，其词多感叹身世，亦不时流露出对故乡中原的怀念之情。其词善用白描，语言清丽。其《如梦令》中“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句，被王士禛誉为“人工天巧，可称绝唱”；《一剪梅》中“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和《醉黄花》中“莫道不消魂，人比黄花瘦”等，均是被广为传诵的名句。

元、明、清三代，李姓名人主要有：政治家李善长，系明代开国丞相，明初典章制度多由他参与制定。后因胡惟庸案被牵连赐死。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李攀龙，二人分别系明代文坛上“前七子”和“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强调真情，倡言复古。在明代，李姓以其卓越成就而惠及千秋世代者，当数大医药家李时珍。李时珍祖上世代业医，他继承家学，着重研究药物，重视临床实践与革新。上山采药时，经常请教于富有实践经验的各类民众，纠正了古代本草书籍的某些错误，收集了整理宋、元以来民间发现的药物，经27年艰辛努力，著成52卷的医药名著《本草纲目》。此书收载药物1892种，对每种药物的产地、形态、采集、辨疑、炮制、功用等均作了详实的解释说明；还收刊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11000余首。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我国医药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我国药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素为世界药物学者和植物学者所重视。

闯王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由于起义军领袖在胜利后骄傲自满，军纪松弛，追求享乐，明将吴三桂勾结满族贵族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终成悲剧英雄。

清代重臣李鸿章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洋务派和淮军首领，他于19世纪60年代始，就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先后开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方言馆等洋务事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军舰，建立了北洋海军。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但在对外交涉中李鸿章一贯主张妥协，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备受国人诟病。李方膺是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他与临沂有着不解之缘。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李方膺代署莒州知州，仕莒期间，倡导教化、整修学宫，并主修《莒州志》。雍正十二年，他调任沂州府附郭兰山县知县。为不加重民众负担，他拒不执行虚报开荒田亩数，触怒东河总督王士俊而下狱。百姓闻知后前往探视遭阻拦，遂自狱墙外纷纷向监内投掷钱币食物，致使“瓦沟几满”。李方膺擅画松竹梅兰，尤爱作梅图。他作画常托物寄志，如在一幅梅画旁即题诗道：“最爱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表达了自己耿直不屈的心声。李方膺的画在临沂影响颇大，斯时，临沂一些以卖绣花枕头顶为业的穷苦人家，皆争相仿效临摹李方膺的画作，以其作为枕头顶图案，有的人居然以此成名。

近现代以来，李姓名人层出不穷。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而名垂青史。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李姓人士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共和国上将，其中有8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是：李富春、李德生、李先念、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李长春、李克强。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们为国家的建设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李宗仁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1938年春，时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组织了徐州会战。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亦为徐州东北的重要屏障。2月，李宗仁调第四十军庞炳勋部驰守临沂。自3月2日始，四十军与从莒县南犯的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部在汤头至九曲的沂河以东地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况异常惨烈。在庞部减员甚大的紧急情势下，李宗仁决定调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急援临沂。庞、张二人过去因故曾结怨较深，在此紧急关头，李宗仁悉心申明国家安危的利害关系，使庞、张二人重归于好，张自忠率全军官兵急驰临沂，于14日强渡沂河，在太平一带突袭日军右侧背，使敌死伤甚重。在李宗仁的指挥与协调下，庞、张两军合力抗敌，取得了阻击日军精锐部队长达50天，毙伤敌8000余人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五、十两师团原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围歼孤军深入的敌第十师团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役作为临沂抗日战争中歼敌最多、规模最大的重大战事被载入史册。

在文化领域，有一批李姓人士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在科技界，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台湾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和美国物理化学奖与国家科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等；在社科界，有著名哲学家李达（他所著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马列主义教科书），考古学家李济（他在1926年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考古发掘），著名红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著名美籍犯罪学专家、被尊为“现场重建之王”的华裔“神探”李昌钰和台湾文化名人李敖等；在文学界，有文学大师巴金（本名李尧，字芾甘，其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作家李季、李準和山东籍作家李广田、李存葆。其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李存葆的代表作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和报告文学《沂蒙九章》，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对“沂蒙精神”作了形象化的阐释，发表后，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艺术界，有著名画家李苦禅和李可染，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其代表作《歌唱二小放牛郎》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被广为传唱，他还为毛泽东主席的37首诗词谱了曲）等人。

在人民解放军队伍里，还有一位事迹感人的临沂籍英烈，他就是生于沂水县诸葛镇东埠前村的著名烈士李遥德。1949年1月，刚刚结束了辽沈战役的解放军四野将士挥戈南下，发起了解放天津的攻坚战。时任团参谋长的李遥德，率部攻至耀华中学后，被以地堡为依托的敌强大火力网所阻，眼看着众多战友遭敌人火力网扫射后纷纷倒下，心急如焚的李遥德毅然推开警卫员，扑向敌人火力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为扫除障碍、夺取战役的最后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遥德因此成了全军唯一一位用身体堵敌机枪口的团职领导干部，其事迹比黄继光堵敌机枪口的壮举早了近4年的时间。国庆五十周年时，天津驻军派员将烈士的亲人接到天津，参加了天津举办的大型特别节目“祖国在我心中”现场直播活动。李遥德的感人事迹再次在天津人民心中引起强烈反响。

李光仪、李澄之系临沂城里人，父子二人是山东近现代史上的名人。李光仪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丁惟汾、刘冠三等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山东分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其子李澄之于1940年被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主任，建国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分管全省农业工作时，曾骑着毛驴深入沂蒙山区开展调研，“李省长骑毛驴进山”至今在沂蒙山区仍被传为佳话。

一部彰显地方特色的方志佳作

——简析《邗江县志（1988-2000年）》

李 华 徐希冕



清 袁耀《邗江览胜图》

《邗江县志（1988-2000年）》（下简称《邗江县志》）是一部优秀的地方志书。该志书在翔实记述了江苏省邗江县的政区演变、自然、经济、社会的基础上，着重记述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如何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村庄社区化、经济发展外向型化的历史进程。该志书在编章节目的设置上进行大胆创新，通过大量彩页、随文图片、表格、附记等方式，在志书内容上重点突出了邗江县的地方特色。

《邗江县志》突出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突出了地方环境特色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沿海和内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导致一个地方在自然、历史发展以及人文氛围的个性化特色。《邗江县志》突出地方环境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特的自然环境。邗江县隶属扬州市，濒临长江、淮河，京杭运河、古运河流经全境，瓜洲古镇闻名于世，地理环境的独特性造就了邗江县独一无二的地理特色。《邗江县志》首编“政区·环境”下“地形地貌”章分四节，把邗江分为“丘陵地区”、“沿湖平原地区”、“高沙土地区”和“沿江平原地区”等节；在“水文 水系”章以实体设节，记述“长江及入江河道”、“淮河入江河道”、“邵伯湖”等，这些章节记述清晰明了，邗江地理的独特性一目了然。另外，在记叙气候、物候、土壤等自然环境的要素时，该志书则记叙详细，数据

统计精确、全面。在物候一节中，以列表的方式，根据二十四节气和月份记述邗江县常见物候及农事活动一览，并以四季为时节附有86条农谚，形式独特，富有地方气息，极具有可读性、实用性。

(二) 独特的历史环境。一是突出邗江县悠久的历史，在首编“政区·环境”设“建置沿革”一节，突出展现近2500年邗江县的建置演变，即从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到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并附有2000年12月2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邗江撤县设区的批复。在附录部分，附有“邗江区域历史溯源”和“地域变迁考证文选”，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记述了邗江县历史的悠久和环境的变迁，有理有据。二是在志书正文的编撰中重点突出新时期的历史境况，注意记述新时期邗江县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每一阶段各行各业的变革以及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背后的原因，包括变革的理论支持和现实环境，突出了新时期改革如何克服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三是表现为关注典型和重大历史事件资料的收录和记述。在正志中附记了“蚕茧大战”等事件经过，在附录中，收录了邗江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民营经济以及农村基本现代化和事业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件、两份关于晋级考核和事业单位发展改革的调研报告、邗江人民革命斗争史略、插队知青专记等典型历史资料。这些典型重大历史资料的收录和记述，具有真实性和独特性，应用价值高。

(三) 独特的人文环境。《邗江县志》的编撰涉及“人文”史料范围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科技、宗教、社会习俗、风景名胜、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志书中人物志、艺文志等部类，各部分记述得当，富有文采，更好地展现出邗江县的地方人文特色。

二、突出了地方时代特色

《邗江县志》记述的时限为1988—2000年，正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计划经济正急速转化为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迎来社会的全面转型，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邗江县志》能够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线，以宏观理论背景分析和微观事实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阶段性、曲折性。

为体现邗江县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特别是展现邗江县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貌以及发展过程，《邗江县志》采取“大集中、小分散”和“升格法”的方式，在篇目设置上进行创新，专门设立第七编“经济改革与发展”编。而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财政以及社会工作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则分散在各个编目之中，采取分散记述的方法。第七编共分四章，分别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其中在经济体制改革又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和建筑业体制改革以及流通业体制改革，集中展示了邗江县经济改革中各个领域改革大势。总的来说，第七编经济改革与发展编，从所设置的篇目来看，由表及里，环环相扣，记述紧扣时代脉搏，既有宏观的概述，也有较为细致的剖析，如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重点记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and 农村产业化经营基本情况，包括政策成因、过程以及效果。《邗江县志》独立成编记述经济改革的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了时代特色，应该成为志书突出地方特色重要标杆。

《邗江县志》对改革开放的记述，不仅仅体现为把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独立成编，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各行各业的新发展、新变化。如工业编突出邗江县民营化、外向型、特色性乡镇企业的发展；在第五编“城乡建设编”注重农村城市化过程，突出“新型小城镇建设”和“示范中心村”的建设；在畜禽和水产业养殖突出新时期特种养殖的发展和养殖方式的变革；在“对外贸易”编，重点记述招商引资、合资企业、出口情况，以及劳务合作和境外经营；在服务流通业，详细介绍了金融业商业化和新兴保险业的发展，以及新出现的娱乐、广告、旅游、咨询、家政、干洗、物业管理等服务行业；另外该志书对于改革

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引起的邗江人们交通和通信方式、教育和医疗水平、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精神风貌和文明素质等方面的根本变化记述的非常全面、细致。

总之，各行各业的记述能紧扣时代脉搏，层次分明、详略得当，展现了邗江县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

三、突出了地方产业特色

《邗江县志》在篇目设置通过“产业升级”的办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将邗江的传统支柱产业牙刷业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异军突起的衬衫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升格成章，分别独立设两编，第十编“牙刷业、衬衫业”，第十一编“建筑业、房地产业”，紧扣时代发展主题，比较鲜明地展示了邗江县具有地方特色的各产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注重突出传统支柱产业。牙刷业是邗江县的传统和特色产业，邗江县杭集镇被称为“牙刷之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本章主要设“牙刷工艺演变”、“牙刷生产”、“牙刷效应”等节，记述自清道光年间（公元1826年）设作坊制作牙刷开始，通过图片、表格统计等形式，展现了近两百年邗江县牙刷业制作工艺的演变、牙刷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牙刷销售模式的转变等。本章立足产业发展源头，以历史为经，以事物发展为纬，数字精确，记述全面。

（二）注重突出新兴产业。邗江县的衬衫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伴随着邗江县市场化改革、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渐做大、做强，成为新兴支柱产业。《邗江县志》把这三项新兴产业独立成章，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各个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邗江县被称为“衬衫王国”，在“衬衫业”这一章主要记述衬衫产业发展的产业化进程、产品生产工艺、品牌包装的发展状况、产品的开发、衬衫销售体制的变革和销售市场的开拓。在建筑业（包括装饰、安装、船坞工程，门类齐全）和房地产业主要介绍了邗江县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过程、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规模、行业管理情况、以及主要的建筑工程和房地产项目简介等。

（三）注重展示各产业风采和企业风貌。为了突出邗江县支柱产业的特色，《邗江县志》主要在介绍各产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展示各产业风采和企业风貌。如在“牙刷业”主要反映了牙刷产业的历史悠久、产业的发展变革；在“衬衫业”和“建筑业、房地产业”主要突出在新时期市场化进程中，各产业勇于开拓创新，根据市场变化求发展，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的行业精神，如在建筑业中介绍邗江建筑业如何立足省内市场，勇于走出去，开拓国内各地市场的壮举。在“牙刷业、衬衫业”都有“牙刷效应”和“衬衫效应”，独立成节，分“产品效应”、“产业效应”和“区域效应”，突出牙刷业和衬衫业如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如包装、印刷、日化、物流、服装、乡镇工业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形成邗江地方特色产业和区域效应。不仅如此，在每一产业后面都加上“企业选介”，介绍各个产业的重点企业，突出每个企业的发展状况、技术与规模，以及每个企业如何在新时期做大做强，突出了企业的风采。

四、突出了地方文化底蕴

《邗江县志》的修编，充分发掘和突出了地方文化底蕴，同时坚持与时俱进，注重展现了新时期的文化成果。

首先，《邗江县志》对新时期新文化的记述，突出挖掘了新时期文化的内在价值——现代文明。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新时期新文化，表现为在改革开放的

背景下两个文明的并轳发展。该县志首先把反映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的基本定位。因此，邗江县志第七编经济改革与发展，第九编工业编记述工业企业所有制变迁、八个工业门类，第十编的牙刷业、衬衫业等是该志书最靓丽的篇章，深刻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进程。现代工业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基本内涵，正是在邗江工业现代文明的发酵下，邗江县的各行各业才取得丰硕的成果，人民的生活面貌才焕然一新。不仅如此，邗江县志还突出展现了邗江县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志书单独设第二十八编“精神文明创建”编，通过一系列的创建活动，展现了新时期邗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的新风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斐然。两个文明的建设正是邗江突出新时期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在价值。此外，县志还在第二十三编“文化体育”编中，详细记述了新时期邗江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即如何开展“星级文化站”、“明星文化中心”、“群众文化先进乡镇”、“农村儿童文化园”等创建活动，并有计划地推进“小康文化示范镇”、“万册图书馆”和“知识工程”建设的具体做法。另外在“文学艺术”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邗江县文学诗词、篆刻书画、音乐舞蹈的创作发展情况，并在第六章“艺文志”中，以列表的形式展现了新时期邗江籍（客籍）部分作者著述出版情况，在“现代文学作品选录”一节中附新时期当代邗江人的一些文学作品，并在作品后附作者个人简介。

《邗江县志》在书写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时，既注重内涵的挖掘，同时也注意外在形式的展现，突出了邗江县新时期新文化的地方特色。

其次，立足于传统，充分展现了邗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重点突出法。在二十三编“文化体育”编，专设第六章“艺文”第二节“古代诗词、楹联、记文选录”，记录唐代以来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王安石、王士禛、郑燮等伟大诗人歌咏邗江的诗词选录37首，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弘历、阮元等人楹联30副，择选王英、王士禛、焦循、阮元等人记文9篇，同时还附有作者简介小记。这些古诗文不仅见证了邗江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记述了邗江地方风情，反映邗江县的地域民族特色。

二是采用升格独立成编法。为表现邗江县悠久历史孕育的丰厚文化，折射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风采，志书采用了升格独立成编法，专设第二十四编“历史文化遗产”，分两章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章分为“运河文化带”和“西山汉墓群”和“名人墓葬与故居”，展现了运河作为邗江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运河两岸风韵独特的文化带，以及邗江县悠久历史的积淀和邗江的人杰地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章，立足于地方民间历史传统之中，详细记述了具有邗江民族和地域特色代表的“香火会”、“跳娘娘”、“杭集花鼓戏”、“扬剧”、“杭集杨邦雕版印刷”、“民间传奇故事”，记述完整而精彩，包括成因、形成过程、基本特色、代表作品以及代表人物和在新时期的发展状况，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三是《邗江县志》突出了邗江县独具特色的民俗、方言文化。文化就存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之中，民俗和方言是一部厚重的地方发展史。《邗江县志》在社会生活编专设“民风民俗”和“方言 谚语 歇后语”两章。民风民俗一章不仅介绍了邗江县传统的节日民俗和现代的节日和民俗（如国庆节、植树节），而且详细地记述了邗江县特有的礼仪风俗，如婚嫁、生育、寿诞、建房、丧葬和交际的主要习俗，记述详实，如婚嫁，分合婚、订婚、嫁娶三个步骤，详记了旧时到现代的礼仪变化过程。另外还根据二十四节气设“农令习俗”一节。

“方言 谚语 歇后语”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邗江方言分片情况、形成历史、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情况等，另附谚语269条，歇后语209条，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五、突出了地方人物风采

中国修志就有“古来方志半人物”的传统，作为“志中之志”的人物志更是重中之重。

邳江县人杰地灵，历史英才辈出。为写好邳江的人物志，该志书一方面坚持“生不入传”的修志传统，另一方面在记述人物方式创新入手，采用正文附录、人物简介和名录的方式，记录改革开放后邳江县各行各业涌现的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突出了他们不平凡的事迹和人物风采。

一是注重人物入志，首先志稿中大量采用了以事系人的手法。《邳江县志》坚持“以事系人”志书编写原则，突破过去很多志书记事不记人的桎梏，在叙事中表现人物在事物发展中开拓和带头作用，如工业的开拓和创业者，农业中的种植和养殖业户等。把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行业涌现出的各类模范人物、拔尖人才，通过记述事物的发生、发展，反映人物的事迹和贡献，从而全面突出了邳江县各行业人物的风采。

二是以“附”随文简介的形式集中介绍人物某方面的事迹，突出了人物的风采。通过这种“附”的形式，人物随文简介，对于各行各业有影响，作出贡献的在世人物，该志采用的是人从文出，随文附人物简介的方法。将正文中无法记述展开的人物，以这种若干记叙人物闪光点小记的方式，与志书正文精神相呼应，更好地体现了邳江地域新时代具有标志性人物的风采。如在工业、牙刷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教育等篇中集中介绍了“积聚人才科技兴业的伯乐——于在青”、“压力机行业奋力超越者——林国富”、“求贤若渴、精心育人的好校长——张达明”等。全志一共记载了30位为县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在世人物，其中有企业名家、文史专家、警察、教师、农民、体育人才、医生、厨师、书画家、扬剧演员和宗教人士。在介绍这些人物时主要突出了他们不平凡的事迹，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勇于拼搏，奋力进取的人生历程，每一位人物都显露独特的人格魅力。

三是坚持“以人文本”记述理念，为“小人物”树碑立传。《邳江县志》一方面扩大志书人物收录范围，设“人物编”，分“人物传略”和“人物表录”两章，全书共收录人物4283人（次），其中为54人立传。其数量之多，在同类型志书中比较少见。比较突出的特色是在“人物表录”一章中专设“能人巧匠名录”一节，收录了66位社会民间的能人巧匠，用极其简短精炼的语言文字，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及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志书正文中采取附记的方式收录了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开创性、先进性的人物。另外，在精神文明建设编中，“争当文明户”一节记述了五户平凡百姓“十星级文明户”的事迹，在“树立文明新风”一章，记述许多社会各阶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扶贫济困和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事迹，虽着墨不多，但感人至深。为“小人物”树碑立传，青史留名，体现了该志书的深厚人本思想。

突出志书地方特色是提高志书质量的生命线。我市各县区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地方特色明显，在二轮修志的过程中，应充分学习借鉴《邳江县志》突出地方特色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为突出地方特色，要全面做好前期地情资料准备工作。首先是要围绕突出地方特色制定详细的地情资料搜集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展开相关地情资料的搜集。其次是要立足于各地丰富的地理、历史和人文资源，广泛搜集古今文献资料，充分挖掘其中的价值，同时紧扣时代脉搏，展现各行各业发展的地方特色，突出人民的风采和不平凡的业绩。同时，要注重志书的时效性。

二是围绕突出地方特色，努力实现体例和表现方式的创新。首先要注重在体例编排上创新，可借鉴《邳江县志》的做法，采取“升格”或“重点突出”的办法，在编写内容上注意突出重点。其次志书内容的表现方式要力求新颖、多样化。可借鉴《邳江县志》在志书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大量使用彩页和随文图片，注重各种内容完整、设计科学各种表格的使用，在人物记述上随文附人物简介和企业简介的方式，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如可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数字化技术，采取文字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制作电子志书，以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我国寺院布局规律与特点

骏马秋风齐鲁

我国历代都有寺庙遗留在世，而各朝代的寺院建筑模式不尽相同，加之地理环境、地形等原因和宗派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佛教寺院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然明清以来的寺庙建筑，布局普遍采用纵轴式，整齐对称，体现了我国传统建筑布局之美。具体来说，主要殿堂布置在一条纵轴线上，每个殿堂前左右各设置一座配殿，形成三合或四合院落。当代佛寺的规划设计必须同时做到于史有据和与时俱进。于史有据，表现为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如伽蓝規制不可僭越，殿阁配置需符合宗派和地方传统，建筑形象体现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方的风格特色，对于新建的历史寺庙，还应该尽量体现其历史上的伽蓝格局和特色。

经广泛搜集有关论文和总平面图，总结寺院布局的规律如下：

一、“伽蓝七堂”是基本原则

“伽蓝七堂”制形成于宋代，“伽蓝”就是“僧园”之意。“伽蓝七堂”的布局同我国传统四合院布局几乎完全一致，从此成为我国佛寺建筑的



北京西山十方普觉寺

固有标准。七堂之名称或配置，因时代或宗派之异而有所不同。通常皆为南面建筑，就以研究学问为主之寺院而言，须具有塔（安置佛舍利）、金堂（又称佛殿，安置本尊佛。与塔共为伽蓝之中心建筑）、讲堂（讲经之厅堂）、钟楼（俗称钟撞堂，为悬挂洪钟之所在）、藏经楼（一作经堂，为藏经图书馆）、僧房（又作僧坊，即僧众宿舍分布于讲堂东西北三面，即三面僧房）和食堂（又称斋堂）等。后世大都沿用禅宗的七堂之制，即佛寺必备山门、佛殿、法堂、方丈、僧堂、浴室、东司（厕所）七堂，到明清时期演变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法堂、罗汉堂、观音殿七堂。也有说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观音殿、罗汉堂、库房。如浙江宁波的保国寺，其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堂、藏经楼，两侧为僧房。客堂和钟鼓楼等。现存最好的实例就是北京西山的十方普觉寺，虽未完全保存伽蓝七唐制，但可借此略窥一斑。

二、中轴线上的建筑总数须为单数

轴在佛教中认为是生命无休止地轮回的极轴，它上接天堂，下达地狱，象征宇宙的秩序。宗庙是反映礼制标准的典型建筑物。《礼记》有“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祀于寝”。这种七、五、三、一的建筑体系，反映在寺院建筑上即是中轴线上的建筑物为三、五、七、九数。只所以取单数，是因一、三、五、七、九为阳数，阳为大，九为极阳数。

三、中轴线殿堂排列有顺序，但也有例外

主要殿堂在中轴线上大致按以下顺序修建：山门——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阁）。往往是到了第三或第四个殿堂才是寺院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佛殿、法堂、毗卢殿、天王殿、方丈等，一般建于寺院的南北中心线上，其余斋堂、禅堂、伽蓝殿、祖师堂、观音殿等，则作为配屋而建于正殿前后两侧。毗卢阁，是明代寺院常设的殿堂，供法、报、化三佛，还供万佛小像，所以也称万佛楼。白马寺的毗卢阁位于最后一重殿。少林寺的千佛殿也是最后一重殿。五台山显通寺的铜殿（殿内四壁铸满了佛像，号称万佛）位于藏经阁之前。例外情形：有的庙没有山门。正面为天王殿若无山门，此即为山门。供奉本寺主供佛（菩萨）的殿

堂也有建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的，如五台山的文殊菩萨殿、普陀山法雨寺的观音菩萨殿就都建造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有在天王殿后不建大雄宝殿，而只造本寺主供佛菩萨殿的，如普陀山普济寺就是在天王殿后建造圆通宝殿。有相当多的寺院只有天王殿和大雄殿，而无主供菩萨殿。小一点的寺院不专设法堂，只在某一殿堂内占用一侧，或在藏经楼内设一个法台，供方丈、高僧讲法用。有些寺院也将藏经楼多用，一是藏经，二是供奉主供的佛菩萨，三是僧众学习佛经的场所，四是接待贵宾。很多寺庙的最后一重殿不是藏经阁。法堂、经楼可合而为一，一楼为法堂，二楼藏经，如杭州灵隐寺。泉州南少林法堂一层用于讲经说法，二层藏经阁专门收藏佛教经典书籍和佛教艺术品……

四、两侧布局

除了中轴线上的主体布局外，较大的寺院在整个院落外东西两侧又形成两组有中轴线的建筑。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伽蓝殿设在大雄宝殿或法堂之东。伽蓝殿正中塑波斯匿王，左塑祇陀太子，右塑给孤独长者，这是父子三人。殿的两侧配塑十八伽蓝，是守护、保佑“僧伽蓝”（佛教徒修行的场所）的十八位伽蓝神。禅宗寺院以本山土地为守护神，也称“土地堂”。

祖师殿设在大雄宝殿或法堂之西。以禅宗寺院为例，祖师堂通常正中塑初祖达摩，左塑六祖慧能、或马祖、或该寺开山祖师，右塑百丈大师或该寺贡献突出的的祖师。

生活区一般集中于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职事堂（库房）、茶堂（接待室）等。在唐代，食堂即僧堂，后世于禅堂外另设食堂。于是食堂于东，禅堂于西，遂为丛林定式。

接待区、旅馆区一般位于中轴线西侧，如设云水堂（禅堂）以容四海之来者。但有的寺院因经费、土地等制约，也有所灵活。

罗汉堂。常位于两侧，多塑五百罗汉，如北京的碧云寺、重庆的罗汉寺等。大雄宝殿两厢有十八罗汉，自五代以后常有加罗汉堂的建筑。

方丈一般位于寺院东侧。“一丈见方，但容量无限”，称方丈，也称丈室、函丈、正堂、堂头、寝堂等。不一定位于中轴线上，一般位于寺院的东侧。

王晶—— 千手观音的手语老师和手语指挥

于 芹



王晶，女，汉族，平邑县人，1966年4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国残联艺术团副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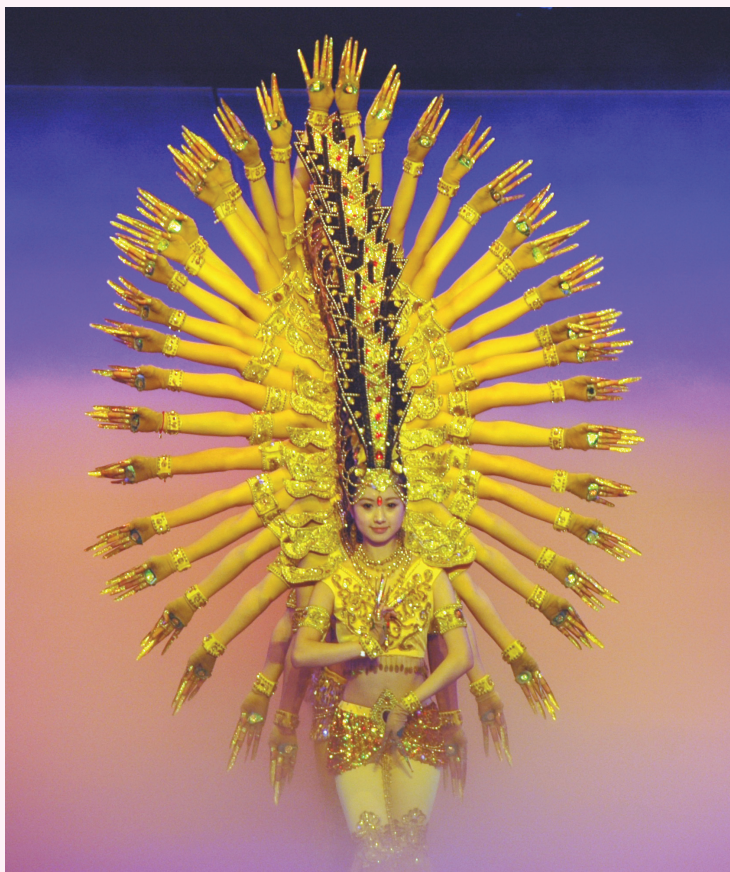
1981年毕业后，分配济南市聋哑学校担任“律动”课和体育课教师，教学过程中自学了手语，又成立了聋哑学校艺术团，给孩子们当指导老师。因工作成绩突出，两年后，王晶被调到山东省残联文体宣传部，负责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1984年调至中国残联艺术团帮助工作，1999年正式调入，历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手语教师、演出部主任、团长助理、副团长等职。

作为“千手观音”的手语老师和手语指挥先后出访30多个国家，轰动了世界。2004年在雅典残奥会上，作为手语指挥的王晶带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一起表演了舞蹈《“我的梦”——从奥林匹亚到紫禁城》，受到好评。随后，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改编后的《千手观音》更是一夜红遍大江南北，

受到了全国观众一致好评，不但以绝对优势获得了歌舞类节目一等奖，还获得了首次设立的春节联欢晚会特别大奖。在整个舞蹈演出中，王晶一直作为聋人演员的手语指挥，并担当了主持角色，付出了比演员们更多的辛苦。

2008年，王晶参与了奥运会组委会的工作，任残奥会开、闭幕式编导室主任，为残奥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成功举行做出了贡献。

2011年5月30日，正在欧洲进行巡回演出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意大利罗马进行了首场演出。这场名为《我的梦》的演出当天在罗马阿根廷剧院举行，来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30多位演员为在场数百位观众带来了常演不衰的《千手观音》、手语诗、歌舞和器乐演奏等共19个节目。整场演出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当晚演出结束时，座无虚席的阿根廷剧院内所有的中意观众以全体起立鼓掌的方式向演员们致以敬意和谢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副团长王晶说，能让意大利民众感受到中国残疾人的精神风貌，正是此次演出的意义所在。



市水利局举办修志业务培训会。6月30日，市水利局举办修志业务培训会，邀请市史志办专家，对全系统修志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各县区水利局分管领导，市局各科室、各下属单位负责人，史志编纂人员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学习了《〈临沂市志〉编修方案》，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临沂市志》“水利”编供稿和《临沂市水利志》编修工作计划的介绍，提出从2012年起每年编一本水利年鉴，并将史志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局领导要求各单位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加强领导，采取得力措施，保证按时高质量完成《临沂市志》“水利编”供稿和《临沂市水利志》编修工作。

沂水县史志办开展红色革命教育活动。为纪念建党90周年，7月1日，沂水县史志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沂南县马牧池乡沂蒙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人民子弟兵将帅纪念馆、沂蒙母亲王换于展馆、沂蒙大姐李桂芳展馆、爱国拥军好妈妈胡玉萍纪念馆、小队长李家才展馆，聆听了红嫂和沂蒙母亲的英雄事迹。在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前，党员们驻足观看，认真聆听，深切缅怀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里和沂蒙群众共同生活、战斗的鱼水深情。

参观学习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扬优良革命传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用实际行动来告慰烈士英灵，为全县史志工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指组领导到临沂市调研。7月7日—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刘翔宇一行到临沂，就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山东省情资料处高宏处长陪同调研。

本次调研是为筹备今年9月份将在山东举办的全国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会议而进行的，刘处长一行听取了临沂市史志工作信息化建设的情况汇报，察看了临沂市情网，参观了临沂市文化及城市建设。考察组对临沂市史志办的工作特别是临沂市情网站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认为临沂市情网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内容更新及时，栏目设置丰富多彩，创新性强，信息化建设在山东乃至全国都居于前列。

《沂水县政协志》志稿评审会召开。7月12日，《沂水县政协志》志稿评审会在沂河山庄隆重召开。莒县、蒙阴县、沂南县、莒南县史志专家对志稿进行了评议。

《沂水县政协志》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沂水县政协30年来的组织、思想和业务建设；记录了沂水县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活动和业绩；记录了历届委员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加快沂水经济发展和进步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全面反映了沂水县政协自成立以来的发展轨迹。各县区史志专家一致认为该志稿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科学、逻辑严谨、文风朴实，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地方政协工作特色。

市史志办公室开展地情网站建设督导检查。7月13日，市史志办下发了《关于对全市史志系统地情网站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督查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史志办对地情网站实施方案完成情况、改版升级、资料更新、资源共享、人员及设备配备、建设制度等方面开展自查。

8月15日，临沂市地情网站建设督查组在市史志办公室总编辑王瑞柱的带领下先后到苍山、费县、平邑、蒙阴、罗庄等县区，对地情网站建设进行督导检查。听取了各县区工作汇报，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

临沂市史志业务规范化建设取得新成果。2011年2月，市史志办公室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史志系统开展“学习贯彻两个〈条例〉、完善史志管理制度”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县区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于2011年上半年建立和完善包括志书质量管理、年鉴编纂管理、读志用志管理、方志馆建设工作、地情网站建设及管理等方面的业务规范。市史志办加强了督导，对各县区业务规范制定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各县区积极开展了业

务规范制定工作，到8月19日，所属12个县区全部完成了五项业务规范的制定工作。

宗圣曾子故里“回归”平邑。近日，2011年秋季新教材发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第43页对曾子的注释由“山东嘉祥人”纠正为“山东平邑人”。至此，《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百科大辞典》、《辞海》和中学课本等主流权威出版物对曾子故里的认识趋于一致，始于明成化年间的曾子故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宗圣曾子故里重新“回归”平邑。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四）。7月份以来，市史志办在大力加强对部门修志人员的集中业务培训的基础上，采取电话、网络、座谈、上门服务等多种方式，指导并解决修志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提高志稿编修质量，不断加强督导力度，市志编修工作又有新进展。截至8月22日，又有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妇联、老龄委、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调研室、中级人民法院、城市管理局、高新区、海关、司法局、人民银行、银监局、保险协会、节能办公室、科技局、气象局、地震局、教育局、临沂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莒南县等23个单位完成或基本完成《临沂市志》初稿。民政局、编办、军分区、防空办、石油总公司、外事侨务办公室、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档案局、科学技术协会、工商业联合会等12个单位完成或基本完成《临沂市志》资料长编。